

走过寺街

在南通城西北隅，有一片与飞檐翘角的天宁寺、高耸屹立的光孝塔、百载千年的古寺街和明清民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文化街区。这片粉墙黛瓦已斑驳、雕梁画栋已泅蚀、青春不再的古建筑群落所在地，却是备受南通历代文人雅士青睐的风水宝地：他们或在此择地而居；或在此办学兴教；或创诗社、办杂志；或建琴社、说评话……文风鼎盛、文气盎然。其文化积淀、家族传承，形成了方圆约14公顷的古街区，打磨出一片含金量极高的南通历史文化沉积带。

天文地文人文神文合一的寺街，如词如诗如画。

那一条条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古街老巷，仿佛一阕阕平平仄仄、清清丽丽的婉约词；

那一座座历朝历代、古朴深幽的庭院庙宇，仿佛一首首从古至今、风云际会的凝固的诗；

那一个个花木扶疏的园林、错落有致的民居仿佛一幅幅浓墨淡彩、赏心悦目的风情画。

历史记载无断层的寺街，如志如史如典。

在寺街俯拾皆是历史过客、文人雅士的故居，盘桓即得历史文化的遗存和脍炙人口的典故传说；比方志更全面，比



史书更生动，比典籍更吸引人。

翻开方志，清乾隆状元、礼部尚书胡长龄仅以诗文显著在文宦中占一席之地，却不知深藏寺街的两宅之间是花园、特殊结构的状元府和其与和珅巧周旋的民间传说，将胡长龄的为官清廉、重情重义、嫉恶如仇，演绎得有声有色。

打开史册，明末东林党人喋血无锡，震惊朝野，却不知当年为户部主事的寺街范凤翼，因“推举建言诸臣顾宪成、高攀龙”这两位东林书院领袖，而名列“东林党人榜”，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

盘点典故，柳家巷的夕阳，曾伴随说书名家柳敬亭眉飞色舞说古道今；施家田的五谷，曾帮助教育名人施仁政含辛茹苦创办贫民学校。

一纸房契，见证了深藏于寺街的保天官明代老宅；

一部家谱，褒扬了兴建学堂、缮修育婴堂的进士孙敬民；

一尊神轴，讴歌了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顾养谦“金戈铁马戍边关，空城一计退万敌”的儒将壮举；

一幅幅珍迹，展示了“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梅斗狂风、竹傲霜雪”的文人情怀。

寺街有通州最早的寺庙和建筑：唐代的天宁寺、光孝塔、关帝庙，宋代的古郡庙、北上真殿、地藏殿，元代的华王庙、谯楼，清代的青莲庵、胡家庵，以及纵横千年的古街巷、成片的明清民居。南通历史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

寺街有建于宋代的紫薇书院、清代办学时间最长的紫琅书院；有一位状元、一位榜眼、十八位进士的故居及遗址；有张謇和他的同道们创办的全国第一所设本科的女子师范学校，又有南通第一所高等小学和唯一的省立小学；有南通第一所平民小学养正小学，有南通第一所中学——走出了二十四位中科院院士，二十五位世界级文学、艺术、体育名

人的南通中学。“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教育发展的轨迹在这里向外延伸。

寺街有太平天国军山农民起义领袖黄朝飏就义处；有民国反袁革命烈士沙淦殉难地；有辛亥革命南通总司令部遗址；有土地革命时期南通县委秘密联络处；有红十四军通海如泰特委秘密机关；有1946年南通青年“反独裁、反内战”游行集会处；有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召开秘密会议、刻印传单处；有十四个革命烈士的故居……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史册沿着古街巷缓缓打开。

寺街有诗文传世十三代的文化世家，有秘方传世九代的民间神医、医术传世六代的清朝御医；藏有上溯春秋战国下至民国的孙氏家谱，藏有上溯东汉元年下至清朝雍正年间的黄氏家谱……一帧彰显着家族文化、寺街文化传承自觉的画卷沿袭着江海文脉发扬光大。

走过寺街，可触摸到南通历史文化的根脉；

走过寺街，能结识可歌可颂的南通先贤精英；

走过寺街，更能认识这片无断层的古街区的真正价值；

走过寺街，将汇合成更浩大的保护南通历史文化遗产的队伍。



庙宇·街巷

——构筑古城历史的根脉

寺街，聚集着历朝历代的古刹庙宇，江海宗教文化的史脉在这里呈现；

寺街，遍布着风情万种的古街老巷，通州古城的骨架从这里延伸。

天宁寺

素有“一州伟观”之称的唐代古刹天宁寺位于寺街北端、中学堂街西首。

天宁寺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3），僧藻焕堂建，原居州治西，系奉圣寺，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并入报恩光孝寺（即现址），名“天宁报恩光孝寺”。宋咸淳时修葺一新，郡人印应雷（南宋度宗朝兵部尚书）举家迁徙常熟，尽舍其宅入寺；又有管某建毗卢阁，寺之规模益大。明天顺元年



天宁寺

(1457)，僧善慧奏皇帝赐额，英宗敕赐，去“报恩光孝”，只称“天宁寺”。此后，天宁寺名沿袭至今。

据说，从前天宁寺南的大山门直到西大街（即今人民路），东到旧盐义仓。近代天宁寺面积已大大缩小。因清末民初“废寺办学”，天宁寺东部的毗卢阁、四贤祠、藏经楼、万寿宫、地藏殿、轮藏殿等建筑先后被改为学校。“文革”后，光孝塔后院也被学校占用。天宁寺西侧的火星殿、水神殿（禹王殿）、祖师殿、大意堂为晚清以后重建。

天宁寺坐北朝南，寺院建筑虽历经沧桑，难以与盛时相比，但仍完整地保留了中轴线上的几座主要建筑：山门、金刚殿、大雄之殿、药师殿（今改藏经楼），以及西北的光孝塔。

天宁寺的金刚殿和大殿均为单檐九脊顶。金刚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殿中有佛座，六架椽屋用分心柱，前后用平梁乳袱扎牵，斗拱形制接近于明前。

大殿名“大雄之殿”，宋代建筑。明万历《通州志》载：大雄之殿为宋徽宗御题。许多庙中大殿名俱用“宝”，用“之”者甚少，似为孤例。大雄之殿是宋元遗留下来的木结



构建筑，殿高12米，面阔三大间，进深四间，基本成正方形。歇山式。全殿有主柱20根，其明间6根内柱，采取包镶法制成12瓣瓜棱柱，柱下有复盆式石础，石础上雕刻有缠柱牡丹花纹，这是宋代建筑的特征。

我国古建筑学家陈从周教授指出，像这样用木质瓣形瓜楞柱的古建筑，在全国只有两处，另一处在浙江宁波的报国寺，实为全国罕见。

天宁寺的光孝塔又称支提塔，它近邻北极阁，遥望钟秀山，是南通三塔中历史最长、翘角最多的宝塔，为八角五层。此塔身影颀长，玲珑挺秀，亭亭玉立，飞檐翘角，为砖身木质塔。木塔阁楼形式，塔身建于须弥座上。每层塔檐用砖砌成迭涩平座，上檐用角梁，下存擎檐柱。腰檐向上反翘，绕以雕板木栏。每层四面相向开门，檐角悬有风铃。塔刹较高，承露盘上装相轮7重，刹顶安装绕以光焰的宝珠。相传清末一次大修，从鎏金葫芦里取出一只镇塔宝杯，号“披霞杯”。此杯神奇，将杯置入水缸中，缸水急变，灿若霞光，是一稀世之宝。张謇先生在世时，惟恐此宝被外强觊觎，将杯藏于南通博物苑。抗日战争中转藏苏沪，以后便下落不明。民国四年（1915），省七中（今南通中学）缪文功校长主持光孝塔大修。那年9月，学校详文，要求将两年来学校节存的2996.28元用来修塔，后来省里只同意留下1000元，加上社会捐助，开始大修工程，民国六年（1917）6月合尖。

虽说光孝塔身高仅30米，在三塔中高度最低，但因其所处地势高，故塔尖却与狼山上的支云塔尖持平。光孝塔年代久远，至今已有1100多年，比通州建州筑城还早，故民间流传“先有塔，后有城，依塔建城”之说。

天宁寺的钟声，历来极富传奇色彩。传说，天宁寺巨钟铸成后，冶铸师傅临别告诫僧人不要立即敲打。但僧人对冶铸师傅的话十分疑惑，未听其告诫就敲响大钟，冶铸师傅刚

行至十八里河口，听到钟声长叹一声：“钟声只能传至十八里了！”天宁寺的钟声与其他寺庙里的钟声也不同，其节奏与次数有其独特之处，僧人先是急促地快敲十八下，接下来慢悠悠地敲十八下，最后用中速敲十八下。这独特的古寺钟声曾是“崇川八景”之一。

如今，“镂金错彩鸟翬飞，矗青云而凌霄汉”的光孝塔与天宁寺古刹已成为寺街古街区里一处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每天，在光孝塔那悠扬的风铃声里，伴着天宁寺的袅袅梵音和独有的“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钟声，无数信徒和游人前来顶礼膜拜、留连忘返。



关帝庙

关帝庙曾称关王庙，据明嘉靖《通州志》载：“关王庙在州治西北。”明万历《通州志》、清康熙《通州志》也载：

“关王庙四，一在州治西北，唐天宝五年（746年）建。”据此，位于州治西、柳家巷南的关帝庙建于唐代天宝五年，为南通最大的关帝庙，是官定的主庙。由于东大街上也有一座关帝庙，所以民间称这座位于原西大街的关帝庙为“西关帝庙”。“西关帝庙又号武庙，州守褚邦礼劝捐重建，规制拓大于前。”（《海曲拾遗》）



关帝庙遗存

关帝为三国时的武将关羽，是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异姓兄弟老二，丹凤眼、卧蚕眉、一把长胡须的红脸大汉。关羽以《春秋》大义为法，不受曹操“上马金、下马银”的诱惑，过关斩将，护送刘备之妻，终于在古城兄弟相会的故事，流传甚广。关羽在民间有很高的地位，被升华为神，因此，为他造的庙也很多。连老南通人家中供奉的“家堂菩萨”，也多为关羽挂轴。商人以关羽为榜样，相互间加强团结，诚信为人。下层社会也以关羽为崇拜，结异姓兄弟，义薄云天，生死与共。传说最奇的是寺街西南明蓟辽总督顾养谦家后院里，也建有一座关帝庙，人称顾姓家庙，说顾养谦为张飞转世。在民间，关羽还被神化得与天气连在一起。如农历六月十二这一天下雨，就说是为关老爷磨刀下的“磨刀雨”。十三这天继续下雨，就说是为关老爷荡刀下的“荡刀雨”。关羽后被尊称为“武圣”，因此其庙也被称为“武庙”。西关帝庙即武庙后面的巷子也就被称为武庙后巷。这座庙，坐北朝南，原庙门在西大街上，门前有石牌坊、两个石栏杆环绕的水池，进去是一个大型环楼，再进去就是正殿。正殿施黄幄，塑着一个与真人差不多高的关羽坐像，左关平，右周仓，都站着。前面摆设大香炉、烛台、拜垫等。内设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神位。上悬御书“万世人极”额。后殿祀帝三代，光昭王位中，裕昌王位左，成忠王位右。殿东附祀周将军仓。旧时列入“秩祀”，岁春秋仲月卜吉、仲夏中旬三日三致祭。先斋戒，省牲，涤器；祭日行礼奏乐均如丁祭仪，诣后殿行礼，亦如仪。另“公仪”也规定，凡月朔望，州县官率属具礼服诣文庙、武庙，次诣城隍庙，次诣本署土地祠，上香三炷，跪拜如仪，谓之行香。文官的首长如通州知州，倘未因公外出，是非到不可的。武官如狼山镇总兵，则有时到，有时可委中军官为代表。（分别见于清光绪《通州志》



的《建置》与《仪典》)

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称帝,诏全国设祠合祀关岳。南通再以三清殿改为关岳祠,设供关壮缪侯及岳忠武王两木主,配享历朝的二十四位将军,如尉迟敬德、曹彬、常遇春、戚继光等都在座。春秋祭戊,享以太牢,由地方高级武官主祭,县长陪祭。民国十六年(1927),该祠供奉的神像全都移入关帝庙,关帝庙香火愈盛,关岳祠遂废。

民国二年(1913),关帝庙的前部改建为商场,庙门亦改为临街商业用房,中设拱门,以通正殿。在楼上设立了览余小座茶馆。后关帝庙的剩余部分成为旅馆,今存。

古 郡 庙

古郡庙，又称古城隍庙，供奉管理一城之神。各地一般只有一座城隍庙，而南通城里却有两座。建于北宋建隆二年（961）的城隍庙在州治东（即原人民路钟楼前，后搬至濠东路旁），寺街何以又有座城隍庙？

民间传说这庙也与明蓟辽总督顾养谦有关。据说顾养谦少年时很顽皮，经常到学堂附近的城隍庙里吵闹打架，弄得“城隍菩萨”不安宁，于是，城隍菩萨托梦给顾养谦的先生，要他多加管束。先生训斥了顾养谦并打了几戒尺。顾养谦好不情愿，他写一纸条：“处罚通州城隍边关充军。”并且把纸条烧去。一过几十年，顾养谦已经忘记此事。他当了蓟辽总督后，有一天梦中有一牧羊人向他求情，说自己原是通州城隍，因他的控告被罚牧羊，请他向玉皇大帝报告，让其回通州复职。顾养谦满足了他的请求。但是通州已有新城隍，于是另设了这座古城隍庙。

实际上，这古城隍庙是静海县的城隍庙。静海县设于后周显德五年（958），当时是通州的属县，通州城与州衙设在静海县境内。通州城里有通州的城隍庙，还有这座静海县的城隍庙。据康熙《通州志·坛庙》载：“城隍庙在州东南隅利民坊。北宋建隆二年知州王茂建。明景泰以后知州孙徽、郑重、傅锦、高鹏相继修。康熙十一年善民宋德升重修。一在东街柳家巷，静海遗祀，俗称小城隍庙……”康熙《通州志》卷二中明确记录：“（城隍庙）一在柳家巷，静海遗祀，俗称



小城隍庙。”长在该庙的沈凤歧道长以南通道教界历代相传的口碑确认：“古城隍庙原是静海县的城隍庙。”



古郡庙

古郡庙原有房屋近30间，大殿供奉古城隍神像，左侧为吴孝子祠。所祀“吴孝子”实为古城隍庙中的无常鬼，现见报刊载文，认为此庙言孝，这是误会。东西两厢房屋供奉各姓祖先神像。现古郡庙保存尚好，有前后殿，东西侧屋，吴孝子祠，院内有两棵300余年的古银杏树。

相传明末清初，评话盛行于大江南北，古城隍庙兼作娱乐场所，成为评话的演出场所。当时出类拔萃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也曾在这里献艺。柳敬亭为通州余西场人，原姓曹。15岁时被仇人陷害，被迫背井离乡，流落江湖。一次休憩于柳

树之下，想到自己是被缉捕的对象，不宜用原来的姓名，就指柳为姓。18岁时，他拜云间（今上海松江）说书艺人莫后光为师。先后在各地献艺，直到崇祯皇帝登基，42岁后的柳敬亭，才在南通发迹出了名。随后，柳敬亭声望甚高，备受欢迎，被赞赏为“行遍天下，没有敌手”的大说书家。他传声摹神，独开生面，口角波俏，眼目流利，嬉笑怒骂，穷形极相，宜乐妇孺，名动公卿，被曲艺界奉为评话泰斗，尊为“三皇”之一。扬州评话艺人则把他作为开山老祖。柳敬亭气节高尚，有义士之称，同明末复社人士过从甚密，南京的复社和东林党名流都乐意和柳敬亭交友，听柳敬亭说书。柳敬亭后来参加了明末的反清活动，为抗清将领左良玉的幕客。其人被写入《桃花扇》一剧。清初南通名诗人范国禄有怀念柳敬亭的诗云：“我尝掩泪望余西，柳家巷口夕阳低。”“直到烈皇初御极，五狼发迹名始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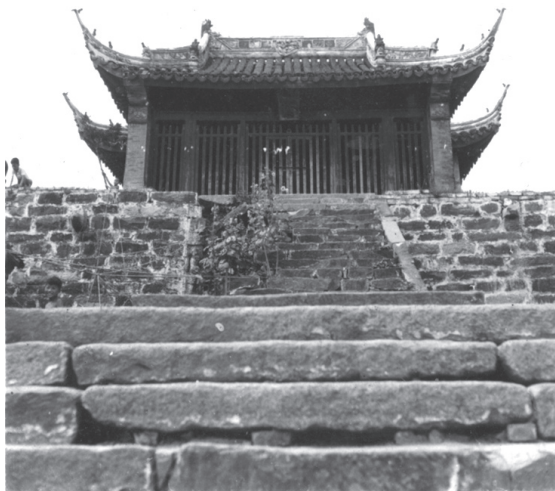
古城隍庙不仅是历代文艺演出的场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还被辟为贫儿院，南通沦陷时，改为官地小学。同时这里也曾是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民国三十五年（1946），南通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柳家巷的古城隍庙点上红烛，举行首次文艺晚会，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真武庙（北极阁·北上真殿）

寺街北端、濠河南岸有一座高七八米、砖石杂驳的土台，这是当年通州城北门故地，也就是北上真殿的遗址。《海曲拾遗》称：“北上真殿一名北极阁。”

北极阁位于城北，供奉着北方大神玄武大帝，所以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为玄武庙。现存的南通地方志称，后周显德五年（958）通州建土城，次年改为砖城；不久，设壮健营镇北门。宋政和三年（1113），通州知州郭凝因北门多盗，塞北门，以绝匪患，撤壮健营后在城门顶上建造一座高大的玄武庙。因此前已经避宋圣祖“玄”字讳，称玄武为真武，故庙成



北上真殿

时的名称叫“真武庙”。玄武庙应是道观，南通的玄武庙为和尚当家，其中变迁，未见记载。

真武庙内供奉的真武像，是由玄武演变而来的，它是古代星宿崇拜的一种变异。古人将星空分成二十八区（宿），玄武则代表北方七宿，后经神化为北方之神。玄武的早期形象是龟蛇，由道家渲染，最后演变为人神形象。通州玄武庙建在北城上，就含有守护北方之意，而庙的大殿被称为北极阁，也因此意。

原先沿攀39级石阶便到了建于城上的真武庙主殿。石阶两侧各有两幢相连的房屋相向而立，数棵大槐树点缀其间。北极阁正殿为两井叠台，后井为单檐歇山式，檐牙高啄，因建在高处，大有凌空欲飞之势。远远望去，就像城墙上的阁楼。原大殿宽13米、高10米，共有寺庙房屋45间。殿内供奉着玄武大帝。大殿几乎全是青砖铺地，唯有大帝神座前有一块长约0.8米、宽约0.5米的青石板。据传因北濠河上用来摆渡的铁索年久成精，在河上变成红衣美女引诱过往行人，吃人充饥，幸真武大帝显灵到此降魔伏怪，将此精镇在这青石板下。青石板上还贴有咒符，从此北门再无鬼怪。主殿的抱柱上刻有楹联，上联是“雉堞仰辰居（北极星所在地），唯此关独闭，奠定方州，南五山、北五山、中五山，山山对峙”；下联是“凤城临坎位（坎，八卦之一，代表水），赖百废俱兴，经营大力，物用善、工用善、财用善，善善同归”。这副对联写出了北极阁位置的重要及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大殿在该庙中最为突出，所以后人也把北极阁作为庙名。

至于该庙又被称为北上真殿，是因传说真武大帝是元始天尊的后身，在道教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道教称高等神仙为上真，北极阁又称为上真殿，称为“北”上真殿则是为了与掌印巷内的南上真殿相别。



地藏殿

据万历《通州志》载：“地藏殿在城内王家坝，宋咸平中建。”地藏殿原占地约三亩，有大门堂、中殿、正殿、斗香亭等数十间，正殿供奉地藏、东岳、丰都、十殿阎君，中殿供奉关帝、财神、勋神、痘神，亭子里供奉观音、文殊、普贤，大门堂两边设供在会各姓祖先，后面还有一个大花园，为宋代通州有名的道教圣地。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通州城爆出了一桩牡丹奇闻：城内西北隅王家坝地藏殿中殿前花园里的一株牡丹，一根茎上居然开出了五朵鲜艳的牡丹花，观之姹紫嫣红，五彩缤纷，嗅之馨香扑鼻，沁人心脾，颇为奇观，一时轰动全城，州人闻讯纷纷前来观花。一时间，地藏殿里赏花之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时通州知州钟离景伯即景赋诗：

春风荣万木，此卉异常葩。
海角遗三月，僧房见五花。
馨香惊俗眼，灿烂照高牙。
公子休追赏，如来会上夸。

此后，地藏殿的香火愈加旺盛。

地藏殿后因一场大火，几十间房均被过火夷为平地。庙里的道士被分置于各处道观。也有的说，后在东门北街重建了地藏殿。这块荒芜了的空地，被从里下河来的破落船户占据，先是把各户所有的破船搁在空地上，以船为家，接着在

空地上搭上棚子，渐渐形成了棚户区。

清光绪末年汪树堂当通州知州时，初尚重视民事，有能吏名，后乃吸毒性懒，一味搜刮。其第三子，名叔丹，州人称之为汪三少，借其父的势力，胡作非为。汪三少喜欢骑马，养了许多马。他看中了西北城脚地藏殿的这块空地，便将已定居在那里的一堆棚户赶到城外，自己在空地上砌起了马棚。马夫每天沿北城脚放青，一不留神，马就四处乱窜，伤人伤畜，吓得居户不敢放小孩出外，民愤极大。

后地藏殿的主持联合庙董，想方设法将所属地藏殿的地产收回，提供给时为庙董的侄孙施仁政做养正小学的外校园，造福一方。后此处便被人们称为施家田，现地名仍在。



地藏殿原址（现为施家田巷）



华王庙

位于寺街49号的华王庙，是座建于元延祐五年（1318）的医神庙。“华王庙初在西城外，续构城中寺街。”旧通州诸志未有载其庙的，至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方在《秩祀》“庙祀者”（非官方致祭的）名单中有“华王庙在治西寺街”的记载。

华王庙原大门朝东，门口置有一人高的青石鼓一对，门楣上有竖匾，上书“华王庙”三字，门枋（门框之竖木）下连石座，石座后部分凿有竖暗槽，供安装近一米高的提闩（能提卸的门槛），前部分高起呈圆饼状，上雕有精美的云纹图案。大门两旁的对联将此庙与其他庙宇区别开来：“三分医国手；万古济人心。”这是一座供奉医药圣手、三国名医华佗的庙宇。内有正殿、名医殿、文昌宫。庙内朝南正殿一间，大殿的柱子上挂有好多黑底金字的板对。两旁抱柱上的楹联为：“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时名。”孙启楣题：“忠于汉被冤，到今俎豆馨香，为问權奸谁庙祀；书不秦而灭，剩得刮摩煎洗，幸留神术续医经。”正殿供奉着古帝王装的华佗塑像，像前木主上称“华王大帝”。华佗为三国名医，后为曹操所杀。中国人对医生，特别是名医很敬重，希望他们死后能封王成神，继续为人们治病，所以特建此华王庙。华佗像左右为童儿，两旁两排将官：千里眼、顺风耳、药童、诊视功曹、文判官、鸡、虎、猴、鹿、痧痘二神、二郎神、斗姥、猴神（此猴神是行身）。北向名医殿三间，名医殿除了两侧供着齋神、眼光几位能疗疾的神道外，大都是历史上的名

医，有华佗、孙思邈、扁鹊、李时珍、张仲景、王叔和等十大名医一米多高的塑像和木主，南通明万历、天启年间闻名于世的外科医生陈实功也占一席座位，中间供奉神农氏。据传吕洞宾在军山度陈实功登仙未成，戏摸陈实功“鬼脸儿”，致使陈实功的胡须呈半白半黑，名医殿陈实功塑像也如此。东向正对大门的是文昌宫三间，中间供奉文昌、关帝、吕祖，两旁为朱衣、金甲、黄卷、魁星、张仙等神像。在此庙中，除华佗外，正殿里的猴神最为人们敬重，其像高不过0.5米，有一个写实的猴头，身披红绸，看上去像穿着红衫，案前香烟缭绕，香炉里的香灰多得容不下。南通有人相信此猴神能催生，每逢产妇生产不顺，其家人便到华王庙迎请猴神回去供奉，产妇便能转危为安，然后再将猴神送回庙，酬以香火费。



华王庙遗址



华王庙从元代至民国，历经数次修缮。清光绪三十年（1904）以前，官医局就设在华王庙文昌宫，官医为汤浣香，他的任务是替内外监的犯人看病。民国十三年（1924）朱明斋主持时，得到张簪捐资重修，庙貌焕然一新。民国二十年（1931），朱德益用文昌宫做益善堂。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复得程叔庄捐资修理，新塑文昌宫全部神像，庙貌又是一新。1958年华王庙改办织布工厂，现正殿遗存尚好，只是已改为民居。

寺 街



寺街

寺街位于南通旧城西侧（今市民广场），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古街。寺街为紫红的五山石碎石路面，全长约600米，宽约3米。街的两边均为粉墙黛瓦的明清民居。从街头到街尾都能见到那“一州伟观”的光孝塔。寺街原名“天宁寺街”，就因街的中部有天宁寺而得名。南通建州于后周显德五年（958），因此，初始通州城城址是以天宁寺附近为州治，寺街、中学堂街、育婴堂巷一线为纵横主街。南通向有“先有天宁寺，后有通州城”之说，据此，寺街的存在也有近



12个世纪,可称得上是南通最古老的街区。

城中西北片东至蒋家巷(现北濠桥路),西到西城墙(现环城西路),南临西大街(现人民路),北到北城墙(现环城北路)。以千年古街寺街为主干,并连接与其平行的官地街、与之垂直的中学堂街,由三街及周边里巷组成了南通旧城西北部的古街区。其东侧延伸有大巷、小巷、三衙墩巷、岳家巷、公安巷、公安后巷;其西侧延伸有石桥头、育婴堂巷、侯家巷、胡家庵巷、胡家园、武胜巷、柳家巷、古郡庙巷、新群巷、礼巷、施家田、火场头、筷儿桥、华山巷、钩子巷、王家坝西(东)巷。宋代初年,在柳家巷东有静海县治,说明宋初西北片一带已初具规模。历唐宋元明清诸王朝至今,这里保留着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宁寺为中心的建筑群,保留着唐塔宋寺,唐宋元明清庙宇、街巷,以及明清国民民居,延续着贡院、书院、学校。这些从唐宋元明清直至本世纪的古今建筑,反映了南通城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古街区东近州署,历代为官员、文人、商贾的居住地;这里也诞生过许多南通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革命先烈。

民国前后,寺街曾是一条商业街,两侧市房有多种商店,如钱庄、布店、车轿铺、铁匠铺、裱画铺、成衣铺、扎库铺、制鞋铺、点心铺、照相馆、日用百货商店等,后萧条冷落。故民间又有传说此街原为石板铺就,俗称龙街,龙头在惠民坊,龙尾为光孝塔。后因惠民坊处挖了口井,挖断了龙头,故寺街的街铺逐渐消失,不再繁盛。现在只有些日杂店、烧饼油条店、馄饨汤面店之类。不过逢初一、月半,有香客到天宁寺进香,街巷自然成市,两边摆满地摊儿,卖的多半是俗物。日出而集,日中而散。逛集市的、进香的熙来攘往,这一天就成了寺街的节日。

寺街古街区贯穿着四条历史文化脉络:唐宋元明清古建筑,近代实业教育,革命斗争遗址和历史文化名人。相互之间有依存、有交融,呈现南通文化特色。

官地街

官地街是寺街街区诸多巷名中特殊的一个，它因巷口墙上嵌有一块天然有“官地”两字的石头而得名。这块掺有红黄二色、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的石头，由于组成成分的不均衡，颜色不同，呈现出巧然天成的花纹字迹“官地”二字。淡红褐色的底色上，黄褐色的“官”字很明显，“地”字要模糊得多，唯天阴雨湿的时候才比较清晰。此石在清道光八年（1828）前后被发现，被众人视为天石，并与祥瑞、官绩结合起来。清道光八年有汪燊作诗歌歌颂州官周焘的宦绩，



官地街



其中有一首即为《石文现》，其诗序中写道：“公至郡，字特显，天然赵文敏楷法也。”以表明冥冥苍天对周焘的赞许，诗序中还写到“众惊异，砌诸壁”。1958年拓宽人民路时，拆去了嵌有此石的大聪电话公司的房墙建新华书店，此石从此下落不明，但官地街的巷名仍沿用至今。

官地街南北走向，南连西大街，北通王家坝。官地街和王家坝中间的一段原为麻千户角，因此处原住有从明正统年间始世袭的官员麻胜家九世副千户而得名。麻胜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来通，官副千户。明制卫官世袭，胜九传至裔孙麻琮，世居通州，其世系详见《州志·官职制·武职表》（南通民间传说有吃伢儿的“秋虎老妈”，实为“千户老麻”的讹音）。此处宅院后为明进士袁九皋后裔所购。

从东流过来的仓河到西北城脚拱辰桥处转向南再向西，经胡状元府、易武进士宅、保天官邸三家的后园，再经篾儿桥一直流到王家坝。此南端本有一较大水塘与仓河相通，直达老育婴堂墙根。因仓河与市河相通，接濠河，通长江，遇潮汛，此处河水常泛滥。明弘治年间（1488—1505），州人黄金出私资筑了一道坝，原称“黄金坝”，后误为“王家坝”。黄金是明监察御史黄河的祖父。黄河是明嘉靖年间的举人，后因屡试不中，发誓不再考，先任滕县教习，后因其学问、品行良好，升官至监察御史。黄河刚正无私，为朝廷查处了不少贪官污吏，以至他调任之处，贪官污吏抢先辞官引退。后因与他人共同查办某皇亲国戚，反被朝廷降职西南。他在西南边疆歼寇又立下了赫赫战功，晚年解甲归田，杜门谢客，一心著书。现官地街82号内就是明监察御史黄河故宅。该处有三进青砖黛瓦建筑，每进三间朝南屋，屋前青砖天井。通过西院门，与另一同为三间朝南平房宅院相连。黄河故宅均为明清建筑，已有300年之久。

黄金坝（王家坝）西有孝子祠，孝子祠附设“忤逆所”，

为州官周焄建于道光年间。似乎是通州独有的拘押性质的设置，以惩教不孝子孙。在前清，如有子孙不孝敬长辈，由父母“告忤逆”。州官碰到此类案子，一律先打五十小板，然后量刑，最严重的会判至死刑。轻者被“送孝子祠”，罚其跪在孝子神像前。人关在忤逆所里，每天可由家里送饭，有专人监管，规定天天读《孝经》，进行尊老教育，并以孝子的善行来教育、感化不孝之子。关了一月或半月，州官认为不孝子已悔悟转变了，才允许当堂交家长带回，严加管教。现报刊有文，将孝子祠和吴孝子祠混为一谈，又误矣。关于孝子祠和忤逆所，有清通州知州周焄所撰的“记”，录于《民国县图志》中。

光复后，王家坝曾做过处决人犯的刑场。民国初反袁革命烈士沙淦就在此殉难。

官地街居住的官宦之家不多，但出了两位教育家，即居住在中段相邻的范北强和李吉林。

范北强先生是南通著名的教育家，民盟南通市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范北强出生于官地街71号。据史学家考证，范北强系北宋名臣、文学家范仲淹的后代。其父范伯仿是一名私塾教师，穷秀才。母亲范顾氏为名门闺秀，内主家务。范北强兄妹五人，她排行老二。15岁那年，她以优异成绩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深受张謇器重，留在母校附属小学执教，嗣后又出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务主任。20世纪30年代赴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深造，潜心攻读教育学，是南通市妇女界较早出国的留学人员之一。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范北强学成归国，继任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她坚持民族气节，随学校迁往南通县金沙、如东县丰利等地，坚持敌后民主抗日教学。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后，内战期间，范北强移居上海。南通解放后，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亟待恢复，



南通专员公署派员赴沪，请范北强回来工作。范北强看了邹强专员的亲笔信，激动不已，数天后便回到故乡，出任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是年秋，南通地区遭受特大水灾，物资紧缺。为克服暂时困难，范北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面发动全校师生节衣缩食，捐款捐物，一面赶赴上海，在老同学、老朋友中开展捐献“一碗米”运动。1952年，全市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她又带领师生踊跃捐款，购买飞机大炮。1955年，范北强出任南通市教育局局长。先后当选为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市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1956年12月，原本抱着“君子不党”信条的范北强，和张柔武、林弥劬、顾仲敬、曹书田、王守铭等一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了市民盟组织。从1960年起，她连任政协南通市第二、三、四届副主任。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范北强协助市委、市政府，为在“反右”、“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复查纠正，恢复名誉，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为传承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已是耄耋之年的范北强，把加强民主党派建设和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她不顾年迈，深入基层，躬身调研，考察盟员，听取中共组织意见，把一批有觉悟、有知识、有才干、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引进领导班子，接着，交任务、压担子，重点培养，精心教诲。

1985年3月，经中共南通市委批准，范北强在87岁高龄时，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8年，范北强因病去世，享年90岁。

中学堂街

在寺街中段向东，有一条比寺街还要宽的街道，名为中学堂街。这条街原从岳家桥北头向西，到天宁寺角，在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上称“州后大街”。民国年间，这条建有中学学堂的长街改名为“中学堂街”。

中学堂街东通建设路，西连寺街，南通三衙墩巷。东西长约300米，紫色的五山石铺地，只有通中大门前改铺麻石板。现中间已铺上了平整的人行道板，只有两边靠墙处还留存着一条乱石铺就的路面。此街原只有坐北朝南一边有门，路南全部是围墙，一直到西大街均为天宁寺所有。中学堂街11号为天宁寺，9号为南通中学。路北西头天宁寺占100米，其余大部分为学校位置，只有东头有住家，最东头一家不知所居为何人，第二家为榜眼王广荫家。



中学堂街



第四家为城北高等学校（原紫琅书院）的大门。第三家是“州后冯家”的大宅子。冯家多读书应试子孙，即所谓“书香门第”。家中历来就有藏书，珍稀图书不少，宅后有座明代二层小楼，三楼三底，是冯家的藏书楼，即南通有名的影岫楼。当时南通金沙还有个与冯家齐名的藏书家孙谨臣，名傲，家有三层洋式经畬楼，藏书数万卷。1938年日寇侵占金沙，经畬楼被焚毁。所幸部分珍本装成十余箱，事先寄存到南通城内冯家影岫楼里。因此，此楼藏有两座藏书楼的珍稀书籍。那时，从“州后冯家”出去的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兼藏书家冯雄，字翰飞，号经齐，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他精晓英、法、德、俄、日五国文字，学问渊博，解放后在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担任研究员。1958年，因南通中学要扩建，冯雄回通，整理影岫楼内三间房子的藏书，一部分装箱运北京自存，一部分连同经畬楼的十余箱藏书一起送南通市图书馆。搬空了的影岫楼，后来成了南通中学的图书馆。冯家还有位千金冯石麟，南通一解放就参加了革命，后随军南下，调到苏州。她的女儿范小青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现任省作家协会主席；儿子范小天曾任《钟山》杂志副主编，现任苏州南方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是《新乱世佳人》《新江山美人》等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冯宅很大，虽已有部分给了南通中学，剩下部分仍很可观。留有200余年的古树一棵，清代前期建筑五进20余间，其建筑质量超过原丁古角市委统战部宅院，可惜于1999年9月被拆毁。

柳家巷

寺街街区西南隅，有三条块石路面的曲折小巷，其中南北向、长约百米的为柳家巷。柳家巷南头的一条东西向、长约五六十米的巷子原为西关帝庙巷（现已并入柳家巷）。柳家巷北头的一条与之衔接的东西向、长约六七十米的小巷为古郡庙巷（现名新群巷）。据明万历《通州志·里巷》记载：“西北隅凡五，曰天宁寺街、石桥头巷、西关帝庙巷、柳家巷、二铺巷。”可见柳家巷、西关帝庙巷在明代已经存在。而古郡庙的出处在康熙《通州志》二卷中明确记载：城隍庙“一在柳家巷，静海遗祀，俗称小城隍庙”。

就在这呈“工”字形的古老街巷环绕中，矗立着十幢粉墙黛瓦的传统中式庭院古建筑和错落其中的数幢欧式风格的小洋楼。此中西合璧建筑群历经百年沧桑，与柳家巷、西关帝庙巷、古郡庙巷一样，有着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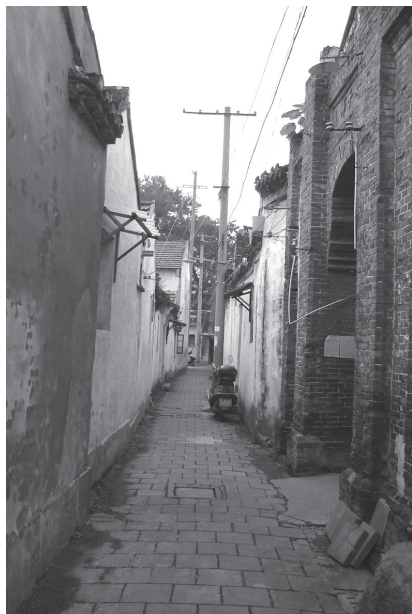
柳家巷原通西大街，1958年建人民路时南段被拆除，现在留下的是北段（即今柳家巷9号至19号），其中15号为深宅大院，该建筑建于清光绪年间，时为陈启谦旧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认为“小学师宜女子”，便与其兄张謇捐资购买了陈宅，加以修葺，创设了“公立女子学校”。该校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学，同年改为“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设本科的女子师范学校。后因学生逐年增加，“校舍陈旧，不敷应用”，于宣统二年（1910）迁入建于市河岸珠媚园旧址的女师新校舍，而原



处设女师的附属小学。

后来通崇海泰商务总会迁入，张謇任总理。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协调和维护张謇创办的南通新型工商业的发展，为中国早期有重要影响的商会之一。商务总会有并列的西、中、东三排屋，七架梁平房三四十间，中、西每排屋间有回廊相通。中排屋有内宅门厅，朝南三进均为办公地点，西排屋第二、三进为会议厅和议事厅。随着南通经济的发展，总商会的办公用房也不断扩大，后将柳家巷15号与柳家巷4号、5号相通，三宅同为通州总商会所用，成为张謇早期在南通开展实业活动的基地。



柳家巷

由于张謇实业办得很成功，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南通形成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绅重官轻”局面，故设在柳家巷内的总商会有着超越商业的政治作用。宣统三年（1911）10月，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11月8日，南通宣布光复。那天，商会曾领衔邀约地方各界人士到港欢迎上海光复军来通。光复军到南通的第二天，即在商会开地方大会。商会大门上交叉悬挂革命旗帜。就在这次会议上，辛亥革命南通总司令部宣布成立。民国元年（1912），南通民政分局成立，一并在商会办公。这些机构名义上和商会有别，但由于两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多有兼职，实际上好些方面已合而为一。后来南通县署成立，迁到原州衙。总司令部及民政分局在柳家巷15号的历史使命方告一段落。

民国九年（1920），柳家巷商会会址房屋转让出售。柳家巷4号是江苏银行、南通电报局所在地，5号则由周家禄之子周坦购买，建成周公馆。

20世纪20年代后，柳家巷15号东三宅为通明电气公司职员宿舍。江世俊（江泽民之生父）因在通明电气公司供职，曾住于此。民国十六年（1927）军阀混战，其父江石溪因避战乱，带全家来通，其弟江上青（江泽民的嗣父）、江树峰亦居于此。江泽民在此度过其幼年时代。

柳家巷15号至今仍保留着拱形的大门，门额刻有“通崇海泰总商会”几个大字。其主建筑为并排朝南的三宅院，每宅三进，每进三间七架梁屋，格子玻璃窗，均为地板、板壁，为清代中后期建筑。每个宅院均有前天井、内花园，天井里青砖铺地，两边砌有花圃，环天井均有内走廊。三进正屋后还有一排落屋等。后为满足女子师范扩大及商会的需要，张謇曾添建平房若干，又在第三宅院主建筑前砌了三上三下的西式楼房一幢。该楼有当年最新潮的水泥楼梯、走廊，铁塑镂空栏杆，屋内为上好木质地板地、板壁，方形木窗的窗框上方有环形装饰雕纹。该楼还留有拱形环门和上下石阶的遗痕。这里曾是张謇的办公处。



三衙墩巷

在钟楼的西侧、寺街的东侧，有两条东西平行走向且有南北巷相连的呈“F”字形的巷子，名三衙墩巷，此巷北与中学堂街相通，南与小巷相连。溯其巷名，自明朝起，通州设知州、同知、州判、吏目各一人，清朝沿用明制，俗称知州衙门为头衙（现钟楼北为原址），同知衙门为二衙（设于四甲镇），州判衙门为三衙。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称在“州堂西”吏目的衙门为四衙。道光年间裁州判，三衙废圯。因其前面积有土墩，三衙墩和巷名仍流传至今。



三衙墩巷

三衙墩巷虽只有百十米长，却内涵丰富：6号为梅庵琴社创始人之一邵大苏故居及梅庵琴房所在地；13号为马世和烈士故居；16号为南通县委秘密机关，江苏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顾华明的老家也在此；23号则为中国有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黄耀曾故居。

在清代，三衙墩这条巷子曾是临时的刑场。咸丰年间军山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黄朝飏等人被官府逮捕后，在这里受到凌迟处死的酷刑。

军山农民起义发生在同治三年（1863），是南通地区响应太平天国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江南岸太平军就与北岸通州的太平军骨干频繁进行地下联系。太平军将领黄朝飏成为重点发展骨干。

黄朝飏，通州人，家住军山附近，是一个佃户，为人正直，又有些文化，在群众中颇有威望。军山一带的农民，以租种地主的“沙田”为生，由于地少人多，农民一般还得搞些副业，才能维持生活。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建都天京后，通州办起了团练武装，沿江农家的青壮年，或被拉去当团丁，或被征派巡逻港口，生产大受影响。加之江上交通被团练武装扼断，农民们失去了在江上或去江南经营副业生产的去路。农民和地主官绅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太平天国军北伐之时，北方捻军活动频繁，捻军中有个哨目是扬州人，叫盛广大，他以江湖走方郎中的身份为掩护，在通海地区组织了后天教，吸收教徒数千人。黄朝飏成为通海地区后天教的领导人。黄朝飏以传统的民间宗教形式来组织聚集革命力量，并将自己的家财用做后天会的活动基金，规模迅速扩大。黄朝飏和长江南岸的太平天国军队会商，决定等通州方面准备就绪，太平天国军便大举北渡，合力攻占通州。

同治三年（1863）春天，后天会教徒秘密制造了武器，储备了粮草，并演武练习，最后和江南的太平天国军约定同



历五月十五日夜军山举火鸣炮为号，黄朝飏率后天会信徒起义，接应太平军渡江登陆。谁知消息泄露，酝酿多时的起义功亏一篑。在阴历十三日，通州州官、团练督办和地主恶霸联合镇压了通州军山农民起义。黄朝飏在州城外五里的虞帝庙被捕。统治者害怕后天会劫法场，临时将处决人犯的刑场由西门望江楼外改在州署西的三衙墩。黄朝飏和他的妻子在三衙墩壮烈牺牲，全家遭灭门，包括一个吃奶的孙子。据说，黄朝飏夫妇被杀后，首级挂在军山示众，没有人敢去收尸。同时被害的有40余人，其中仅黄朝飏家族就有10多人。军山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领袖黄朝飏的名字却永远留在通州人民的心中。

育婴堂巷

育婴堂巷东西走向，东首通寺街与中学堂街相连接，西连官地街，南接礼巷，北通侯家巷、火场头，因巷内设有育婴堂而得名。

南通办育婴堂，又称慈幼局，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据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载：康熙三年（1664），郡人殷茂乾、刘昌祚等率先在州治西天妃宫兴建育婴堂。至乾隆十九年（1754），育婴堂已初具规模。



育婴堂巷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因原设在天妃宫的育婴堂“卑隘喧湫，日久颓敝”，通州知州荆如棠亲自筹划新建育婴堂。他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郡人刘士宏、陶双峰、徐大智、陈天培、钱必进等积极响应，踊跃捐款，募得捐款四千余金，即在州治西北将原曹军草场改建为育婴堂，“共建乳房一百间，神堂三间，厅事三间，大门三间，缭以周垣，树之栅栏”。将原育婴堂迁址于此，专门收养被抛弃的婴儿，并颁布育婴规程，以重金募召乳媪，还将海门所辖东天补、西天补的沙地若干顷拨给育婴堂，所收为其日常所用。一度废弛的育婴业重呈中兴之势，育婴堂巷也因此而得名。嘉庆十一年（1806），“知州唐仲冕增建乳房十有七，围墙一”。据光绪《通州直隶州志》载：“自建堂至是，九十余年，全活婴儿六万余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簪、张謇兄弟陪知州王勛藏去育婴堂视察。时历经一百余年沧桑的育婴堂房屋狭小破旧，地势低洼积水，又是朝东朝西方向，冬天不见阳光，夏天被太阳熏烤，乳妇又蠢又懒，垃圾成堆，臭气刺鼻。三人不忍坐视，张謇决定，另选地点建立新的育婴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在张謇的倡导下，南通育婴堂在距城十余里的唐家闸又拓新址，占地24亩。建筑皆系新式洋房。新育婴堂建成后，弃婴迁于新址，老育婴堂废，但育婴堂巷名沿袭至今。

后在南通老育婴堂旧址上新建了“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实验小学”校舍基地。

学校停办以后，位于老育婴堂巷的校舍，先后被公立南通中学女生部、女师附小二部、北濠小学、电化教育器材厂所用。

育婴堂巷3号有一父子进士宅。父刘士宏，雍正十一年（1733）武进士，湖南真庆协镇副将。其子刘伊，清乾隆十七

年（1752）进士，任湖广松滋、黄陂（鹤山）等地知县。在松滋任知县时，有三十多名私盐贩子在押，刘伊经审查，锁定为首盐枭一二人，其余均经教育后遣返。在随州时，刘伊经暗访，得知狱中所关押的“强盗”，是因逼供而屈打成招的假盗。后经他缜密侦查，终于将真盗缉拿归案，还人以清白，被百姓誉为“刘青天”。刘伊还乡后修旧居，名“素园”，又有“香耘书屋”。刘伊性随和，里人中皆与来往，又工书法，求书易应，遗墨民间流传较多。父子一武一文两进士，实不多见。



侯家巷

侯家巷为寺街北段一横向呈“L”字形的巷子，东与寺街、南与育婴堂、北与胡家庵巷相连，因其巷内有一侯姓大家族而得名。

据侯家巷16号的侯姓所述，其祖辈在北京时，与张謇的老师翁同龢同朝为官，后随翁同龢一同南返，落脚南通，开了生产油、面、酒、酱菜四个坊的“西福源”，其产品质量和数量均为南通第一。

据说，张謇考状元时，侯家祖辈出过力，张謇与其祖辈



侯家巷

在官船上定下了儿女亲，要将自己的养女张瑛嫁给侯家儿子侯燕玉做媳妇。

侯燕玉为江苏通州人，西福源的少东家，不过他一点也不过问四个坊的生产、经营情况，一心用在跑上海、做交易所上。

1907年12月6日至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至初四日），张謇先生在家为养女张瑛操办了很隆重的婚礼，“嫁女于侯氏”，“内子与诸姬亲送之”。张謇的喜悦之情洋溢于日记的字里行间。

婚后的侯燕玉仍奔波于南通与上海之间做交易所，他在上海的巨鹿路有幢四层的楼房，去上海时便住在那里。只要交易好，他回南通时就会带上许多礼物，如果连块手帕都没带，那肯定是血本无归了。有一次，侯燕玉有八条棉花船被扣封在吴淞口，张瑛闻讯忙回娘家找张謇搬救兵，张謇坐上黄包车，赶去询问情况后，打了一个电话，八条船马上扬帆启航，回到南通。

侯燕玉先后娶有四个老婆，共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女结亲的有徐二惠奶奶的儿子、严大将军的儿子，也有参加革命的。

居住在侯家巷2号（后门在育婴堂巷）的是明文爵公之后、当年闻名于南通的徐氏昆曲世家。清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南通城里的许多青年争学昆剧。居于此宅的徐朗屏、徐楚白、徐昼堂兄弟三人邀约潘锡恩、吴保之、孙季裳、王龙骧、张肯堂、胡伯英、李云书、王燮卿、侯少莲等二十余名青年，组织了“振古曲社”，借武庙三义阁为社址，聘吴四先生为教师。吴四先生原为陈家酒店的地主，曾专门聘用两名曲师在家教他学昆曲，他那时年纪轻，悟性高，学会了很多戏。后来，家道中落，随小福寿徽剧班唱昆曲，见多识广，当“振古曲社”的教师绰绰有余。徐朗屏他们师从



吴四先生，两年后学成不少昆曲戏目。剧社对成员的要求很高，要求每个社员不但能唱，而且要分工苦练，掌握各种乐器。于是，徐朗屏、侯少莲打鼓，徐楚白吹笛子，徐昼堂、李云书吹锁呐，吴保之吹箫，都下过一番苦功，尤其是徐楚白吹的笛子，很有名。后来，吴四先生去世了，但振古曲社的活动并未停止，仍旧定期集会，互相研究，提高曲艺。社员最多时有30余人，除了在武庙举行活动外，还经常在侯家巷2号的徐宅里练习清唱。每年端午必在南上真殿清唱，七夕必集魁星楼清唱。开始时，他们不敢上台表演，因为排练身段有困难。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韶春茶园开幕，邀请椿台班演出。振古曲社社员中有不少人和椿台班关系很好，接洽之后，决定让“振古曲社”也参加演出。此事决定后，社员立即着手筹备演出。徐家三兄弟特地请南通乡间唱昆曲有名的杨大锁、杨二锁两位艺人来城指导教唱，排练身段步法，终于在当年秋天把昆曲戏搬上了舞台。当时，参加演出的除徐朗屏、徐楚白、徐书堂三兄弟外，还有王龙骧、王燮卿、吴保之、孙季裳、张竹峰、潘锡恩、王静轩等。因社员初次登台演出，有的临场忘词，有的身段僵硬，还有的动作慌乱，但演出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成功。尤其是老画师王静轩，年过六十，剃去胡须，扮演《痴梦》里的崔氏，娇音滴滴，如十六处女，唱得曼妙宛转，悲楚动人，一时掌声雷动。更难能可贵的是社员们爱好昆曲的意志非常坚定，有位姓王的小学教师，因为扮演了《赏荷》里的旦角而被学校辞退，他处之泰然，说：“教师可以不做，戏不可不唱。”

1919年，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相继成立。张謇大力提倡昆曲，常约徐朗屏他们到中公园或观万流亭唱曲。1920年，张謇乘“苏社”成立之际，函请江浙海宁的昆曲泰斗王欣甫先生偕诸名曲家到通，于5月26日就中公园清远楼举行曲会，并邀请徐家三兄弟参加。梅兰芳到南通时，

也约徐氏兄弟同台演出，徐楚白艺高人胆大，欣然与梅兰芳同台演出，得梅兰芳好评。

那次演出过后，振古曲社社员深感自己的不足：吐字行腔多不正确，难免有通州昆曲之讥，就经常请伶工学校的教师指导，进步很大。同时，江苏省立第七中学聘徐朗屏、徐楚白兄弟在课外教授昆曲，学生颇有收获。1926年以后，曲社名存实亡。抗日战争前，只剩徐朗屏的儿子一人能吹、能弹、能唱，尚和新学的朋友度曲消遣，不幸他在1955年夏病逝，曲社后继无人。徐氏昆曲世家和振古曲社实不该被世人遗忘。

此宅还走出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徐铭延、南通医学院副院长夏溶和南通江海志愿者创始人徐尔铸等。



石桥头

位于寺街西侧的第一条巷子石桥头，早在明代万历年前就已存在。



石桥头

石桥头贯穿东西，全长150米左右，将东边的寺街与西边的官地街相连接。巷子南边有通往西关帝庙的巷子武胜巷，有形状呈鱼钩状的钩子巷，与武胜巷相对接的是石桥头北边的礼巷。旧时曾有南北走向的仓河从礼巷中流过。礼巷12号的住户前些年购得此处的房屋后，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整修。该住户在天井中挖化粪池时，挖到4米深处，仍是河

道里的黑色淤泥，并伴有大量的青花瓷碎片，而这天井的位置正处于礼巷的中轴线上。估计当年流经礼巷的仓河，在河岸两边住家的不断扩展中淤塞废弃，最后形成了一条巷子。那么当年此仓河通往何处？因为年代久远，知道此情况的人寥寥。

家住石桥头、武胜巷和礼巷交界处的朱孝琪师傅说，石桥头在20世纪50年代时，确有石桥，桥就在武胜巷与礼巷交界处，是两块麻石板，东西向，架在石桥头上。不过桥下的河道已被土填实。至于位于礼巷的仓河，在他小时候就是一条呆沟，很细，两头都不通，水发臭。石桥下面就是干涸的凹坑，水都没有。

另据对南通掌故比较了解的周文启老人说，石桥头下的河由西关帝庙后流过来，穿石桥头，流经礼巷，再流向何处则没有印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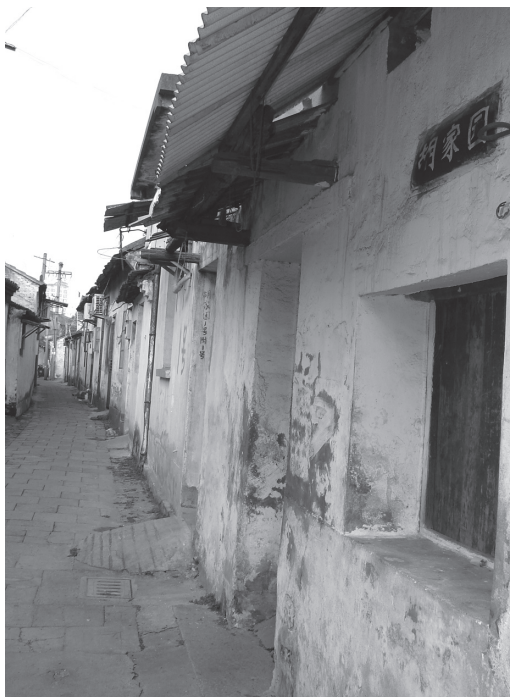
胡家园·胡家庵巷

寺街北端有两条东西平行走向、路面为紫红色五山碎石铺就的小巷：胡家园和胡家庵巷。这两条巷子都是因位于附近的胡长龄状元府而得名。

胡家园是一条直巷，全长约200米，东通寺街，西接官地街，南连胡家庵巷、王家坝东巷，北达筷儿桥、华山巷。仓河水经筷儿桥流经胡家园西头的大肚脐眼儿桥、小肚脐眼儿桥注入王家坝的大水塘。当初这条长巷坐北朝南，只有三家大门依次排列：最西头的黑漆大门，是明太祖所赐姓“保”、封“天官”的明保天官第；中间的大门非常罕见，原木色的大门上书有宝蓝色的门联，是清雍正丁未科（1727）武进士易崑宅；最东头的朱砂红漆大门，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状元、礼部尚书兼户部职胡长龄的状元府。

当年的北市河从东北水关流入，到五步桥与南来的市河水汇合北流，经西北城脚，从寺街北头明隆庆二年（1586）指挥秦鹏建的拱辰桥下向西流去，经胡状元府后院、武进士易崑后院，到明保天官后院，再经筷儿桥流入清乾隆九年（1744）云南道监察御史黄河的父亲黄金所筑的黄金坝附近的大水塘。胡状元府就在拱辰桥与南边东西向的胡家园之间，呈东西长南北狭的长方形。这里曾是南宋咸淳年间紫薇书院旧址，后为明末南京工部主事包壮行的别业，因有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为园内听雨楼题过匾额“苍烟翠雨”，即以“苍翠园”为园名。据地方志载：“明包壮行别业在四步井北，又东南‘听雨

楼’，今皆为胡南樵觞咏之所，孙长龄就而受读焉。”可见，胡家在包壮行别业原址上建宅为先，胡长龄中状元为后。



胡家园

从现寺街125号一直到胡家园1号、2号止，为原胡长龄状元府的范围。据其后人说，状元府原占地4亩，由老宅、新宅、花园、家庙四部分组成。清制状元府第结构模式的屋宇，青砖青瓦，高大宽敞，楼堂厅阁一应俱全。大门朝南，高于普通民居。八扇大门上用厚厚的竹片排成几何图案，以铜钉钉实，用朱砂红漆髹刷，门框是黑色的，显得宽阔稳重。平时大门总是关着，从边门进出，有大事才开大门。门口有两只石狮子，门对面为八字墙照壁，大门与照壁之间为一方麻石板铺就的开阔场地，是当年胡长龄新科及第，光宗



耀祖，贺客盈门时供来客停轿驻马的地方。据民间传说，因“状元不踏乱石”之故，原整条寺街都由石板铺就。状元府的门堂里挂有竖写的“状元及第”匾额（据其后人说，张謇先生的“状元及第”匾额是横写的，曾想换胡家的竖匾，胡家后人未肯，此匾“文革”中被抄走）。敞厅里供奉着装有圣旨的诰命盒子。走进大门由天井向西入提闷门，便是老宅的朝北三间遮堂，老宅为明代所建，较低矮。朝南是敞厅，敞厅后面是正台。遮堂、敞厅之间有走廊相连。东西院墙上都开着门，西边是圆门，由此门可进入西边的花园。此宅为胡长龄衣胞之地。现遮堂已拆除，敞厅为南通地区轮船航运公司食堂，正台仍为其后人所住。新宅则是一井五堂：门堂、遮堂、敞厅、正台、落屋。新宅为胡长龄中状元后所增建，故较老宅高敞，有清代建筑风格。梁柱均有合抱粗，新宅还另开有大门，大门东边有水井（现已被填满）。新宅向东开一圆门，可进入老宅与新宅之间的花园。这种花园在两宅中间的格局是比较少见的。据说，修建状元府时，官府曾打算征用南边范家的宅地，以建成前住宅后花园的传统状元府格局，但胡长龄坚决不同意损及世交范家的利益，故其新宅建在西边，花园则呈“T”字形的不规则状。胡长龄长期在外做官，清正廉洁，因此并无多钱添置田产，也无暇修治庭院，只是在嘉庆初年“丁父忧筑绿荫园”（《崇川各家诗钞汇存》）。胡长龄因父丧回籍守孝期间，才将一方小园加以整修，原来的“听雨楼”改修为“听雨堂”，使原已荒废成菜田的“苍翠园”“初具林亭花木之胜”，更名为“绿荫园”。胡长龄孝服期满后又去京，以后到各地去任职，很少回通居住，但鸟语花香的“绿荫园”已成一方胜迹，很为通城文人雅士推崇。当年，著名画家蒋霁山与胡长龄既为好友又是前后邻居，故常借“绿荫园”邀书画友人吟诗作画、饮酒宴集。胡长龄在《家园杂忆六首》中对“绿荫园”作了很好的描绘，

诗云：“我家小筑城之北，细水春流直绕墙。行遇石桥西畔去，丛篁深覆读书堂。”又云：“绿树映水覆为门，窠石丛丛贴墙根。自别草堂人日后，关山细雨几消魂。”再云：“池南池北芍为田，每到花时锦障连。此景年来纷入梦，丰台日费买花钱。”如今，老宅历经400年，新宅也有300多年历史，基本保存完好。只是荷花池已被填满，花园内建起了民房，高大的状元宅第原有的合抱粗的木料，因一度木材紧缺被房产公司拆换成水泥梁，后新建的房屋有的做了旅馆，有的为南通地区轮船航运公司所用。原来只有三家大门堂的胡家园，如今沿着院墙共有22个门。

与胡家园南邻的胡家庵巷呈“L”字形走向，此巷原名何家巷，巷内有一庵堂名福胜庵。南通城区的庵堂有两种，一住尼，一住僧，福胜庵为尼庵。当年福胜庵因年久失修，香火欠旺，庵中的尼姑度日艰难。至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居住在附近的胡长龄大魁天下，为感恩祖先的荫庇，急于在附近建家庙家庵供奉列祖列宗。胡长龄在拱辰桥的东面买地建好一排三间大屋的家庙后，又将福胜庵重新修建成一井三堂、五柱七架的家庵，改名为胡家庵堂，并延请常静师太的上几辈师祖打点，香火甚旺。于是，在乡里的口口相传下，何家巷巷名被胡家庵巷所替代。解放初，此庵由常静师太带两个小尼姑打点，口碑甚佳。胡家庵巷名一直保持至今。

胡家庵巷1号、2号为两个相邻的大宅院，其纵深一直到现胡家庵巷14号左右的位置。此宅老住户听他祖辈说，此宅为凌都堂之宅第。据查考，明代称各衙署长官为堂官，都察院长官都御史、副都御史、金都御史，以及被派遣到外省带有这些兼衔的总督、巡抚，均通称都堂。凌都堂即凌相，明弘治十二年（1499）己未科三甲六十五名进士。凌相拜都察院都御史，官终湖广巡抚，故名大中丞，又称都宪、都堂。其弟凌楷，为明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二甲一，“以礼经亚魁



胡家庵巷

乡荐第进士”，历官户部郎中。兄弟同进士，其宅地方志必有记载，果然，万历《通州志》有载：“凌都堂相宅西门外。”清后期凌氏衰微不堪，老宅早已改姓易主，遗址即西大街端平桥西侧，称为“凌家倒墙”处。既然如此，寺街何来凌都堂宅？再考，凌相、凌楷之后人凌飞阁任广东按察司，凌炅岁贡判陈州、升霍州同知，凌藿任吉安府。据上所述，凌都堂儿孙辈均有所为，也均有能力在老宅之外另建新宅。再观其建筑风格，实为清代所建，故推测，此宅应为凌都堂后人所建。老住户称都堂宅乃习称也。

胡家庵14号在清朝时为南通有名的诗人、画家蒋震文所有。蒋震文，号霁山，《崇川各家诗钞汇存》对蒋霁山评价很高，说他“兴至作山水一帧，神致闲逸，似元人笔。默坐裁诗，或半日不着一字，及诗成，见者敛手……生平颖敏绝伦，自诗古文辞外，兼工元人词曲，旁通给事以及畴人之学，卜筮星命之书……击剑、吹竹、弹丝，诸艺无不精妙。盖分其余技，足了十人云”，是当时南通文坛活跃的知名人士。

大巷·小巷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年间，南通城里共有18条街，45条巷子，其中就有大巷、小巷。最迟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大巷，位于寺街最南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巷子，西接寺街，向东直行拐一个弯就可抵钟楼。大巷不宽，大约能容两人并行。巷子南面住家的地基要比北面的高出许多，凡有门处都有高高的台阶。

大巷3号居住着达姓人家，为蒙古族。其先世原姓卜颜不花，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任通州达鲁花册（蒙古语，意为掌印官）。据元制，州官分别由蒙、汉人担任，均为从四品官，即达鲁花册与州尹（总管）。后官至元枢密使，镇福建建宁府。元之后，卜颜不花一族改姓达。明洪武年间朝廷寻访元代功臣，起用为卫千户，分卫至通州。迁通始祖为达仲仁。700多年来，南通达姓已有二十世。大巷3号达宅一进五堂，前门原在西大街（门牌为51号、13号），此宅为清代州官交替时的临时公馆，清末民初为达姓购居。当时入住者为十五世达金渊，系城南望仙桥达姓一支。其不事农桑，设馆收徒。有五子：达李、达孳、达孚、达享、达学。达孚光绪丁酉科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后与达李、达享先后进江阴南菁书院，皆有文声，达李曾任该书院经学长。其孙辈大都从事教育工作，聚居于此直至1976年。

大巷的北边与小巷相连。小巷由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巷与两条东西走向的窄长曲巷构成。主巷长五六十米，曲巷似稍



短些。小巷顾名思义应较大巷要狭窄些，但不知何故小巷主巷好像比大巷还要宽些，两人并行还绰绰有余；曲巷却要狭窄得多，最狭窄处只可一人独行。小巷的两条曲巷都向东直通钟楼。这几条巷子的路面原都是紫红色的五山碎石铺就。曲折的小巷里，走出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工程学院原政委、少将周志炎；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丁瓚的故居也在小巷里。



小巷

丁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我国老一代心理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筹建人之一。

丁瓚，字慰慈，曾用名丁达四。1910年6月25日生于钟楼西侧小巷14号的一户贫民家庭。

1927年9月，丁瓚在通师上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同学刘瑞龙、南通中学顾民元等成立“青年革命社”，开展地下斗争活动及学生运动。

1930年因南通党组织遭受破坏，丁瓚遂赴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修班免费学习，从此与党失去联系。

1931年，丁瓚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心理系，于1936年毕业。毕业后到北平协和医院脑系科讲授医学心理学课，同时，在北平的医疗单位创办了心理卫生咨询门诊。

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丁瓚到长沙投身由心理学家、中将军医林可胜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救护抗日伤病员辛勤工作。

1942年，丁瓚到迁至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院任技师兼心理卫生室主任，同时兼任战时几座内迁大学的心理系副教授，经常开办和主讲心理学演讲会，深受群众欢迎。其中有两方面命题值得一提：一是强调精神病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二是提倡开展儿童期性教育。后一方面内容不要说在当年是极其超前的论点，甚至直到现时我国儿童期性教育也仍属刚刚起步阶段。当时，他的论著有13篇收入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丁瓚著《心理卫生论丛》里，他出版这些著作，“希望唤起成千上万有心理苦难的同胞的重视”。铿锵有力的话语折射出他那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己任的壮志和心声。

1947年，丁瓚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远渡重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做访问学者及短期进修，并到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日内瓦和哥本哈根等地参观访问。

1948年8月，丁瓚在英国伦敦参加国际心理卫生大会，10月回到香港。由于他的言行及政治态度表现进步，深为蒋介石政权忌恨，一度为国民党反动当局点名通缉。丁瓚在香港经廖沫沙、冯乃超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他从香港乘海轮绕开蒋管区经大连抵达刚解放的东北沈阳，于1949年2月进入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到1948年，丁瓚在国外期间，就曾在美国芝加哥、法国巴黎等地筹组了中国科协分会，团结组织了不少中国留学生中的科学工作者。共和国成



立后，不少人响应号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丁瓚功不可没。

1949年5月到7月间，丁瓚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任科代会筹备会常务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同年8月，中共中央派恽子强（先烈恽代英胞弟，恽代英曾于1927年帮助通师刘瑞龙等成立“青年革命社”）和丁瓚等7人筹建中国科学院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开展大量组织工作。丁瓚与钱三强等拟订了中科院组织大纲，组织接收北平研究院，对原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进行调整合并。丁瓚还主持草拟了中科院各项规章制度等。

1949年11月，中科院正式成立后，丁瓚任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

1953年，丁瓚又重新回到自己心爱的专业心理学工作上。这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任研究员兼副主任。1956年，心理研究室扩建成研究所，他兼任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心理科学通讯》主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上半期，在丁瓚的倡导下，北京首先推行了“神经衰弱快速综合疗法”，在这种疗法中，心理治疗居主要地位。由于疗效显著，此疗法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广。后来这种“综合疗法”又发展到治疗其他慢性病如高血压、胃溃疡和精神分裂症中，把我国医学心理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快速综合疗法”可以说是一项有创造性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丁瓚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被扣上“叛徒”、“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受到审查、批判和斗争。1968年5月15日，一代科学巨星就这样含冤陨落。1980年中国科学院党组为丁瓚的冤案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

谯楼·钟楼



谯楼·钟楼

寺街东南处有座谯楼。其前身是南宋淳熙年间建造的用以瞭望的戍楼，后毁于火。元至正九年（1349），郡守马公毅因“更鼓刻漏无节，民未便之”而调动民工，在州衙大门上建成了一座华美庄严的四楹谯楼。谯楼内除设占空间位置甚大的计时器外，还可供主管漏刻和报时的人居住，并采用更鼓来报时。但未及20年又毁于火。明洪武三年（1370），



通州知州熊春又在其原址重建。而后又经知州孙徽、屈希尹、林云程重修。清代知州董权文、周焘、梁悦馨等也先后修缮过这座谯楼。由于谯楼建在州署前的所谓“子城”的城门上，是当时通州城里最高的建筑，因此，早在明代就有人把“谯楼月晓”列为“通州八景”之一。清道光八年（1828），通州知州周焘将谯楼维修一新，撤去原来悬挂的“海山要郡”匾额，换上新命名的“星枢楼”楼匾，并亲自写了一篇《星枢楼记》，由南通通州静海乡的书法家李芳梅书写刻碑。楼名星枢，是依星相学说，希望因此使通州文化发达、人才兴盛，此碑现存于原处。

谯楼经多次重修，现今的谯楼应是明洪武三年始建，迄今已有624年的历史，大致保留了清同治之前的规模。其楼为两层建筑，下层为土台砖墙，中间为拱形城门，直通州衙大堂，上层仿城楼。自元至清，南通谯楼一直以报时为主。那时一夜分五更，一更又分五点，每逢漏刻上显出的时间到更到点时，守候在漏刻旁的报时人便击打更鼓，用鼓声传出更点数。走街串巷的更夫们听到谯楼上报出更点，便敲自己手中的锣报更，敲梆子报点。

民国三年（1914），南通县总商会出资在谯楼前建造了高26米、直径达6米的一座钟楼，是民国时南通所建的最高建筑物，其势“俯掖谯楼，横睇三塔”。钟楼共六层，张謇与其兄张簪用南通潘氏捐给通崇海总商会的五千元钱在上海买来巨钟置于第三层，张謇明确表示这是为了办事必“先明晷刻”。钟楼为南通建筑师孙支夏设计，在风格上明显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有意模仿英国伦敦著名的大钟楼的外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近乎一层楼高的钟面向外，人们随时可以从大时钟上看到准确的时间。张謇撰书的“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的对联，也被刻上木版悬于楼前。这副对联不仅点明了南通所处的地理位置，而且指出南通由

州变为县的历史性变迁，成为传颂遐迩的名联。

钟楼建成两年后，在第四层楼瞭望台东南角增悬了铜质消防警钟，通过警钟的敲击声数来指示火灾方位。另外还配备了代表方向的色旗、色灯，遇有火情，同时张挂。随着历史的演进，报时更鼓、消防警钟早已消失，而钟楼上的时钟却依然运行。令人高兴的是钟楼和谯楼的形象被设计上了市徽，成为南通市的标志。2000年，南通对这座钟楼进行大规模的修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破坏得到修复。大钟整修后，发出响亮的钟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2002年，谯楼、钟楼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学校

——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

古有宋代南通第一所书院紫薇书院；

近有中国第一所本科制女子师范学校。

寺街，一方绵延千年的文化教育吉祥地。古代，走出了一位状元、一位榜眼、十八位进士；现代，走出了二十四位中科院院士、二十五位世界顶级文学艺术家和体育世界冠军。

南通的教育从这里起步，不断走向辉煌。

紫薇书院

我国古代与官学平行存在和发展的教育机构是书院。通州最古老的书院在寺街街区的北部，名紫薇书院。

关于紫薇书院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万历《通州志》卷五《杂志·古迹》：“紫薇书院在州西北光孝塔右，今遗址四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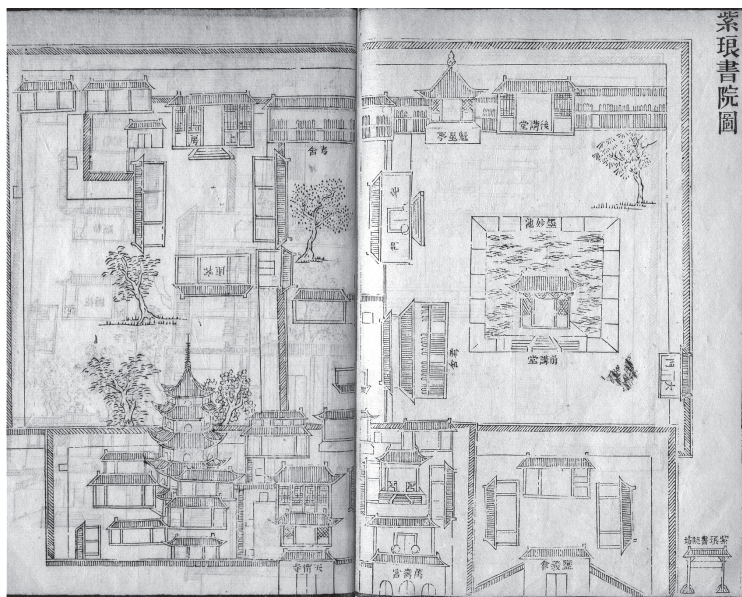
尚存。”另收入该志的淮南节制参议王应凤撰写的《通州贡院之记》中提及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知州乔行简移通州贡院于紫薇旧宅,“是邦病湫溢,遂迁于州治西溪紫薇旧宅”,其址有“光孝塔屹立于东南”。“紫薇”之名与其方位完全相同,可见为一体。由此得知紫薇书院是南宋时的一所书院,始办时间不明,停办时间不迟于贡院移建时。书院位于天宁寺西北,相传后来的胡状元府即其址,经实地考察,大体相符。虽然关于紫薇书院的文字记载仅此寥寥,但作为通州第一所书院,紫薇书院将永载史册。



紫琅书院

寺街还建有通州历史上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书院——紫琅书院。

通州曾先后有书院11所，大部分存时匆匆，施教平平，仅存其名而已。唯有始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的紫琅书院得社会之青睐，招来大批的鸿儒学子。



紫琅书院图

紫琅书院的创办者为通州知州董权文。乾隆十年（1745），董权文选择了通州城西北部的天真堂为院址，兴工建坊额堂舍，初具规模，定其名。然而后继经费不济，书院一度停办。

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州沈雯募捐整修书院房舍。书院大门、讲堂六楹修葺一新。讲堂“面临清池，旁立号舍”，“亭、楼、宾馆，庖湢皆具”。建成当年，即有大批“州之髦士乐得群居”，欲“弦诵于其中”。就学生童经择选，“甄取百二十人为肄业者”。书院“遵苏郡平江条陈”教授，立时声誉鹊起。

嘉庆到同治年间，书院又经多次维修，教学活动得以正常进行。

书院曾聘浙西名士吴坦来院主持讲学，又依照苏州府书院平江条例制订章程，延名师主教。翰林侍读张涵斋担任山长期间，生童“登贤书入祠林者前后二十余人”。紫琅书院为文人名流荟萃之处，乾隆《直隶通州志》、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皆出自紫琅书院。紫琅书院历经百年，院舍几度修复，课程数番更定，至清末科举制度废除方止。

光绪二十八年（1902），通州张謇、其兄张謇及范当世等人倡议设立通州公立高等小学，在紫琅书院等处兴建校舍。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学校开学，紫琅书院在此前停办。

紫琅书院留给后人的资产有民田401.7亩，每年田租收入有778元；沙田及沙粮田10000余亩，每年田租收入3081.69元。紫琅书院的这笔遗产为新兴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通州贡院·通州试院

科举考试设考场、让士子应试的地方，宋朝时有贡院，清朝时有称为试院的。通州贡院一度设在今寺街的北端，而试院就设在谯楼东侧察院旧址。

通州最早的贡院为南宋淳熙十年（1183）知州蒋黼所建。有屋百余间，位于今文庙一带。到了嘉定年间（1210年前后），知州乔行简认为贡院原址地势低洼，空间狭小，于是择地另建，看中了文气盎然的寺街，在紫薇书院遗址另建贡院，“嘉定中迁于州西紫薇旧宅”，“光孝塔屹立于东南”。万历《通州志》卷五《杂志·古迹》载“紫薇书院在州西北光孝塔右”，“旧宅”与“书院”同名“紫薇”，且方位相同，即为一体。相传与今南通市实验小学隔寺街的胡状元府即是。据称，新贡院风水特好，光孝塔为启动地方文运的文笔峰。其实是新建贡院激发了地方士人求学的积极性，科举连连报捷，尤其是嘉熙二年（1238），通州士人赴京应试，五人登第，打破了北宋大观四年（1110）通州一次三人登第、被全国誉为“利市州”的记录。可惜的是淳祐二年（1242），蒙古大兵攻陷通州，屠其民，“几不为郡”，乔知州建的贡院也在劫难逃，毁于兵火。咸淳四年（1268），通州知州冯弼于南城外西南最后一次建贡院。

记载通州在南宋时期三易其地建贡院经过的是淮南制节参议王应凤撰写的《通州贡院记》。此文通州诸志俱载，并刻石为碑。碑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在东岳庙稿

壤间被发现。时值元朝重建文庙大成殿，直学袁浩为之撰《重建大成殿记》，刻于此碑的另一面，成为罕见的宋元双面碑，幸存于文庙乡贤祠的墙中。这不仅仅是文物保护的佳话，也是通州贡院变迁，包括乔行简所建贡院的历史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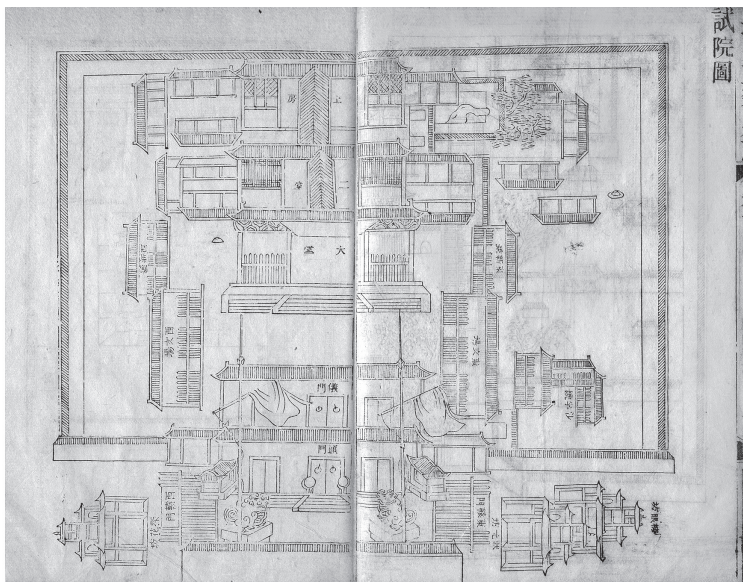
明朝和清初通州隶属扬州府，通州士子按规定到泰州参加府试和院试（包括科试、岁试等），“劳且费也”。清雍正二年（1724），通州升为直隶州，直属江苏布政使司。直隶州视与府同，府试和院试可在通州本州举行，同年知州白映棠于旧察院址建试院。称试院而不称贡院的原因是明清的贡院是省里举行乡试、礼部举行会试的场所，在府（直隶州）举行科举考试的场所称为试院。

这里需先介绍一下察院。盐业税课一直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明朝刚建立时，为监察盐课、考核盐吏，每年派巡盐御史按临两淮，巡盐御史是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以巡视盐政为专职者。其间有百余年，按临两淮的巡盐御史驻节通州，驻节时的公署称监察御史院，简称察院。通州诸志俱载：

“察院在州治东。”即今谯楼东邻处。

通州的察院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为知州熊春建，后知州黄宜、孙徽、傅锦、方钺相继修建。至嘉靖年间，知州曹金大修前，察院已呈破败之象，榱桷中腐，栋宇难支，檐牙坠地，遇有巡盐御史来此，临时粉饰以掩盖，御史尚未离开，又开始坍塌剥落，到了不大修不行的地步。于是，曹金召集工匠，购置材料，大加修缮，焕然一新。中为正堂，前为重轩，为露台，东西列廊房，中为仪门，外为大堂。正堂后为穿堂，左右为耳房，为庖舍，又后为小轩。

通州试院始建时有东西辕门二，鼓棚二，官厅二，大门三楹，东西耳房各一，仪门五楹，东西文场各七楹，大堂三楹，卷轩一，东西隶房四，川堂一，二堂三楹，东西配房二，厢房二，正室五楹，东书房三，厨房二，下房三，西书房十一，



通州试院图

下房六，厨房二，役房六。后来，通州试院又有增建，主要是增加考场，有供新沙童考试的沙字号，新文场东二楹、西五楹，东新文场五楹，等等。从雍正六年（1728）第一次考试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止，通州试院供士子考试长达116年。

试院前（即原南通市政府东面公安局前）有三座十分壮观的牌坊，四柱，短檐，上有“圣旨”竖牌，下有横石匾。第一座为“状元及第”，第二座为“榜眼及第”，第三座为“探花及第”，分别为清乾隆朝状元胡长龄、道光朝榜眼王广荫、雍正朝探花马宏琦而设。他们的荣耀是经过一场场难以计数的考试考出来的，而第一考便是在这个试院。除了这些佼佼者之外，据不完全统计，约有5000余人从这里考得秀才的功名，开始在科举的仕途上追求更高的目标。

废科举后，试院于民国初年（1912）改为南通县议会会址，而后为国民党县党部所在地参议会会址。

1949年2月南通解放后，中共南通市委机关曾一度驻于此，后市、区公安机关长期设在这里，其房屋仍可以看到昔日公署式的格局，直到建市民广场时被拆除。



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

柳家巷15号是中国第一所设本科的中等女子师范学校旧址。

张謇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通州师范后，以“女子教育不可无师”、“小学师宜女子”为旨，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张謇、陈启谦、徐联蓁等筹建女子学校，捐输私资购买城北柳家巷陈氏旧宅，修葺为校舍，以“通州公立女子学校”之名设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五日刊布校章，正式招生开学，学生分初、高两等两级，共35人。同年十一月，改名为“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以初高



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等为附属小学，同月招收新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分师范、高等、预科及初等共4级，系全国第一所设有本科的女子师范学校，民国后改称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

创校初，总理为张謇，协理为张謇。首任校长为范当世的夫人范姚夫人。范姚夫人（1863—1944），闺名倚云，字蕴素，安徽桐城人，是清代桐城派宗师姚鼐的曾侄孙女、近代著名爱国人士姚莹的孙女。姚蕴素是一位女诗人，著有《蕴素轩集》12卷和《沧海归来集》10卷。范当世是清末杰出诗人、同光体诗派的中坚人物，是张謇在通州兴办实业、教育事业的熱心支持者。姚蕴素和范当世因诗文而结姻缘，但结婚未有十年，范当世就英年早逝。张謇创建通州女子师范学校，聘范姚夫人为校长，为了继承丈夫的遗志，她欣然就职。从此，姚蕴素终身致力于南通的教育事业，投身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教育改革实践。她当校长十五年，亲自授课，颇多建树。在她的苦心经营下，学校建立了师范本科、预科及高小、初小并举的教育体系，为南通女子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初创期，教学课程设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家事、算术、体操、唱歌、图画、手工及缝纫等。曾聘有日籍教师森田政子。光绪三十二年（1907）还增设了英文课。

该校校训为：“勤俭温和，服习家政。”初办时校歌歌词是：“人生必有家，家政赖女治；女知向学明义礼，相夫教子可与古之贤母良妻比，养成贤良材，道从师范始，师有范兮范女子。”早期，学校以校训、校歌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学校女生并不受校训、校歌思想的束缚。平日学生中有自治会组织安排，教师协助指导。每天课后有体育活动，经常组织讲演会、文艺讲座、征文、征画、书法比赛、球类比赛、话剧演出等。

学校大门朝西，进门后有一小空场，现为东西走向的小巷道，巷道北侧有并列西、中、东三排屋，排与排之间都有



火巷或回廊相隔。中排屋有内宅客厅（现已封闭），进门厅有朝南屋三进，均为七架梁；西排屋第二、第三进原为小花园；东排屋东侧有一小圆门，圆门东原为空地，为女子师范学校的小操场。

后因学生数增加，校舍不敷使用，宣统元年（1909），学校购市河岸明朝蓟辽总督顾养谦珠媚园旧址及左右民舍，改建为学校后，才迁离柳家巷。附属小学还在此办学，后来才迁出。

女师至1958年并入南通师范，前后共培养毕业生2053人，向南通乃至全省、全国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师资，柳家巷的起始阶段功不可没。

江苏省南通中学

寺街街区里有条中学堂街，街道以学校命名，足见其学校的名望之大。这座学校就是清末民初兴办新学时，由晚清状元、著名教育家张謇会同范当世、孙宝书等人集通海五属官绅议创的南通地区第一所公立中学——江苏省南通中学。南通中学在创办初期，因是由通州和它所属的如皋县、泰兴县、静海乡，还有海门厅分筹建筑费，故名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校”。主持建校的孙宝书任首任监督（校长）。学校于清宣统元年（1909）二月十六日开学。从创立至抗战前夕，体制屡改，校名数易，人事更替，通州的政法讲习所、国文专修学校、巡警教练所、监狱学传习所、银行专修学校、初等商业学校曾在此办学。民国二年（1913）改为省辖，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民国十六年（1927）改称“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八月又改称“第四中山大学南通中学校”，嗣后又改称“江苏大学南通中学”，次年又改称“中央大学区立南通中学”。民国十八年（1929）废除大学区制，恢复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旧名。

南通中学位于南通城的北濠河边，北极阁下，天宁寺光孝塔旁，东至丰裕仓，西至天宁寺，南至州廨，北至北城墙。校址系旧盐义仓，不足则割天宁寺东院和万寿宫，光孝塔一度也属中学范围，是张謇时代通州城内最大的建筑。学校大门南向狼山，用四根大石柱加横条竖立，下面有石狮和护石，上面横着条石，形成牌坊，石柱平顶有刻制云纹。中间石柱横条



南通中学原校门

间有整块大理石，上面刻着“公立中学校”五个隶书大字，后面刻有建校年月，都是张謇写的。当年在校门入口通道的正中，设有一面很大的座镜，高150厘米、宽120厘米。镜子清澈明亮，一尘不染，映照走进校门的每一位学生。镜子正方镌刻着八个秀丽的楷书：“整其衣冠，尊其瞻视。”每当学生进入学校便能对照座镜审视个人仪表，规范自己的举止。

学校沿北濠河后建围墙，东北角则为北上真殿，下有残存城墙十几米长。内是个大“目”字形环楼。其后有大操场，操场东西两边，各有雨操场，呈长方形。雨操场北还有网球场。操场东侧为校园，操场与校园间隔的围墙顶塑一游龙，有龙头、龙尾，中间弯弯曲曲，相当美观。南通中学自始建起，就注意营造一个优美的校园环境。经过前两任校长的努力，使其初具园林规模。校园位于校之东北，因学校和校园之间为积谷仓前的一条街所隔断，故于民国九年（1920）造了南通第一条地道，把学校和校园联接起来，地道用钢

筋水泥筑就，建筑非常坚固。穿过隧道向东，筑有小土山，山顶有一座纪念亭，供莘莘学子课后读书或嬉戏。由土山向东，借仓河一汪，辟为池，池心有一小岛，岛上筑有鉴止亭，由九曲小桥分别从池的西岸和北岸通向小岛。三四亩大的池中长满了荷花，荷花池周围有回廊、紫藤花架。环池四周建有息焉游焉之室、存雅斋、斗南顾、惜景轩等楼阁亭台。池畔垂柳依依，四季鲜花飘香。尤其是春夏之际，园中群芳争妍，盛开的荷花更见清芬。黄昏日暮，明月东上，邻近的古寺，疏朗的钟声，伴着清风徐徐，清香四溢。花木扶疏中的阅览室、标本室陈列着各种图书杂志和生物标本，还有娱乐室备有中西乐器，以供学生观览研习，并畜禽鸟、植树木、培植花卉，使学生“多识草木之名”。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有一个环境既优美又幽静的去处“息焉游焉”一番，既有利于身心健康成长，又能陶冶审美情操。

南通中学自创立之日起，校董们就求贤若渴，不惜以高薪延请名师。知名学者、教授如陈师曾、何簋庵、朱东润、姜亮夫、徐益修，著名文艺批评家胡风，南通四才子中的曹劭阁、顾颉予，以及著名教师崔朝庆、陆颂石等都曾先后在校任教。美国教育家杜威在考察南通中学后发表演讲说：“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

民国二年（1913），张謇先生为南通中学题词“诚恒”。

“诚恒”是张謇先生在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中体验出来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创始人张謇的“诚恒”校训，首任校长孙宝书刻苦自励的精神，第一批教师博大精深的学养，给学生奠定了“诚于做人，恒于学问”的基础。

南通中学的师生素有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校中即有隶属于光复会的“侠团”组织。

“五四”时期，“全校学潮叠起，学生相率罢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有学生参加早期的南通地下党组织。在



党的发动领导下，学生投入了“五卅”、“一二九”等反帝、抗日救亡运动。20世纪30年代初，不少学生教师投奔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志士。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南通中学先后有29位师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南通中学在教学上注意精选教材，在教法上反对死记硬背，在学法上提倡灵活运用。在教学之余还开辟了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通中学老师讲课“要言不繁，思维严谨，解题精练，点拨有方”，并根据时代发展，给百年沿袭的“诚恒”校训不断充实新的涵意，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实践，先后培养出蔡金涛、袁瀚青、黄耀曾、王之卓、施雅风、管惟炎、保铮等科学家以及数学家杨乐、李大潜，法学家韩德培，人类学家周国兴等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外国院士、荣誉院士24位，孕育出了世界级的文学家、艺术家、体育冠军王焕镛、陆侃如、赵无极、范曾、张洁云、李菊等25位之多，并培养了数不清的社会中坚力量。

如今，百年“通中”展新容，现仅存校史馆为清末建筑，其余均更换为当代建筑。走进古铜色的学校大门，迎面右前方一块巨大的山石，篆刻着通中“诚恒”校训，左前方是一棵百年樟树。掩映在枝叶蓊郁的老樟树后面的是艺术长廊和健雄馆，艺术长廊里陈列着通中校友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健雄馆里的荣誉室中展现着通中校友体育明星当年的光荣。

“诚恒楼”前绿化带中央，一本打开的厚书上镌刻着十一个大字“追求人品与学问同步卓越”。新建的教学大楼、实验中心、图书馆错落有致，排列其间，整个校园建筑于凝重中透出浓浓的书卷气，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天宁寺、光孝塔的飞檐翘角的映衬下，更显出“通中”特有的人文色彩。校园西南角一带的古楸、古色古香的小红楼、石狮、古井、影壁、花墙等遗存则透着历史的厚重和沧桑，新老景观共同提升着南通中学校园环境的文化品位。

江苏省立南通小学

20世纪30年代中叶，论起南通城内比较有名的完全小学，与“城北”、“附小”鼎足而三者为“通小”。后者虽创立较晚，但直属省教育厅，经费充裕，师资整齐，管理严格，教学质量优良是其优势所在。

“通小”是“江苏省立南通小学校”的简称，社会上通常称为“南通小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实验小学”，所以也有“实小”的称呼。

先是民国十六年（1927）南通中学开设了“师范科”，为了便于师范科学生实习，二月，由通中校长吕冕南、穆济波



江苏省立南通小学遗址



先后负责筹备,创建“实验小学校”,供师范科学生实习,就南通中学校园余屋三间,设初、高部两学级。同年8月,中央大学区教育行核准设校,定名“中央大学区立南通中学实验小学校”,委任姚枝碧为校长,借用南通积谷仓前部屋宇扩充校舍,设六学级。不久,姚辞职,由王之义继任。

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中央大学区教育行核准委李邦和为校长。8月,大学区制取消,江苏省教育厅成立,“通小”更名为“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实验小学校”,添两学级。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教育厅核准拨款,购南通中学西侧南通老育婴堂旧址为新校舍基地(广6亩余),时张兆谷为校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教育厅又改委张钟元为校长。张任职不满一学期坚辞,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由郭逢杰继任。

全校分总务、教导两系,每系设主任一人。教导系分教务、生活指导两股,每股设主任一人。初、高部共有八学级。初级部五学级,高级部三学级,六年级单轨,五年级有甲乙两组。课程除英语、应用文为高年级选科外,其余各科悉遵部颁小学课程标准,稍有增减。学费每学期高级部3元,中级部2元,低级部1元。革命先烈子女、校中教职员子女及学行优良之贫苦儿童均免费。

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上旬,新校舍开工。次年四月上旬,第一期工程(平房两进)竣工,低年级部二学级迁老育婴堂新址上课。

同年六月,通中师范科结束(自1932年江苏实行师范区制,该科即奉令停止招生),“实验小学校”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进入新学年,乃改名“江苏省立南通小学校”。

民国二十四年(1935)暑后,高级部增设一级,于是五、六年级均双轨,初级部三、四年级复式学级停开,改设“幼稚级”(相当于现时的“幼儿园”)。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半年，新建校舍全部竣工，暑后全校迁老育婴堂巷上课。省教育厅新委张耿西（本城人，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为校长。

张耿西接任一年后，抗战爆发。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月十七日，日本飞机轰炸通城。暑假后城中各学校因此均未开学，“通小”也不例外。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春曾一度复课。三月十七日，日寇登陆，通城沦陷，学校从此停闭，未再恢复。

日本侵占南通时，公立南通中学在通小校址设立公立中学女生部。民国三十二年（1943），在这里设苏北公立南通实验小学。抗战胜利后，公立南通实小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二月改为南通县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第二部。三月十八日，南通“三一八”爱国运动反内战的游行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1949年2月5日，南通城解放，女师附小二部改为南通女子师范第二附属小学。1951年10月更名为南通市北濠小学。1975年北濠小学并入南通市实验小学校。两校幼儿班合并到北濠，称北濠幼儿园。1981年，幼儿园搬回实验小学。现在此处则成了和平桥派出所警务室，和七十二家房客居住的大杂院，不经人指点，已经不大看得出这里曾经是学校了。

不过，省立南通小学的格局依然很气派，进门是一个天井和相向十间平房，进里是三幢十上十下高大的二层楼房，每幢楼房前均有天井花坛，最后一排是二层环楼，整个大院前后上下约有教室近百间和一个大礼堂。若加以整修，是个不错的旅游景点。



南通市实验小学



南通市实验小学

南通市实验小学，位于寺街88号，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张謇及范当世、张师江、孙宝书（即进士孙敬民）等会请两江总督创建的通州第一所高等小学。核准后，公推范当世、张师江为正、副总办，利用紫琅书院旧址及原为天宁寺的屋宇毗卢阁为校基（共占地16.5亩），建校舍190多间。学校位于文气盎然的寺街街区的北端，北面是一环碧水濠河，南面是祥云缭绕的光孝塔、枝叶参天的古银杏，真是一处清静幽雅的读书好地方。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季学校竣工，取校名为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孙宝书任总理

(校长)。当年3月20日开学,招考第一批新生63人,编制一级。学校订有详细的目标、方法、原则,实行校内监护与家庭联络相结合的制度,进行严格的操行考查,奖惩分明。

学校相继取名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城北小学、南通专区实验小学等,历史赋予了小引领一方的气度和使命。学校以“勤敬”二字为校训,首任校长孙宝书,在每周的师生例会上必谈“勤敬”。而他的身体力行更是让人敬佩。在学校经费严重短缺时,他常将自己的薪金捐献给学校,分文不取而勤敬有加。他呕心沥血十余年,民国初年(1912)不幸病逝时,竟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积蓄。

国难当头,爱国和革命将勤敬精神升华。民国四年(1915),城北小学的师生举行国耻演讲会、国耻纪念运动会。“五四”时期,学校学生曾投身本市掀起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抗战阶段,部分教员排演《父归》《囚徒之歌》等进步戏剧,在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高潮时,散发抗日救国传单。后并入实验小学的原女师附小第二分部(解放后改名北濠小学,1975年重又并入实验小学)是进步青年的活动场所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摈弃旧式教育,沿用“城北小学”校名,当年下半年被定为南通专区重点小学,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改善了办学条件。学校明确了为工农开门的办学方向,免费招收工农子弟,免费生达50%。

1952年,学校承担五年一贯制的实验任务,实践六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53年开始,学校更名为南通实验小学,列为市重点小学校之一。师资力量得到加强,逐渐形成了一支在语、数、音、体、美各科教学中有专长的骨干教师队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恢复和加强各科教学研究组织。1981年，学校被江苏省教育厅定为省实验小学。

1983年后，学校定班进行现代教学专题实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校的思想、体育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南通市实验小学以卓著的办学业绩回报家乡父老乡亲对它的厚爱：被评为江苏省名小学、江苏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南通市模范学校、少先队全国优秀红旗大队等；而中科院院士袁瀚青、袁运开、马瑾，世界冠军赵剑华、吴健秋、张洁云、殷勤等一大批曾经的勤奋学子名扬天下，以他们优异的成绩来回报这所百年老校。

养正小学

南通城里最早的私立小学养正小学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清末秀才施仁政（字德涵）（1872—1944），由自办私塾扩充发展起来的。原址在寺街南端的华王庙内。初创时学校借大殿北侧空房两间，采取单级复式教学。随着学生与教师人数的增加，先后开辟了操场，增建了教室、办公室、礼堂，还借债购买了北邻潘姓的三间瓦屋，发展成一至四年级教学，从此把校门改为坐西面东，不再和庙门共进出。

学校以“勤俭诚恒”为校训。校长以身作则，清廉朴素，布衣布鞋，烟酒不沾，勤俭一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年过半百的施仁政曾在大暑天自带干粮，自费去南京教师讲习班听课。他节衣缩食，订阅教育杂志，不断汲取新的教学方法，促使学校信誉日增，生源充足。作为一所平民小学，施仁政将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作为办学宗旨，他认为小学时的良好教育能影响人的一生。为此，他努力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教学氛围，让“勤俭诚恒”的校训潜移默化地贯穿到学生的读作游息之中。他在学校操场四周高架蜂箱饲养蜜蜂，在边角空地栽种甜杏、海棠、桂花、天竹、梧桐等树木，带领学生在周边扦插菊花。他还将其叔祖出家为僧时所赠、位于城西北角的三亩施家田，辟为外校园。每逢周末，施仁政都会带学生们到外校园除草、培土，指导学生观测农作物生长变化，捕捉害虫，查除病株，摘湖桑养蚕，从劳动中增长生产知识。麦收时还要求学生来捡拾麦穗，进行“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



情境教育。他还在手工课上教学生编麦秆辫，学缝草帽，下地劳动时遮阳用。每逢新学年开始，他都要购买纸张，裁切成学生所需的作文、书法练习本，配上勤俭的木刻封面，再教会同学折叠装订。学生们在自制作业本的过程中，不但增长了生产知识，还减轻了家庭负担，从小就学会勤俭节约，自力更生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每当甜杏成熟、蚕豆上市、菊花盛开的时节，他都要邀请家长来校参加恳亲座谈会，除了展示学生的作文、书法等学习情况外，还请家长观看同学们排练的歌剧、话剧，一起分享甜杏、蚕豆、蜂蜜茶等学生的劳动成果。施仁政还将这些写进校歌：“蚕吐丝，蜂酿蜜，我们学习要努力……”让学生天天唱，使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正小学在施仁政的辛勤操持下，成绩斐然，声名远播，以致有家住偏远的家长慕名自带桌凳床铺送子女前来就读。



养正小学旧址

当时，外校园施家田附近是市区的贫民窟，有不少学龄儿童失学在家。施仁政忙中抽空，访贫问苦，动员家长们送孩子入学，并对贫困生一律免费。养正小学从办学以来，每年接纳的贫困免费生就占学生总数的10%~15%。这对于一个私立小学校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善举。

施仁政家境清贫，办学只能量入为出。随着学生、班级、教室的增加和教师的增聘，经费日见短缺。校长兼教师兼校工的施仁政，不仅没有分文工薪，还把家人养蚕、养蜂和田园中的一些收入也贴作校用了。后来，连子女也把每月的工薪拿出来为父亲分忧。直到身为省督学的老校友易剑楼获知实情后，才由地方教育局定期酌情拨款，填补了一些亏空缺额。

1938年3月，日寇进犯，通州城陷，养正小学停办。1944年8月16日，施仁政终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施仁政去世后，其后人继续办校，直到解放后并入实小。

养正初小办学30余年，毕业校友约1500余人。从养正小学走出去的学生，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烈士的校友有史白、马世和、姜学义三人，即便是当时加入国民党军队的校友张冠良、孙于一，最后也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养正小学还走出了中科院院士袁瀚青、黄耀曾，全国著名古琴家徐立孙，省督学易剑楼，南通第一位电气工程师易企衡等。1983年，原养正学校校友，已年届高龄的中科院院士袁瀚青托人探听施仁政后人与母校情况，并将保存完好的自己在养正小学的毕业证书复印件寄回母校作为留念。他还建议要重视养正小学的史料收集与保存工作。



世家·名居

——彰显家族文化的底蕴

在寺街这方风水宝地上，经数代、十数代家族文化传承的积淀，分布着一批官宦世家、诗文世家、教育世家、中医世家……

世家富足优裕、恬淡高雅的心态志趣，又使素雅、精致的深庭幽院点缀其间：明有“苍翠园”、“一草亭”、“遁园”……；清有“绿荫园”、“梅花楼”、“素园”……；现有“寿园”、“情境园”……

深厚的家族文化底蕴在这里彰显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工部尚书、榜眼王广荫宅

据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十二《人物志·名臣传》记载：“王广荫字爱棠，道光三年赐进士第二人，授编修，累

工部尚书。”

王广荫的曾祖父王景献为广州府知府，为官正直，体恤民情。后在家中筑“爱静园”，引导子孙静心读书。其孙辈秉承家风，成为南通有名的“一门三进士”的官宦之家：道光元年（1821）应例王勋；道光三年（1823）进士王广荫；咸丰二年（1852）进士王广佑；同治十年（1871）进士王广福。

王广荫为王景献长子犀曾之长孙，从小甚爱学习，很早便为诸生。为诸生时，授徒很有办法，门生亦众，修脯亦丰。他将大部分收入都孝敬给父母，自己与妻儿的膳食则经常是粗盐白菜粳子饭，并千方百计不让父母知道自己生活清贫。王广荫心地善良，乡邻有难，常出手相助。有一年，王广荫在浙江做幕僚的父亲要回来探亲，母亲叫王广荫去港口迎候。王广荫正在江边等候时，忽然天空乌云密布，大风骤起，巨浪翻滚，江上的来往船只纷纷回港避风。忽听岸上有人惊呼：“不好，那条船要翻！”王广荫闻声向江面望去，只见远处一艘小船，就像一片树叶，被狂风撕扯着，被江浪击打着，危险极了。他毫不犹豫地掏出重金，雇大船前去营救。想不到这次与往常一样助人为乐的善举，却救了正巧乘坐这条船的他父亲的性命。乡邻们都说这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

后来，王广荫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屡典文柄，仍清苦如故常。有人劝他申请外放，争取“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使生活有所改善。王广荫却说：“我二十年穷翰林，不识终南捷径，今转靦颜为此耶？”不为名利所动。

道光三十年（1850），文宗（咸丰）登极，下诏举国求贤。官至工部尚书的王广荫，竭力举荐林扬祖等六人，又请起用林则徐，得到文宗皇帝的恩准和赞赏。后这批人均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咸丰元年（1851）八月，年迈的王广荫接到皇帝的圣旨，受命恭送宣宗（道光）爱新觉罗·旻宁圣容供奉盛京（奉



天)凤凰楼。凤凰楼极高,有五十七级阶梯。随行的怡邸很关心地对王广荫说,你年纪大了,送到楼下就可以了,不要再攀爬这样高的楼梯了。王广荫执意不肯,说:“先皇圣容及今尚可瞻仰,何忍遽违?且礼当升阶,敢以老废礼耶?”白发苍苍的王广荫佝偻着腰,颤颤巍巍,一直坚持攀到楼顶,虔诚地完成宣宗圣容的供奉仪式。就在这次返回京城的途中,寒风凛冽,又飘起了漫天的雪花,王广荫不堪长途跋涉的劳累,再加上严寒侵体,身患风寒。回京不久,疾病愈发加重,不幸去世。

当时,凡官职在二品以上,在任死亡的,由吏部尚书就《谥法考》上选两个字,请皇帝赐谥,是为国谥。翰林出身的方可选用“文”字。文宗帝回想起王广荫满腹文才武略,既为国尽忠又为家尽孝,身在高位却始终恪守清贫的一生,颇为感慨,故赐王广荫国谥“文慎”。

尚书王广荫宅在州治北,中学堂街东头,大门朝南,为“簷门漆户”。门堂内高悬“中宪第”之匾额。进内为一进三堂明三暗五的朝南屋,还有后花园,后为今市房产公司所在地。王广荫“墓在州北四十里,咸丰二年谕祭葬”(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二《山川志·名迹·附墓宅》)。

兵部尚书顾养谦宅

关于柳家巷的记载始见于万历《通州志》。这一片原先主要为顾姓宅院，曾先后住过两个同姓不同宗的顾姓之家。最早是明代蓟辽总督顾养谦宅，后为“父子、兄弟、叔侄同登科甲”的清代进士顾曾烜宅，民国前后为顾仲敬的住所。

顾养谦，字益卿，号冲庵，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吏”。嘉靖年间，同为南通人的顾养谦与陈大科两进士，一北一南镇守边陲。顾养谦任蓟辽总督，出守辽东，与清兵对垒，谋划大小数十战，俱胜，有战功。他还在浙江、福建、云南平定几次“内乱”。顾养谦善于调和文武，被认为是戚继光那样能文能武的一流人物。死后追封兵部尚书，南通有“勋名第一顾尚书”之说。

顾养谦任辽东巡抚时，与都指挥使李成梁合力抵御外寇，立下赫赫战功。他还变剿为抚，稳定“建州黠酋”努尔哈赤；他援朝抗倭，靖边防乱。有一年，辽东一带发生水灾，老百姓无以为生，顾养谦就奏请朝廷开放海禁，让老百姓与日本、朝鲜通商，同时以平价米赈济灾民，使七万余人因此得救。他又立“官市法”，让边防部队与商人做些合法买卖，赢利所得“万余金”，存起来垫付兵饷，使兵士得以安心服役。他在辽东时，有一次听到雁群的叫声不同寻常，便下令立即整军备战，果然不出所料，敌军逼近城下。又有一次，顾养谦巡视边塞，到小梁河暂歇，不意敌兵十万突然来袭。顾养谦下令把东西南北四面的城门全部打开，自己坐在城楼上



高张伞盖，镇定自若地指挥调遣。当时在场的明军将吏个个吓得面无人色，顾养谦仍一如既往地与众将士谈笑风生。倭贼首领疑惑有埋伏，不敢近前，遂引兵而退。当时有人作诗记载顾养谦战功：“金银百万赏格悬，人争向敌敌自偃。万倭曾无一倭返，咋指相戒唐有人。从此东夷不复至，海上承平四十年。”

顾养谦虽有戍边“奇才”，“国家边方”又“正多事”，可是因为谋划与朝中公卿不合，终被弃而不用。顾养谦慨叹道：“战胜在一时，险塞万年计。嗟哉功未成，十二金牌至。”（《悼往事》）顾养谦毅然求去，退居家乡，拒见旧部，不言边功。只在城北盖起“山楼水榭胜甲一城”的珠媚园，或与友人在园中吟诗论文，或静心著书，著有《抚辽奏议》及诗文若干卷。顾养谦的书法遒劲利落，亦如其人，且不落前人窠臼而有自己的风格。顾养谦的孙子顾国宝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进士，任吏部给事中。顾国宝亦传人名宦，为南通做了不少好事，通州城隍庙附设顾公祠祀之。

顾宅的大门在西大街的西半边，主体建筑在柳家巷南。那一带，原称为“顾半街”。东从西大街中（即现在老天宝银楼三分之二处）起，西一直到官地街，南到柳家巷南头，北到柳家巷的顾宅，是一个正三进、两厢又各三进兼有后院的大宅子。这个宅子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即在东厢三进的后面，赫然有关帝庙一座，而且这座庙在围墙以内，顾家称之为家庙（此庙应为家庙祀神之处，可能祀有关帝，但不可能是关帝庙）。南通故老有传说，当年顾养谦身负东防重任时，北京盛传有一天神宗皇帝独行深宫火巷，忽听身后隐隐有脚步声，就厉声问：“后面何人？”应答声如洪钟：“三弟翼德！”皇帝接着问：“二弟何在？”后面答：“镇守边关！”此话传到皇帝耳朵里，他也希望能有一个可以托付生死的心腹，于是，不但默认了这一传说，还假戏真做地大怒说：“宫

里的事只有几个人晓得，怎么一下子传到外面去了？”顾养谦寓智于愚，心领神会，也就立即在南通州的家里建庙，不言自明地以关圣帝再世自居了。还有另一种版本的传说，神宗皇帝夜间处理公事，听身后有靴步声，便问：“靴步何人？”答曰：“二弟保驾。”皇帝问：“三弟何在？”答道：“镇守边关。”皇帝想起是顾养谦在镇守边关，便连发十二道金牌，召顾养谦回京。顾养谦误以为是岳飞故事重演，便自杀了，皇帝懊恼不已。此传说与事实出入甚大。

岁月易徂，景物遂移，后来顾养谦家族走向式微，“顾半街”的大宅遭到易主的命运。

此后入住的另一支顾姓，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大放异彩，“父子兄弟叔侄同登科甲”、“一门四进士”。顾曾沐于同治十二年（1873）先中进士，任工部主事。其后弟兄辈顾曾烜、顾曾灿及烜之子顾儒基应光绪九年（1883）礼部会试，俱中了贡士，“父子叔侄同科”成为一方美谈，荣耀一时。随即顾曾烜、顾儒基参加殿试，中了进士；顾曾灿三年后即光绪十二年（1886）亦为进士。据传进入顾家学塾，至少也能中个秀才。后顾曾烜任陕西醴泉知县，顾曾烜子顾儒基曾任奉天府尹，顾曾灿任刑部主事。因此顾姓老宅惠民坊16号大门口曾挂有“资政大夫”的匾额，也有“九顾十三王”之说（即出过13名将军）。因顾姓枝繁叶茂，其惠民坊的宅地住不下，另在文风盎然的寺街择地安居，于是原顾养谦宅易主成了这一支顾姓之宅。他们分别是后来闻名江苏解放区和文艺界的顾尔钥、顾尔谭以及顾永愔烈士各自的祖辈。他们并非顾养谦的子孙，此顾姓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理学家顾炎武的同族，于明末避乱从昆山迁来。顾养谦的后人顾怡生后迁至半村半郭的南园。寺街84号也住有顾养谦其他后裔，家中原藏有顾氏家谱及顾养谦身着便装的“行乐图”神轴。

后此宅（柳家巷7号、8号、9号共三个宅院）为顾曾煊、



顾曾烜兄弟所有。顾曾烜系江苏南通县公立中学的筹划人之一。清末民初张謇先生在家乡通州倡导教育救国，大办各类学校，也得到顾曾烜的大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12月，顾曾烜、范当世、张师汇、黄文田等人筹划成立公立中学，后来该中学在张謇先生的全力支持下得以创办建成。

此宅院后有一部分为其后人顾仲敬所有。一直到民国期间，顾宅三进高大宽敞的明代主体建筑及两厢各三进带后院的宅子仍完好无损，与众多的裙房、蜂飞蝶舞的后花园、篮球场般大的天井、长长的火巷一并深藏在柳家巷。

顾仲敬早年肄业于圣约翰大学，后毕业于民国法政大学经济科。非工科出身的顾仲敬，思想开通，崇尚科学，曾自己动手并和一些铜匠在家里敲敲打打，发明了磨墨机，颇具实用价值，解决了文人“非人磨墨墨磨人”的困扰。顾仲敬在抗战期间随其子、著名导演顾而已迁家大后方重庆，在那里还创制了节煤的蒸汽机供热水店使用，效果很好。出身于通州大族的顾仲敬不囿于儒家轻忽科技的旧见，且有发明创造，实为可贵，而他创办崇敬中学更是南通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仲敬早在民国六年（1917）就办了中英学塾，民国八年（1919）改名为补习学校，分中、小学两部分。民国十六年（1927）迁址英化学校旧址，定校名为私立崇敬中学。民国十九年（1930），顾仲敬用私资购东北营24亩地兴建校舍，学校始有自己的教学用房。凡顾家子弟，都可免费入学。抗战期间，日伪教育局用崇敬中学校舍办了南通县中学。1947年顾仲敬从重庆回到南通后，好不容易才收回校舍，复办崇敬中学。至1949年南通解放，顾仲敬执著办学30余年。

1952年，崇敬中学改为公办，后称为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顾仲敬任校长，直到1963年逝世。崇敬中学作为先私立后转公办的学校，在办学方针上，少有公立学校那些束缚，

提倡智育、美育，因势利导，努力挖掘学生各方面的才华，为国家培养了如赵丹、顾而已这样载入中国戏剧、电影史册的杰出艺术人才。顾仲敬还是一个戏剧爱好者，逢年过节，他也常常上台去唱几段昆曲。在这样轻松和谐的环境里，他的后代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艺术人才。

顾仲敬的长子是著名导演顾而已。次子顾尔谭曾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雨花》杂志主编，著名剧作家，电影《峥嵘岁月》《丹心曲》的编剧，其撰写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曾夺魁“飞天奖”。

顾尔谭之女顾永菲，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看家青衣”、著名电影演员。“文革”后短短数年，顾永菲在《但愿人长久》《雨后》《逆光》《泥人常传奇》《港湾不平静》等十多部故事片中担任女主角。1985年，凭借影片《雷雨》中繁漪一角，获“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奖。1998年，凭借影片《荆轲刺秦王》中“秦母”一角，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国最抢眼的女配角”。主要电视剧作品有《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开国领袖毛泽东》《花非花》《红粉》等。

1958年“大跃进”期间，南通市拓宽西大街，在拆除顾宅的前两进时，国务院有关部门闻讯后，电令正在拆除的两进全部构件编号封存，移至孔庙恢复原貌。第三进暴露在临街，成了街道工厂。后来这一带又遭拆除，建起了老天宝银楼。

1997年，南通书城扩建工程北移，拆顾曾烜宅的清代前期建筑前厅、穿堂、书房、花园、亭子、回廊等，建成了南通书城。即便这样大拆大建，现在柳家巷内仍遗留着一排起初为顾养谦故宅后为顾曾烜后代顾昂基所有的正堂屋等。



武进士易崑宅

与胡状元府西边一墙之隔的胡家园3号，为清雍正丁未科（1727）武进士易崑之宅。易崑，字青标，初任四川永宁营副将，后升任浙江台州、广东罗定州协镇署、广东潮州镇总兵。因其守边关功绩显著，朝廷赠易崑祖父易为湖“武功大夫”，晋封易崑父亲易知栋“荣禄大夫”，荣封三代。据易氏后人说，其祖上为姜子牙后代，因受封易水，故封地之内皆姓易。易氏西周受姓，明初为避寇由江西迁海门，后海门塌陷于江，分迁至金沙、西亭、南通。易崑宅坐北朝南，据其后人介绍，当年范围东起胡家园巷最东端（此处存疑，因明包壮行已在此建“苍翠园”），西至胡家园巷3号西围墙外，北至北濠河边，从现易宅北围墙外直至北濠河边原为易宅的竹林（1952年政府建轮船公司征用，捐献给国家），总共占地面积约14.5亩。只是风雨几百年，家道中落，大部分房屋典与他人，至今只剩下胡家园3号自住的三进房屋。此宅与南通传统的一进三堂、一进五堂的格式不同。当年，因为易崑有七个儿子，故他还乡后，便盖了七幢房子，一个儿子一幢。该宅为一宅两院，东宅四排，西宅三排（实际上也是四排，最后一排是厨房）。后因家道中落，东边的四排房子便典给胡家建状元府。现存的一进三堂仍为其后人所住。易宅为典型的明式建筑：青石台阶，青砖天井，雕花门窗，月亮板壁，古色古香。原进士府大门高大、威武，为罕见的原木色，上书宝蓝色门联。原大门东侧墙上有一祭坛，刻有“石将

军”半身像一尊，终年香火不断。此宅历经400余年仍基本完好，一进此门，便有时光倒流百年之感。



武进士易崑宅

易崑的后人，语言文法大师、教育家易作霖（剑楼），为通州师范第十届毕业生，曾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省政府秘书，省教育厅、民政厅主任秘书。为人品格高洁、刚正不阿、德隆望重、不愧不怍。自小熟读古典名著，直至去世前仍研读不息，每册每页均圈阅点评。抗战期间其所有家财全抛散尽，唯留两大橱线装古书，内有《史记》《汉书》《五代史》《尔雅》等经典书籍，令家人肩挑背扛转移下乡，保存于世，后毁于“文革”。

抗战时，易作霖痛恨日寇侵华，不愿做亡国奴，跟随省政府搬迁至镇江、兴化、淮安等地，任省政府秘书。在镇江工作时，他利用在省政府的人缘、威望，多次保释共产党人。后通州伪政权要其回通主持教育界工作，他断然拒绝合作，带领全家逃难至泰县姜堰第六区吕庄一带，坚持敌后办



学。因日伪政权不断蚕食，苏北非敌占区日渐缩小，省政府积极筹备江苏省南通中学在非敌占区的角斜复校。为能教育救国，易作霖毅然出任崇敬中学董事长、校长，将处在停顿之中的崇敬中学迁至敌后坚持办学。

易作霖与黄炎培（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为莫逆之交。二人年轻时曾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经办杂志《人物》，任上海《申报》馆编辑时两人朝夕相处，评古论今，商讨时政，志趣相投。因黄炎培的关系，易作霖也与新四军共产党人交往甚密，如当时的联抗司令黄逸峰（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苏皖边区第九分区专员叶胥朝（解放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通中级人民法院首任院长吴沐初等。

抗战后期，易作霖由于国破家亡，事业困顿，生活窘迫，再加上一起辗转泰县、姜堰的教师拖家带口带来的压力，口吐鲜血，染疾难愈。当时，黄炎培和新四军友人设法弄来德国进口的西药，但易作霖执意不肯服用，每日仍以中草药煎汤，终因胃大出血不止而含怨去世。

易作霖虽年仅48岁便英年早逝，但他才华横溢，成就斐然。他撰写的《国语文法四讲》《国音学讲义》《国音读本》等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在语言学研究史上都具有开拓性的史学价值，是近代国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

南通有名的电气总工程师、市人大原副主任易企衡也为易崑之后代，是易作霖的三弟。南通即将解放之际，国民党军队在电厂的主变电器旁堆积柴草及汽油，想烧毁电厂，使南通陷入黑暗之中。易企衡遵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工人护厂队，将电厂大门紧锁，由实业警护厂站岗，保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长江断航后，电厂急需的煤炭供给中断，易企衡和工友冒着头顶上盘旋的飞机、对江射来的炮火，垒砌沙袋保护机器，只要有电线被炮弹炸断，立即组织工人冒

着炮火抢修。在燃煤逐渐用完，南通供电发生困难之际，他一方面探索用花籽壳、油饼、豆饼当燃料，一方面想方设法，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山东枣庄购煤，又在渡江战役的紧要关头，争取到渡江大船50艘，将煤炭沿运河运到天生港，保证了在一片灯火通明中迎来南通城的解放。



诗文传世十三代范氏宅

位于寺街西侧塞巷尽头的123号，是诗书传家十三代、代代有古典诗词传世的范氏故居。

南通范氏，据古籍文献记载，为北宋名臣范文正公范仲淹的直系后裔。范氏祖居苏州，后因战乱，各支脉风流云散，其中一支由盛甫公带领，举家迁居江苏南通，成为通州范氏始祖；其后代均居南通，瓜瓞绵延，人才辈出，为南通名门世家。



十三代诗文世家范氏宅

范氏家族那沾满历史风霜的诗文书香，坎坎坷坷绵延十三代，曲曲折折穿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以家

族文化传承的自觉，朝代更替不断线，文字冤狱无断层，薪传火继，芬芳至今。在东西方家族史、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这个大门里走出的范氏诗文世家的起点诗人为范应龙，南通范氏诗文有记载的第一人。范应龙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贡生，庆云县令。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积极投身社会，力求有所奉献，一旦理想无法实现，则立即退隐山林，清流自守，与污浊之气一刀两断，以此来保全自身人格的完整。他“少有文名，为学者所宗，诸生门下者可二百许”。在通州地区，产生了范氏诗文世家的最初影响。

范氏十三代诗文绵延，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为范凤翼、范国祿父子二人。范凤翼，字异羽，为范应龙的三子。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24岁中进士，任国子监助教，官至吏部主事。万历三十一年，为东林中坚、吏部侍郎杨时乔赏识，调任吏部主事升员外郎。万历三十六年，东林中坚孙丕扬复任吏部尚书，重用他为考功司、文选司郎。范凤翼在任上旗帜鲜明地揭发贪官污吏几十人。早年曾力推清流贤才，被称为“东林眉目”，后因其举荐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一百余人成为震惊朝野的东林党魁，受到阉党的弹劾与暗算，被削职为民，并“追夺诰命”。在东林悲歌声中，范凤翼称病辞职，退隐故里，自筑“退园”以明志，与友人结为山茨社，从此悠游山水，啸傲林野，诗酒吟哦，凡三十余年不复出山。期间，朝中正直之士屡次举荐，故旧门生数番登门，皇帝也八次下诏，先后起为尚宝司丞，升少卿，推大理寺丞，一而再、再而三地委任他更高的官阶、更重要的岗位，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名臣重回朝班。范凤翼却不为所动。明天启六年（1626）被魏忠贤阉党中伤，削职为民。崇祯元年（1628）起复原官，不就。崇祯三年，为避乱案，寓居扬州、金陵等地，屏迹



林泉，流连诗酒。与友人在南京三义阁结兰社、在金陵地区结白下社等诗社，成为东南坛坫的风雅主持。至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方回归故里。有《范勋卿文集》6卷、《范勋卿诗集》32卷、《楚辞解注》、《历代诗选》传世。

范凤翼之子范国禄，号十山，被友人誉为“翩翩浊世佳公子”，“江东第一才子”，“弱冠即以诗文鸣于海内，著述之丰，堪称邑中之最，视为通州诗文之冠”。与写《桃花扇》的孔尚任、写《池北偶谈》的王士禛均有来往。范国禄虽“以诗闻于当朝”，在清代享有很高的文名，但他生不逢时，正值清代康乾时期大兴“文字狱”之际，文运凋敝，士大夫皆噤若寒蝉。康熙十一年（1672），范国禄应州太守王宜亨之请纂修《通州志》，得罪狼山总兵诺迈。“范自削其名，投书而去，故王志卒无范名……”范国禄无法在原籍立足，不得不远走湘、赣、鲁、冀等省避祸，浪迹四方，达十年之久。在其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一再痛陈满心的酸楚：“以文字之祸，竟至破家，仅仅从二三故人糊口于外。”（见《与李维饶书》）“遭文字之祸，流浪十年，归返故园，家业尽废。”（见《与侯方伯胡公书》）“自文字得罪以来，忧谗畏祸，糊口四方，十年然后归里，家业尽废，一事无成。”由他的书信及那时所写的诗中不难看出他所处的时代和文字狱对他的影响。但就在这样艰难的大气候下，范国禄仍能够不坠家声，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著有《十山楼诗》、《十山楼文稿》19卷，成为继范凤翼之后又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诗人。

此后，历经范遇、范梦熊、范兆虞、范崇简、范持信五代，适逢康熙晚期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高峰期，仅乾隆一朝，全国大小“文字狱”就有130余起。这对诗文世家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清代与血腥的文字狱相配合的是禁毁书籍。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江苏巡抚杨魁的奏章中将通州范凤翼所著的《范玺卿集》，即《玺卿诗集》和续

卷（下称《范集》），列入乾隆时的《禁书总目》和《违碍书目》，遭禁毁，被劈版。在《范集》被禁之前，重印乾隆《通州志》时，就将已制梓正待付印的范凤翼的本传和著作目录均删去，宁可在州志上开“天窗”，也挖版尽削。这一时期，范氏家族的诗文作品顿呈锐减之势，除范遇有一本《一陶园存今文选》，范崇简有一册《懒牛诗抄》之外，其余三代并未结集成书。范氏这几位先辈皆少负文名，能诗善文，他们之所以不肯结集出书，其主要原因是汲取范凤翼、范国禄前辈的教训，不愿以诗文贾祸而已。尤其是当岁月辗转至范崇简时，适逢如皋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发。范崇简目睹徐家因诗文满门遭祸之惨景，无奈之中下令不许子孙写书著传。此禁令使范氏诗文在散淡、隐匿中又徘徊了范崇简以下的数代人。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范氏家族这三位未曾编订诗集的先辈，并未湮沦其诗名。在康乾文祸席卷过后，他们的诗作被后人精心捡拾起来，合编为丛稿，虽然已是十存一二，但不乏精品佳句。其中，尤以生于乾隆文祸猖獗之期的范持信“因其父不令为诗”，故流传下来的诗极少，所仅存的两首七言绝句，堪称珍贵，其一：“七十老翁何所求，要将一死抵封侯。人间风云飘零尽，赢得先庐作一丘。”其二：“偃卧归来夜不惊，呻吟愁汝到天明。分明一死城垂破，又听街头卖饼声。”该诗作于同治元年（1862），当时太平军进攻南通，城将破时，家人力劝范持信离家暂避。当时范持信已是七十三岁的老翁了，他从容不迫，口占二绝，以诗言志，誓与儿孙辈同生共死。范持信以七旬高龄而出口成章，可见其功力之深，才华之高。

范氏诗文世家第九代范如松非常有学问，诗文彪炳于史，实为范氏诗文世家关键性人物，上承八代诗人之高风，下启范氏诗文鼎盛之局面。因为他教子有方，三子皆以诗文闻于晚清。



执著、强烈的家族文化传承自觉，到范伯子时，终于厚积薄发，形成了范氏家族第二个诗文高潮。范伯子（当世）、范仲林（钟）、范秋门（铠）兄弟三人诗文齐名，号称“通州三范”。时人称他们为一条龙，“兄弟以头腹尾擅誉”。范伯子为“龙头人”。范伯子，名当世，字伯子，号肯堂，范如松长子，清末文学家。范伯子古文法于武昌张裕钊。20岁开始致力于在家编历代祖先诗文著述《通州范氏诗钞》。后应冀州刺史吴汝纶之请，任武邑观津书院山长。后以岁贡任张之洞、李鸿章幕友、西席。此后，曾主讲通州东渐书院，又曾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其耳闻目睹中国时局之巨变，所思所感，皆发而为诗，记之为文，构成了同光时期独特的诗史，范伯子也成为同光诗坛的杰出代表。范伯子的诗沾满历史的风霜，在他的诗文中，可以读到甲午之耻、戊戌之变、义和团风起云涌、八国联军劫掠京城……严峻的历史、丰富的阅历使范伯子尽写执铜琵琶唱大江东去的皇皇巨著。范伯子晚年助张謇创建通州师范、女师、高等小学。有《范伯子诗文集》28卷传世。弟范钟，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是历经整整300年后范氏家族的第二位进士，著有《蜂腰馆诗》。弟范铠，民国初聘修南通县志，因与主撰者意见不合，于1915年甩笔离开南通，三年后客死他乡。

范氏诗文世家第十一代代表人物是范罕、范况兄弟。他们都是很有名的诗人。范罕，范伯子长子，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自民国二年（1913）任农商部秘书，达十年之久。范罕著有《蜗牛舍诗》，颇能克绍箕裘。他的弟弟范况也擅长写诗，著有《中国诗学通论》，译著《蛇首党》《各国交易所法制论》等，亦有声于时。

经明、清两代的发展与完善，范氏家族的诗文更臻成熟地传至范当世的孙辈、范氏诗文世家第十二代代表人物范子愚。范子愚为范罕长子，后嗣承范况。十一岁从父游学日本。

从小攻读诗史，能诗能画，满腹经纶。虽时世艰难，战祸连天，颠沛连年，然诗情不改，著作甚丰。范子愚曾就读于上海美专，毕业后游幕安徽，旋任职苏北盐垦公司。民国十九年（1930）回通潜心经史，渐识家学。先后任南通女子师范、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国文、美术教师垂三十年。他的诗写得相当好，甚至把诗当成了生命，在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家里烧掉了很多“封资修”的古籍书画，平时谨小慎微的范子愚却大胆地将自己的诗稿藏了起来，使范氏诗文又一次躲过文字浩劫，得以传承下来。范子愚是家族述而不作的典型，所作诗词藏之箱匣，不愿示人，直到晚年，才在儿子范曾的劝说下，出了一本《子愚诗抄》。范子愚将重振范氏诗文雄风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从小便以悠扬顿挫的诗文咏哦熏陶他们。其子范恒、范临、范曾幼承庭训，不坠家声，不负厚望，能诗善文，著述颇丰。长子范恒，又名王子昌。早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任南通报社副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通图书馆古籍部。王子昌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于逆境中写成了数十万字的《匈奴传》，填补了历史文学空白。老二范临，自幼去香港，后在中国人民银行驻香港分行工作，所写诗文常见于香港报刊。

范氏诗文世家第十三代的代表为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范曾。范曾承继了诗文世家的血脉，从小身受浸染，沐浴诗教。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不仅为范曾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他熔炼出一腔激越奔放的“诗情”、一双视角独特的“诗眼”、一支灵动曼妙的“诗笔”和一种包容万象、极尽精微的“诗思”。

南通范氏诗文经过漫长的演化、补充和丰富，形成了该家族特有的家风、诗风、文风，积累了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的兴衰，更可以看到整个中华民族艰难跋涉、奋发前行的缩影。范氏家族已崛起为



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文化型大家族。据此编撰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于2004年7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1卷26册，540多万字。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称此书为“宏文巨制，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足以彪炳文苑史册。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老宅，虽历经450年沧桑，但仍基本完好。老宅有朝南开的大门堂，门前两级青石台阶。门堂朝南上方斜竖挂着“天官第”、横挂着“进士第”两块光绪时的匾额，东西两侧是“明经”、“亚元”两块乾隆年间的横匾（“文革”中被毁）。穿过门堂走进院子里，便看到正堂屋上方中间挂着一块更大的横匾，匾上的“孝子”二字是读书世家的家风。而这五块匾正是范家祖上诗文绵延四百余年的标志。进了大门堂，就是一幢坐北朝南和一幢坐南朝北的对门大瓦房，朝南为三间，朝北为明三暗五间，多出两间西厢房。两幢房子中间为一块长方形的青砖天井，天井西头是一椭圆形的院门，通向西边的小花园。北边一门通火巷到正台，火巷内铺着的青石板因年代久远，都已呈瓜子纹状开裂。正台前还有一方青砖天井。此宅为典型的南通明代一进三堂：遮堂、敞厅、正台，均为五柱七架、地板雕窗、月亮板壁的明代建筑。敞厅后经翻建，大架子未变。正台天井的东南方有一口与此院共明月的明代水井。从半空俯瞰范氏宅院、水井与不远处的光孝塔，就像一块长方形砚台边竖起了一枝擎天巨笔，这就是“一门两进士，十三代诗人”的笔墨风水宝地。后因家族繁衍，光绪二十一年（1895）范当世在季家院子购一东宅；清末民初，老三范铠购宅于建设路1号，现均已拆迁。

钱嘯秋教育世家



教育世家钱嘯秋宅

南通寺街石桥头巷11号是有名的钱氏教育世家。钱家四代共有九位教师，其中连续三代有三人为南通中学教师。

该教育世家的起点教师为钱嘯秋（1890—1965）。钱嘯秋，名绳武，1890年生。为民国元年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因其学业优秀，为人勤奋，毕业后即留校任史地教员兼任导师。南通城解放后任南通中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由市人民政府任参与还校管理，并教授国文、历史、地理。1949年8月，出任南通市副市长，主管教育，兼任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南通政协常委、南通博物馆馆长等多种职



务。他曾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人生阅历，汇集成《坚瓠集》《敝帚集》《杂脍集》三书。

钱啸秋的长子钱素凡（1912—1946），名彤，于1937年11月始，在南通中学任文史、地理教员。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擅长借古喻今，引导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参加南通中共地下党发起的“三一八”游行示威，被国民党特务从南通中学绑架杀害。著有约50万字的《钱素凡文集》。

钱素凡的妻子孙术，为1936年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十届毕业生，毕业后就当教师。1954年开始任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后兼管商业中学、西公园中学的常务工作。1976年退休后，仍协助社区做幼儿学前教育和青少年教育。80岁后还创办并主持“关心下一代教育园地”橱窗，该园地现已出100多期。如今，孙术虽已90多岁高龄，仍在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

钱啸秋的次子钱彬（1915—1990），南通学院纺科1937年毕业生，曾于多所纺织高等学校任教。1961年以后，任上海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文革”后任《中国纺织学报》社长。1936年出版中国第一部棉纺织学著作，此书从出版后到解放初期一直为各高校的专业教材。

钱彬的妻子汪珺，市第三中学教师。

钱啸秋孙子、钱素凡的儿子钱炜，中共党员、外国文学副教授。1966年南京师范学院毕业，1968年分配到牡丹江林业局红旗林场学校当教师。1970年调到海安立发中学当教师，1979年为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后为南通中学教师。1990年起从事教育管理，历任高教办副主任、教委副主任、市政府督导室主任。2004年退休。著有《钱素凡研究文稿》《地方教育·教育之乡》两书，约40万字。

钱炜的妻子刘莉华，中共党员、中学高级英语教师。南

通教育进修学院毕业。1964年为盐城大冈中学英语教师。1974年调至南通县观音山八一中学，1981年到南通中学任教，2004年退休。从事英语教学40年，被评为师质标兵。

钱嘯秋的儿子、钱彬的长子钱中孚（1944—2002），北京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先后在西安地质学校、南通省纺校、南通工学院任教师。

钱嘯秋的重孙媳缪莉为南通中专教师。

钱嘯秋宅一进三堂，还有三方青砖天井加一个后菜园。据其后代说，当年钱嘯秋除在通中任教外，同时还在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兼课。在他成年累月的辛苦奔波下，分三次才将此宅建成。第一次典得此院，一方天井，三间朝南屋，三间朝北屋。第二次在此院后新起了一排朝南屋，有卧室、花厅、书房，除天井外，朝东还有一排厨房。第三次，将后院打造成花园兼菜地。



南通徐氏祖宅

徐氏为南通大姓，“宋淳祐间元屠通州。徙江淮民实之。吾族自高邮迁通，盖当其会，迄今七百年矣，始迁者不可考，谱断自文爵公始”（《徐氏全书·修复斋杂志·记家世》，徐益修）。照国学大师徐益修所记，南通徐氏为明文爵公之后。因早在宋代便徙迁通州，故徐姓住宅大都在南通旧城六桥之内。历经七百多年的繁衍，徐氏后裔有经商的、当官的、读书的，人才济济，遍及各行各业。由于徐宅太多，故邻人在徐宅前冠以不同的定语加以区分：如西南营95、99号的徐宅，上代任知府，位于塞巷里，故称钥匙门徐家；掌印巷32号的徐宅，大门里有一块刑部侍郎的匾，大门外院墙终年涂成黑色，称黑墙门徐家；掌印巷25号的徐宅，祖上曾任饶州知府，照壁砖磨得碧滑汪亮，称磨砖门徐家；掌印巷26号的徐宅、冯旗杆巷22号的徐宅、东门外龙王桥北徐宅、南门外东寺巷11号的徐宅……

寺街也有多处徐宅：小巷18号东西院的徐宅，大巷7、8号的徐宅，寺街1号的徐宅，寺街16号的徐宅，胡家园6号的徐宅，育婴堂巷2号的徐宅，新群巷1号、武胜巷19号的徐宅……其中为尊的当推寺街59号的徐氏宅院。据家谱所载，居寺街59号的徐益修为文爵公第十一世长房长子长嫡孙，曾任徐氏族长。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推测，寺街59号当为南通徐氏祖宅。

此宅原占地约二亩，内有大小房屋六十余间，天井十二个，大小花园两个。现其基本轮廓仍存。此宅大门朝东，门前



徐氏老宅300余年的古银杏树

原有青石石鼓一对，进大门内有门堂，约10~12平方米，两侧板壁，大门堂上方悬一“中大夫第”竖匾，因“文革”中徐氏家谱被毁，无从考证是何人、为何官所有。后面即四扇二门，二门后是天井。此宅的特别之处是与内院隔断的三个独立的大厅，三个厅由南而北依次纵列在一条直线上。穿过一方天井即到第一个厅，此厅既高又大，中间用隔扇隔为三间，前面是有栏杆的走廊，后面有八扇图门、外走廊，此厅为招待男宾所用。穿过图门，过一天井，进一略小花厅，为接待内眷所用。后为徐益修的书房。此厅的西边为约40平方米的小花园，内植腊梅、桂花、枇杷等树及花草。书房的北面，过一天井又是一个厅，此厅与第一个厅的格局相仿，有花窗有图门，屋梁很粗，上面盖有官印，至今仍存。此三厅为外宅，西边均有花墙，与内宅相隔。以这三个厅为标志物，每个厅的西南边均有横向连排两院，须经一提閤门，才可通内宅。第一个厅的东边，为一排厢房，南边原为一空场，植有四棵银杏树，



后遭火灾，只剩一棵至今尚存，已有300余年。西南边有三间朝南屋，穿过屋前花墙上的提闼门，是一方天井和三间朝南屋。西边花墙上还有一便门，进门又是四间朝南屋，这排房子在整个宅子里较矮。原堂屋均为图门，打开可与后面的院子相通。此天井的东南面，有相向而立、飞檐翘角的两个亭子间，再往西，则是一排坐西朝东九间厨房，一直通到北头。

经中间的花厅（即徐益修的书房），向西是一小花园，鹅卵石铺地，从小花园向后，经一条小巷，可到达第三进正屋。由花园向西进一提闼门，门里是一方天井，三间朝南屋，西边的花墙上有一门，进里又是一方天井，植有腊梅、桂花等树，四间朝南屋，堂屋的图门打开仍可与后面的院子相通，另有一圆门与后院相通。西边与厨房相连处有口明代水井。位于最北边的横向连排两院为正屋，为整个宅子最高处，意喻着代代高。此处的提闼门门檐有砖雕，门前有两只青石石鼓，门底有大青石做成的石座，石座里侧有凹槽，用来安装门槛。门槛很高，可分三次提起。此院内为一方青砖天井，三间朝南屋，地基要比天井高出二尺，需跨两级麻石台阶。经此院，过西边花墙上的八角门，又是一方天井，三间朝南屋，天井里有一口水井，再往西又是一小院，朝南三小间，朝东一大间，为厨房。从此院向西北，为一大花园，后废弃为菜园。除最后一排正屋，换姓为徐益修的老师管仲谦居住外，其余房屋仍为徐氏后裔所居。此宅为读书人的风水宝地，以前每逢州试便人满为患。据徐氏后人说，只要在此宅住过，哪怕是在厨房的条凳上睡上一夜，至少也能中个秀才。后住进此宅正台的管氏后人说，即便是现在，凡在此宅吃住过的都考取了大学。得祖先庇荫，徐氏代有人才出，从清代台湾道徐宗幹到近代国学大师徐益修，从持家理财的徐家会二奶奶到淮海实业银行经理徐赓起，从南通徐氏昆曲社到中国四大古琴家之一徐立孙的梅庵琴社，寺街徐氏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一门两进士”袁氏古宅

石桥头巷西边的24、25、27号，并排坐北朝南三个大门堂，东至礼巷，西至官地街，北至育婴堂，约占去石桥头巷北民居的一半面积，为南通城少有的明清连屋分居宅，至今已有500年历史。

石桥头袁氏古宅的创建人为袁九皋，字君鸣，明万历己丑年（1589）进士、明太仆寺少卿袁随的侄子。因其父袁观早逝，他和弟弟袁九功都由叔父袁随抚养教育成人。据明万历《通州志》记载，袁随，明嘉靖丙辰年（1556）进士，官至户部主事，监兑江西，惩恶扬善，做尽好事。

在叔父袁随的言传身教下，袁九皋、袁九功兄弟俩少时便勤奋好学，立志要成为袁随那样的清官。袁九皋后任御史。他先后巡察山西、浙江、河南、顺天四省，所到之处“搜奸剔弊，裕国安民”，对于贪占军马钱粮者，予以清除并处以重金罚款，所积罚金用于修筑边防，建造营堡。对贩运私盐的，同样严惩不怠，所积赎金，代盐民交纳了盐税。他曾三次上书，力谏减免煤税，终被皇帝所采纳。河南水灾泛滥，袁九皋悉数捐出赎金，拯救百姓。袁九皋万事从民出发，一切为民着想的为官之道，终不为当朝所容，与其叔父一样“遂悒悒而归，阅二岁卒，年六十有七”。

袁九功，岁贡司教，二十年清操如一日。袁氏叔侄为官一世，刚正不阿，深受家乡人民的爱戴。其勤奋好学的家风代代相传，袁氏古宅成为成才的摇篮，代有人才出。仅27号



一宅，就走出了众多骄子：袁运开，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袁运昌，中国林业部资源司总工程师，中国第一批林业资源航空测绘工程师；袁运甫，清华大学美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袁运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

南通对住宅修建历来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袁氏三宅七架梁的高屋就有几十间，是明清盛世时所建，在寺街一带首屈一指。



袁氏古宅之一

石桥头25号袁氏古宅，青石台阶，竹篾包镶门槛。虽经几个世纪的风雨，大门上彩漆描绘的秦叔宝、尉迟公门神，仍清晰可见。门堂的板壁用布、麻丝、油灰、油漆多种原料，经多道工序，精心油漆，已存世数百年。地下铺的青方砖虽经数代人进出磨损，仍青光蹭亮。原有的二门、提闼门均已遭拆除，也不见应有的石鼓、石础一类的进士宅标记，但进门后，仍能感觉到当年的不俗气势。经火巷中朝东的小门进

里，是一进三堂的格局。走过青砖铺地的天井，第一进是敞厅。敞厅比一般的民居要宽大得多，原是招待宾客的场所，中间不用隔板，用可以移动的屏风，或以装卸的隔扇可分割成三大间。现已改变了原来的用途，成了住家，屋脊上脊中的砖雕“福禄寿”三字清晰可辨。穿过敞厅后较狭的青砖天井，第二进是穿堂，此屋二梁上曾悬有乡谥金匾。走过穿堂，是一个大的青砖天井，衬托得正屋更显高大气派。正屋的梁柱特别粗大，地板地，木板壁，原来的门窗都是双层，里面一层是雕有“冰片梅”的木格，可糊棉纸，外屋是用薄得透光的贝壳做成的“明瓦”镶嵌，既透光又漂亮。天井的东边是水井，西边有一门通往后院及南面的书房、亭子间。书房和亭子间的天井为鹅卵石铺地，其间点缀着花草树木，亭子间四周是木质回廊环绕，幽静舒适。后院有厨房、柴草房、堆房、厢房。后院西边还有一圆门，通向又一座明三暗五的院落，这是又一处书房，此院的后门一直通往官地街巷。

东边的石桥头24号，为袁九皋进士老宅。麻石台阶，大门高而宽，门槛上用厚竹片包镶。一进大门就可看到一条一米宽的火巷，向北延伸，此巷可直通到育婴堂巷的后门。进火巷内朝东的提闷门，是一方大天井，天井里有一口井，一排朝南屋高于天井两级台阶，朝北屋则与天井打平。从这个院子往后，原有花园，还有几个小院落，最后的院落已连育婴堂巷。这个院子里的房门上麒麟送子图等明清遗存保存得很好。其火巷东侧原是花园，后在民国年间重起了一个宅院。

西边的石桥头27号，位于原麻千户角，规模稍小，是袁氏后人购买的明朝千户麻胜家的宅院，进行了修建。此宅为一进三堂。房屋高大宽敞，地板板壁，最让人称奇的是这座房子有双层的房门，可以装卸的外层房门上有大幅的木雕图案，遒劲古朴，为寺街民居中绝无仅有。其天井里原有花厅、花坛，还有不少镂空砖雕。一株百年紫藤更是稀有之物。



据这家主人说，他们的祖上是从老宅搬来的。老宅的大门在寺街93号，后门则已到育婴堂巷3号，那里是一座有着十多个天井，有着圆门、六角门等十多个庭院门的大宅院，除有不少明清住房、书房外，还有酒坊、柴房、厨房等，有五六十间之多，各宅院还有假山、花园、花厅。这是因为袁氏枝繁叶茂，人口增多，逐步在周边买房或扩建，现已占据了石桥头南边的大部分地方。

清道台梁缙卿宅

寺街2号，为清道台梁缙卿之宅。梁缙卿为安徽休宁人，贡生，到南通学典当生意。光绪年间捐海防，任浙江余姚知府，光绪道台。后打理典当。当年南大街半边街的典当全部为梁家所开，西门、兴仁、新地、六甲、海复镇均开有梁记典当。1915年，张謇开辟垦牧公司，梁缙卿亦有股份。当年梁缙卿还开有旅馆、南货、衣庄、茶食等店。梁缙卿于民国三年（1914）74岁时去世。

梁缙卿生有七个儿子、两个女儿。老大梁缙珊，为南通



清道台梁缙卿宅



典当工会首目。老二梁闻山，为通城小有名气的诗人。老三梁崇山，曾被任为五县督政员，赴任时，因轮船失事，英年早逝。老四梁静山。老五梁蒿山，又名梁朱明，解放前的民主律师，《世界知识》法律顾问，解放后任上海人民法院民庭庭长。老六梁义山，后改名梁衣衫，与赵丹共同成立“小小剧社”，出版《枫叶》旬刊，后在一次游泳中不幸身亡。老七梁志高，曾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前与姚溱一起离开新四军军部，幸免于难，后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梁崇山的长子梁廷钧，为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张君勱的秘书。次子梁廷锦为1937年的地下党员。老三梁廷锐为顾景敬的女婿，在南通博物苑工作，“文革”中不幸去世。

梁静山的长子梁廷铎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梁廷铎不仅拍摄了宣传计划生育的喜剧片《儿子、孙子和种子》，而且他执导的侦破片《蓝色档案》等注重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的动人形象。

梁廷钧的儿子范荣康（原名梁达）后为《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范荣康的长子梁左则是演艺圈的一大才子，由他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我爱我家》开了我国情景喜剧的先河，大型室内剧《闲人马大姐》是他继《中国餐馆》《一手托两家》之后的又一力作。次子梁天为著名影视演员、小品演员，共计出演电影作品《二子开店》《天生胆小》《顽主》《本命年》等15部，电视作品《海马歌舞厅》《我爱我家》《明德绣庄》等16部，还执导电视剧《太阳出世》《心想事成》等近10部。《天生胆小》获大众电影最佳男配角奖，第五届上海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最佳男主角奖。其女梁欢也长期活跃在影视界。三人一起被称为中国影视界的“三剑客”。范荣康的夫人湛容则为我国著名作家，其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太子村的秘密》分别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由她改编的电影《人到中年》先后获金鸡奖、文化部优

秀影片奖和百花奖。

梁缙卿原在冯旗杆巷有老宅，后因子女渐多，就托好友张謇之兄张謇为其觅一住所。据其后人说，此宅原为徐兰枝家所有，后被名为金阿根者所得。其时正好金阿根一夜豪赌，将寺街2号大宅输光，抵押给大生厂。于是张謇便让梁家以三千银洋购得此宅，并花一千银洋修缮一新，住进此宅。

此宅一进大门堂，就见一光绪年间的“通大夫第”的匾额，穿过青侧砖天井，是一提闼门，门前有两只青石石鼓，提闼门内一方青砖天井，三间朝南屋，穿过西边一个六角门可抵达另一天井、另一小院。此小院门前仍是一对石鼓、提闼门，小院里又是三间朝南屋。从此院北门出来，是青砖天井，北面为落屋、厨房、堆房。往东是一排五楼五底十间朝南的楼房，沿着狭长青砖天井朝东，近寺街又是一排小楼，四楼四底，至此经过大小六个天井，梁宅才算走遍。此宅大约是清末民初所建，开间较宽敞，也较高，一扫明宅的低矮之风，应为寺街有数的几幢较好建筑之一，可惜于1998年5月遭拆毁。



开明绅士管仲谦宅

寺街61号管宅，为南通管氏世代所居，历百年有余。据1913年张謇先生撰写的《管氏先坟记》所述：“管氏本贯武进，家华渡里。蒙元之季，名重和者迁如皋掘港场……传十五世，至文，始家于通……文座时，年八十有三。子步云……”管步云，原籍如皋，后迁南通，典原寺街徐氏的正台居住。



开明绅士管仲谦宅

如皋（如东）的管姓始于1357年，其时管仲的后裔第61代管重和（元代进士）从常州武进县携带家眷渡江迁徙而来，定居在掘港镇西何子弯南鸡鸣河畔，到掘港拓荒煮海，开拓盐业。管重和被如皋（如东）地区的管姓尊为始迁祖，作为如皋（如东）地区的管氏一世。600余年来繁衍生息，已延续25世。在重视家教的家风熏陶下，后世不负重望，文脉传承，其子孙出现了诸多名人志士，也使管姓成了如皋远近闻名的文化世家。

始迁南通的管步云之子管仲谦，字俭坤，为通州民间的开明绅士。与南通国学大师徐益修家为前后邻居。徐益修的父亲慕名请其为徐益修的启蒙老师，徐益修于1886年10岁时从管仲谦就读。

民国二年（1913），张謇、张謇兄弟捐款建设通州养老院时，管仲谦曾积极响应，助款为通州养老院添砖加瓦。管仲谦后应张謇之邀，出任张謇所创通州养老院的第一任院长（主任）三年，任劳任怨，深得张謇先生的信赖和赏识。民国五年（1916）十月，管仲谦去世后，张謇先生曾撰《祭管仲谦文》，忆管仲谦曰：“曾不恤其病躯，而任事逾三年之久，未尝一日以匱蹶咨予……呜呼！先生之于院务诚积劳而竭劬……先生之名常在，必不随形体而徂，而况克家有二子，彬彬文行，不仅能读书。此则先生之遗憾应无。”同年10月9日为之撰写挽词：“百辈老人肥，三年院长羸。病淹儿孝友，丧出众嗟咨。斜日林环屋，凉风菜满陂。典型荐庶物，惆望替人悲。”张謇还于10月20日在养老院为管仲谦开了追悼会。

管仲谦之子管国柱（石臣）系张謇的门生，是张謇在辛亥革命之后从所办的国文专修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毕业生，任张謇秘书。其名在《张謇全集》中有多处记载。

1926年秋天，张謇先生在南通逝世，管国柱参加了葬礼



并撰写挽联：“饮食教诲与家人何殊，梁木泰山门下泪；盛德大业称述可尽，箕裘弓冶后贤思。”以表沉痛哀悼。

管国光（砺冰），管仲谦之长子，张謇所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农科教员（农科大学教授）。管砺冰先生去世时，张謇先生撰写的挽联是：“曾辟培翹材，问学当年同弱弟；为明农教稼，课功助我启诸生。”

管霞起，管国光（砺冰）之子，张謇研究中心等单位1994年编辑出版《张謇全集》的第一副主编。

另管步云之孙管象山，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共地下交通站联络员，革命烈士。

祖传九世治疗程氏宅

寺街68号为南通著名的治疗疔疮的祖传医生程氏所居。程氏原籍江都，太平天国时，因避兵乱，其祖程玉岗举家迁至南通，居住于此已有100多年。

程家迁居南通后，原在西大街上开“溪记纱庄”，日军入侵后，将纱庄的栈房烧掉了，从此家道中落。虽如此，信佛的程家长辈仍遵循祖训，始终以祖传秘方免费为人治疗疔疮，治愈病人无数，甚得好评。程玉岗去世时，受惠的老百姓自发地办路祭，用毛竹、绸缎、棉布扎制的楼库和真的楼房一般大小，上面能跑人。除了“三七”、“五七”、“六七”祭奠必由家人自备外，每天都有人送施食，天天都有人请和尚念经，纪念这位妙手回春的民间神医。

程氏医治疗疮已有200余年历史。疔疮是一种发于颜面及手足等部位的疮疖，根深形小，其状如钉，故名，多由邪热毒盛所致。此病发展迅速，如见疮顶突然黑陷，人神志昏迷、高热、气喘、恶心、呕吐时，则为疔毒走黄，属危候。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旧社会，疔疮是一种难治之症。程氏经200余年的钻研，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对常见的颜面部疔疮、红丝疔、蛇头疔等，内治以清热解毒为主。外治初期宜箍毒消肿，中期宜提脓祛腐，配以金针治疗，后期宜生肌收口。疔疮走黄时，则宜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除此之外，程氏还传有收“丁儿福”（腮腺炎）、收火丹的秘方以及治疯狗咬伤的秘方。据说只要用程氏的秘方和着烂泥，在疯狗咬过的伤



口处不断滚动，就能知道是哪一种疯狗咬的，服下程氏开的几剂中药，会排出像血一样的小便。



程香君九代治疔世家

拥有如此行之有效秘方的程氏家族，代有传人，程香君即为程氏第七代传人。程香君1911年出生，从小就喜欢跟着爷爷、姑母为人治病，长辈也将她作为传承人，悉心指点，程香君很小就成为集程氏秘方大全于一身的民间治疮疖名医。她只要一块上好陈墨、一支毛笔就能很神奇地收“丁儿福”。收“丁儿福”一定要在有太阳的日子，磨好墨后，用毛笔蘸上墨汁，在患处由外向里画圈圈，画的时候嘴里还念着咒语（据其后人分析，实际是为了控制时间），然后再将涂抹过患处的墨笔到树上或柱子上画圈圈，意为将此病转移到树上去，随即患者痊愈。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树龄小的树竟会因此而枯死。因为是免费为人治病，秘方中的药引子，基本都是

自己采集。为了秘方中的几味药引子，程香君不辞辛劳，有时下乡到乱坟岗中，寻觅棺材里浸泡着尸水的石灰包；有时到庙里，从菩萨身上刮发黑的铜绿。原来治疗疮要在背上扎金针，有一定的危险，她通过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换了较安全的部位，取得同样的效果。经一番努力，她的医术不断精进，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每天都能治愈四五个病人。程香君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家族医术传承事业，终身未婚嫁。

1958年，政府发掘民间秘方，程香君也响应号召，将祖传秘方献给了政府，并进了公社医院，正式为民办疮疖。

“文革”期间，程香君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行医的资格。一天半夜，有人敲门，要程香君救救她女儿的命。这人的女儿生了疔疮，在医院住院，挂了几天水，病情却越来越重，医院已发了病危通知。在来人的苦苦哀求下，程香君到医院一看，那女孩患的是“人中疔”，眼睛鼻子都肿平了，人已神智昏迷，疔疮已“走黄”。程香君也感到很为难：治吧，风险很大，连正规医院都回绝了；不治，眼睁睁看着花季少女就要命丧黄泉。终于，治病救人的祖训占了上风，她决定冒险一试。她让病人西药照用，让几个家属围住病床边，掩护她为病人诊断、扎金针。随后开了吃的中药，留了搽的祖传秘方。第二天晚上，让已得其真传的侄子程裕宗到医院又扎了两针，这女孩过了两天脸就消了肿。程香君从死亡线上又救回了一条生命。

随着年龄的增长，程香君开始有计划地将程氏的秘方传给了侄子程裕宗。1994年，程香君以83岁的高龄去世。如今，程裕宗对祖传秘方也很有研究。他才上高中时就为一个手背肿得很高的病人治愈了“八卦疔”。后在程香君的指导下，掌握了全部的程氏祖传秘方，不但能治“蛇头疔”、“蛇眼疔”、“蛇肚疔”，还能治“泡疔”、“红丝疔”等所有的疔疮。程裕宗的女儿也掌握了这一医术。



御医林氏中医世家

施家田1号住着林氏中医世家，林氏从1938年由十里坊迁于此。

林氏擅长治疗内、外、伤科，相传至林光武已历六世，届200年。其二世林京华为清宫廷五品御医。林京华自幼从其父学医，精心钻研，博采众方，自成一家，尤其擅长柳枝接骨及内外疑难杂症。其医治疑难杂症的轶事，在民间流传甚多。

有一村妇，盼子心切，怀胎六月时，竟自感觉听到胎儿哭声，村妇疑惑不解，遂至林京华处诊治。林老先生经切脉后，将其带来的一串铜钱扯断，扔了一地。村妇急忙俯身拾钱，边拾边哭说：“这点钱还是借来的，老先生嫌钱少不给看就算了，何必把钱掷了一地呢？”待村妇将散落的钱，一枚一枚拾完直腰时，只见林老先生笑容满面，关切地问她：

“你还听到腹中孩子的哭声吗？”妇人定神一听，惊喜地发现，哭声没有了。林京华告诉她：“这病源于你盼子心切，刚才的举动，是为了抑制你原先的精神感觉，现在病已治好，你把钱带回去还给人家吧。”

外县有一病妇，长期因食欲不振，大便燥结艰行，身体日渐瘦弱，自认为非服补益药不足以治病。日久，虽经多方诊治，病情毫无改善。后慕名求医于林京华。林京华切脉察苔后，根据她的要求，很果断地开了三帖补益药方，每帖药中有连壳桂圆一斤，嘱咐病妇亲手选用无破壳的桂圆，放入瓦罐中用文火煎煮，绝不能煎破桂圆壳子，如发现破了，就要重

换一斤再煎，然后取无破壳桂圆汤煎药内服。病妇见开的均是补益之药，拜谢而归，遵嘱煎药。服药后大便畅行，食欲大振。妇人在钦佩之余向林京华请教：同是补益药，为何这三帖就见效？林京华坦露天机：“方中桂圆连壳煎汤代水用，是取桂元壳外所裹的大黄粉一药也，从而起‘补中寓泻’之功，而并非取于桂圆肉之滋补。”那妇人听后才恍然大悟。

林京华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民间还流传着林京华追船救人一命的故事。一年炎夏，有一木船路过西十里坊镇河下，一船工身穿破棉袄在烈日下登岸。路人惊奇问之，船工说：“我身上一阵热一阵寒，加上嘴上又生了一疮，疼痛难熬，路过这里，想请名医林老先生帮我诊治一下。”船工在路人的指点下来到林京华的诊所，经林老先生仔细察看后，发现此船工患的是疮疖中危险的疔疮，又是疔疮中最危险的“人中疔”，而且有走散之势。他看到如此险重的病情，就要将船工留下治疗。谁知船主怕耽误自己发财，不顾林老先生的阻拦，不顾船工死活，竟然将船开走了。船开走后，林老先生仍惦记着那船工的安危，思虑再三，他向一大群候诊的病人打过招呼，嘱家人用独轮小车载着他，亲自去追船。一直追了几里路，直至唐家闸附近才追上了木船，只见背纤的重病船工身体摇晃欲倒。林老先生大声疾呼：“赶快停船！”船主闻声，探身一看，林老先生亲自追来，再一看那船工已倒在地下了，方知船工病情确实严重，忙吩咐停船。老先生当即嘱家人将船工扶抱到小车上，一路赶回诊处，并立即给予外敷、针刺、服药等一系列精心治疗，还将船工安排在自己家里住宿，饮食上也进行适当调节，终于将这位患“人中疔”的危重病人从阎王面前拉了回来，而且分文不收。获救的船工感激涕零，趴下就叩头，感谢老先生的救命之恩。

晚年的林京华更是声誉远播。清光绪三年（1877）奉诏



晋京，为御医。由于医术高超，醇亲王曾亲书横匾“徙柳折肱”和“青炉久炼长生药，丹鼎新添不老方”赐赠。

林京华的儿子林芝祥、林云涛均为名医，其孙子林桢的医名更是名动通城。据说有一农民被水牛角戳穿了肚皮，肠子都流了出来，疼痛难忍，惊恐万分，其家人用门板抬着他，急赶到林家，请林先生诊治。林桢见此血肉模糊之惨状，一时也无从下手。他立即吩咐家人，将患者放稳在芦苇帐上，先用淡盐水将肠子及创口洗净，再请两人一人一头，搭着芦苇帐轻轻摇动，让流出的肠子缓缓地归于腹中，使其自然复位，然后将肚皮缝合，再搽上林京华留传下来的秘方，一月后就痊愈了。

林桢之后又传有林聚成、林聚成之子林光武，共六代，均在中医上有所建树。

林氏中医世家原居十里坊，有屋四五十间，正屋二梁上高悬清代醇亲王亲书手赠“徙柳折肱”的黄杨木金字大匾，



御医林氏宅

还有“青炉久炼长生药，丹鼎新添不老方”泥金板对联一副。室内均为高质量的红木家具、历代名人书画及古玩等文物。1938年农历四月初五日，这座大宅子与周围约300多户人家，被日军使用烧夷弹焚为平地，那金匾、对联也都灰飞烟灭。一家人四分五散，各奔生路。林光武一房辗转来到街老街区，在施家田1号安了家。此宅大门两边有麒麟砖雕各一块，大门内为青砖铺地，朝南三间正屋，朝东还有一排花厅，南边围墙上饰有青瓦滴水。东边为一八角门，隔条火巷是一排朝西的三间屋，为厨房、堆房。堂屋正中供奉着身穿清朝五品官服的林京华的雕像。据其家人说，当年无锡一捏泥人的著名艺人患疑难之症，慕名来通州请林京华诊治，不久痊愈。他满怀感激之情，与林京华对面而坐，很快捏成此像，惟妙惟肖。原来此像身子为木头的，关节可活动，可以逢季换衣服，后像身被日本鬼子所毁，请人重塑了现在这个泥身。林京华、林桢二人的医术轶事曾于1957年、1962年、1979年分别由《江苏中医》《南通日报》等刊载，并将二人收录进《江苏医人志》一书。



明保天官第

胡家园西端，武进士易崑宅之西的胡家园4、5、6、9、10号原是一个大宅子，为明代保天官宅，因此被称为“天官第”。“天官”为官名，是“天官冢宰”的简称。后世亦以天官为吏部的通称。此处的“保天官第”与以上不同，此宅的原主人是蒙古族人，姓保；保姓为全国罕见之赐姓，“天官”则是明太祖所封。



保天官第原址

保氏家族第一世祖罕，为元末进士帖木儿之后，历官元朝丞相，以国老奉使，尽瘁于常州府江阴县。单传第二世祖元善，官至元帅，出镇建宁后，以延平一带依军受檄，东南海上迤邐数千里，公率孤军御强虏，全闽赖以完聚，民甚德之。后来明师入闽，旧部尽数伏诛。明太祖闻罕之后——元善文武才干，念其平寇有功，甚有万民俱保，下旨免诛，传书招抚，赐姓“保”，封“天官”。明太祖要招其上京，他不去，流寓于通州西垣荒田，其始辑家谱焉。

胡家园的保天官第应为保氏流寓通州的始迁祖故居。后周显德四年（957）通州建城，在今南通市环城马路之内，“城周围六里七十步”为通州城。“通州西垣”应不出和平桥，垣，泛指墙。保天官宅与胡长龄宅相隔不远，“通州西垣”与“州治西”应为同一方位。此宅南从胡家园巷起，北至北城墙止，确符合通州西垣方位，且此处当年较为偏僻，规模也较符合当年保天官的身份。此宅原占地四亩，有明代青砖小瓦的房屋几十间，青砖铺地的大小天井近十个，天井里还点缀着栽有牡丹、兰草的花坛和腊梅、桂花、枇杷、香橼等树木。后面有一个大花园。花园内有楼台亭阁吟舫轩，假山树木，“课花书屋”。穿园而过的仓河水在此处最宽达十米，河上架有曲桥将南北河岸相连，仓河北为一片翠竹林，郁郁葱葱一直绵延到北城脚。此景在保氏后裔的诗文中常见描绘。从现存的明代建筑来看，也依稀可找出当年的风貌。提闾门前的一对青石石鼓历经五六百年风霜，纹饰已模糊不清，明代特有的格子门却保存完好。只有寺街一带的老住户知此宅为保天官第，这也和保氏流寓来通时不事张扬的个性相符。西大街的保家野大门等处应是其后裔后来所建，现这些地方都已烟消灰灭，而保家老宅仍存于寺街。

600多年来，保氏遵循“孝友家声，诗书门第”的家训，勉励后人勤奋学习，走“腹有诗书气自华，胸藏韬略才偏



壮”之路。保姓人丁兴旺，名声大振，成为通州的大族，以致民间将保氏后代住宅所在的巷子都以保姓为巷名，如大保家巷、小保家巷、东保家野大门、保家野大门、保中野大门、保西野大门，保姓巷名达六条之多。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上，竟有30位保姓人，分列忠节、宦绩、武功、义行等传，其中文苑传就有14人。在《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这部权威著作中，全国保姓美术家就有五位，明代的保甸，清代的保时、保学灏、保希贤、保逢泰，均善于书画、诗文，全都出自南通保氏家族。1921年、1924年，保君健曾任中国驻英吉利国大使馆惠灵顿领事馆、温哥华领事馆领事。1925年，保君健任英吉利国大使馆雪梨总领事馆总领事。当代还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保铮、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保彬等。

祖孙期颐长寿园

寺街119号为远近闻名的“一门两期颐，祖孙皆百岁”的长寿之家。此院占地七分，原为胡状元家的产业，后作为陪嫁随女方赠予施姓，为平民教育家施仁政、革命烈士史白的故居。

此院的风水特别好。右依晨钟暮鼓、竖着如椽巨笔般宝塔的天宁寺和书声琅琅的实验小学，后枕碧波荡漾的北濠河。左邻出过古代进士、现代画家，后邻是独占鳌头的清代状元。唯独这家世代与仕途无缘，却占尽天地间最宝贵、历代皇帝上下求索而不得的一个“寿”字。院中除出过两位百岁老人外，如今居住于此的史白的弟弟施馥寿也已96岁，还能不戴眼镜看《江海晚报》，除偶患小疾外，身体健康。故邻里皆称此院为“寿园”。

据施家祖上说，每日清晨，太阳一出，就将位于东南方的光孝塔塔影投进此宅，塔尖恰指向一排朝南屋的西边一间，故此室出人瑞。1936年时，住在此屋的施仁政的母亲易聚奎寿至一百，几乎全城人皆来吃寿面，全省、全国皆知晓。因为在当时，年过七十古来稀。为此，江苏省政府送来红底金字的匾额，“女中人瑞”四个字是当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所书；国民政府送来的匾额，黑底金字，“懿德遐龄”四个字是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所书。韩紫石等乡贤均有墨宝相贺。当时施仁政在景德镇订烧了一窑百岁碗，上有白底红字“施母易太夫人百龄期颐”。



长寿园

来贺寿者，除了吃长寿面外，均喜气洋洋持百岁碗而归。

2002年，同样住在此屋的施仁政的大女儿、史白烈士的姐姐施致纯寿至104。施致纯生于19世纪末，经历了完整的20世纪，又豪情满怀地跨进了21世纪，是位连跨三个世纪的女中人瑞。施致纯是南通女师第二届毕业生，原在女师当教师，后到寺街小学（即养正小学）当校长，从教40余载，桃李遍天下。教龄长、学生多，又欣逢盛世，每年为她庆贺生日的学生络绎不绝，家人单为她烧制的百岁碗就有三批。第一批百岁碗上是她百岁生日时亲手所书家训“勤俭诚恒”；第二批百岁碗上是名画家范曾书赠的“无量寿”；第三批百岁碗上是时已104岁的施致纯亲手所书的“寿”和南通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陈云所书的“三世纪寿星”。三批百岁碗，才使前来探望寿星施致纯的人们都能将长寿的祝福带回家。

此宅一排朝南的明三暗五的房子，砖木结构，有子梁，板壁上方有月亮状的线纹，原为木头格子门窗，外有走廊，

是典型的明代建筑。屋前一方青砖天井，东边一条青砖甬道直达大门，甬道的东边为一排三间朝西屋，剩下的大片土地原是一片瓦砾场。第一位百岁老人易聚奎从三余头农家嫁过来后，拐着三寸金莲，日夜清理瓦砾，改良土壤，在西墙边植上一丛翠竹，古井旁种上一棵核桃，窗户前栽上一棵杏树，院中间移来一棵柿树，剩下的土地上全撒下从娘家带来的菜籽，于是这座庭院便有了与众不同的乡村田园风味。其后代勤劳和睦，继承家风，同心协力地将庭院拾掇成深藏于市中心的浓缩的田园风光。这里四季有花，三季有果，季季有菜，活挑现摘即炒，清新鲜嫩，美不堪言。如此的绿色家园营造出冬暖夏凉的奇特小气候：酷暑，在浓郁绿荫的蔽掩下，院内比正常气温凉爽2~3度；冬日，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又会暖和2~3度。更重要的是，施家人在与大自然和平相处的绿色家园里破译了亘古难解的长寿密码，高寿之人悄然递增，成为长寿之乡的长寿之家。



徐赓起的城砖楼

徐赓起故居位于武胜巷17号、19号的小巷深处，是南通现存最为典雅的精美古宅之一。

徐赓起是台湾道台徐宗幹的后裔，是南通市第一位留美学生，南通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民国初期，民风未开，赴美求学需乘一个多月的海轮。徐赓起虽为独子，其母仍坚持送儿子赴美深造。徐赓起与张謇先生的儿子张孝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同学。1919年徐赓起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深得张謇器重。江苏淮海实业银行创办后，张孝若任总经理，业务骨干多为自欧美学成归国的人士。张孝若事务繁忙，聘任徐赓起为该行协理，实由徐赓起负责一般行务。民国十六年（1927），徐赓起接任南通商会，长期担任南通银行、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要职，被称为张謇后期的四位后起之秀之一。

1930年以后，徐赓起经同学介绍去上海，任旧中央银行经济研究所专门委员，虽常住上海，仍兼顾维持商会善后事宜。抗战开始，为避敌伪骚扰，迁香港及上海租界。在国民政府西迁后，徐赓起在上海租界参加有助于中央银行的爱国行动。1945年8月后，仍恢复在中央银行的工作。解放以后，徐赓起往来南通、上海之间，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公益活动，受到地方上的尊重。他数次将自购、家藏的文物古董、精美瓷器，包括林则徐写给其祖先徐宗幹的字幅，捐献给南通博物院。1958年“大跃进”年代，广大妇女走出家门，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幼儿园也随之诞生。创办阶段，没有房舍，身为南通市

政协委员、市工商界爱国知名人士的徐赓起慷慨献出五栋正房和一排边房，共20间，作为城中幼儿园的园舍。

此处的徐宅是清代咸丰年以前的建筑，用料考究，建工精巧，堪称南通第一。徐宅为东西两宅六庭院的大宅子。17号的徐宅是一幢东西两宅有五个庭院近30间房屋的大宅。东宅大三进均为三间七架梁屋，宽敞高大，不仅窗格雕花，前墙也有雕刻。天井中青砖铺地，花坛中长有名贵的花草。大三进为徐赓起全家所居住。西宅为小三进，第一进为亭台式的中式书房，第二进专门放置大量古画古玩藏品。这小三进雕花窗户，屋前花园，鹅卵石铺地，有玲珑假山、雕窗古亭。该宅当年室内曾有全套红木家具，堪称是一座私人博物馆。大三进和小三进之间有曲折回廊相连，雨天都不湿脚。



徐赓起故居



徐宅现19号的位置，原来为一花园，后在此处建一座用明城砖砌成的两层小楼，美观坚固，是典型的民国时期建筑。民国时期的建筑何来明城砖？说来话长。南通在后周显德四年（957）由南唐静海制置巡检副使王德麟“筑壤而高土，凿地而深池”，修筑了土城。显德六年在土城上加砌城砖，将城墙改造成永久性的军事防御设施。明时倭寇频频入侵，因而通州在明代中、后期对城防建筑特别重视，曾对城墙进行大规模的修葺，以至后来南通的城墙城砖大多为明城砖。民国十年（1921），南通县自治会议定拆除东、西、南三面的城墙（东城门南有一段城墙，因上有振秀亭而未拆）和瓮城，只保留三座城门，现在的环城马路即为拆城墙后用原城墙址或城根地所建。当时，所拆城砖均予售出，据1921年6月26日《通海新报》载，拆城墙时“售卖城砖，极形忙碌，整块砖每百块计银三元，碎断砖每箩计银二角六分”。开始，拆城由县自治会办理，后把城基城壕放领权交县教育局，所收款作教育经费用。这些城砖既长又宽，用金属敲击，砖体发出清脆的声音，是质量上乘、保存完好的明古城砖。徐赓起花重金购大量明城砖建起了这座两层的楼房，故民间称其为明城砖楼。此楼在张謇时代几幢中西合璧的建筑之后所建，风格相近。

此楼墙体全部为明城砖，朝南一面，在城砖外加了一层水泥，在水泥上嵌细木条隔成小青砖形状；内部却为西式结构。此楼当中是楼梯间，上下一式，均东西各一室，室内天花吊顶，地板地，玻璃花窗，楼上的走廊为木板铺就，铸铁雕花护栏。底层西边一间还装有西式壁炉，壁炉外原有铸铁饰品。楼下走廊为国外进口水泥所铺，至今没有任何剥落。绿树丛中青砖黛瓦的城砖楼在前面几排明清古平房的衬托下，甚为典雅别致。此楼曾为徐赓起接待客人的场所，曾藏有大量古董字画。

周公馆·糯米楼

柳家巷5号在1920年商会搬迁后，被海门诗人周家禄家买去，建成了周公馆，又名“从好庐”，成为通海诗人聚会之处。

周家禄，字彦升，海门厅川港镇人。19岁中秀才，22岁为禀生，25岁经三院会试成优贡，再送朝考列上等，引见光绪帝，授同知衔候补训导，经多年才实授江浦县学训导（从八品），后历丹徒、太仓、宜兴、奉贤等训导，皆不长，但头衔却是从六品同知。

周家禄游幕甚多。光绪七年（1881）在登州淮军名将、广东水师提督、帮办山东防务吴长庆幕中，与张謇同为庆军重要参谋。次年，与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文牍的顾延卿以及同僚张謇、朱铭盘一道赴朝鲜，参与协助处理中日朝之间的外交事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应邀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幕。袁亦不时请教周家禄，有师生之谊。

周家禄创办了南通第一所新式学校白华中西书塾。学塾取名“白华”，主要是为了纪念当地人皆称颂的孝子费洪周，取《诗经·小雅》“白华之计”含义，要求莘莘学子修身洁行，于世有用。学塾内附设“费孝子祠”，目的在于勸勉师生上进。学塾开设英、俄、日语课，开一代风气。白华学塾为南通办学的开端，在南通教育发展史上有其重要位置，影响深远。

周家禄擅古文辞，潜心经史，尤好考证校勘之学，著述



甚丰。周公馆内曾存放大量周家禄的诗稿及周家禄与当时政府官员的往来函件等。周家禄的诗集《寿恺堂集》是由其子周坦在此整理编辑出版的。其中令人瞩目的是《晋书校勘记》5卷，1978年中华书局收入标点本《晋书》，斯为不朽。

周家禄子周坦，于辛亥革命通州民政处设在柳家巷时，任典狱课课长，是总司令张謇的亲信，遇有机要事情，张謇都要和他商量。周坦也是南通总商会的实权人物。后周坦由张謇荐至黑龙江省实授知县，复主理盐政，累官至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运销。周坦之子周孝伯，抗日战争初为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是上海学潮领导人之一，后任国民立法委员。1949年至1950年在台湾、香港地区从事反蒋活动（据说与中共有联系），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周坦之女是上



周公馆·糯米楼

海有名的律师。

“从好庐”为周坦当盐官后购下顾姓老屋翻新而成的花园楼房。原为黑漆大门，门前有两只石狮子，进入花厅的朝东边门旁有雕花石鼓。清代花厅一进三间，玻璃门窗，穿过花厅是一座小花园。园中植有桂花、腊梅、紫藤、红薇等花木。小花园后为一座三上三下的两层西式洋楼，20世纪20年代所建，因建此楼时用加了糯米粥的石灰砌墙，强度更大，更具耐水性，十分结实，如此做法既奢侈更为南通所未见，引起轰动，故经民间渲染后，称其为“糯米楼”，延续至今。此楼内为西式装潢，方形门窗，回旋式楼梯，地板缝拼接得十分考究；室内有天花板、板壁，并配有壁橱、壁炉等。楼后原有个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大花园，泥石堆山，古树葱郁，并有玻璃暖房栽植奇花异草。



李公馆·将军府

官地街30号原为粤军司令、虎门要塞司令、北洋军阀时期《将军府将军衔制——将军名录》有载的李炳荣将军府第——李公馆。

李炳荣又名李燮丞，是当时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部下，1918年与蒋介石共过事，1919年叶挺曾任他的作战参谋，1922年孙中山电请他为缓解孙中山与陈炯明矛盾的调解人。虽说李炳荣身为粤军司令，沉浮于军阀的混战之中，但他恪守做人的底线，也曾做过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

李炳荣与陈炯明的渊源极深。1917年11月，孙中山组建援闽粤军，陈炯明为总司令，李炳荣为第一支队司令；1918年护法战争时，陈炯明为粤赣闽边防督办兼援闽粤军总司令，李炳荣为第三支队长。

1918年，孙中山电召蒋介石到汕头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谋划攻闽计划。7月9日，蒋介石拟订《第二期作战计划》。7月13日，孙中山发电陈炯明、蒋介石，令其按计划冒险进攻。此时，李炳荣任第一支队司令，驻守右翼阵地大埔。因双方力量悬殊，李炳荣失守大埔，致使该计划无法实行。30日，蒋介石奉陈炯明之命，指挥炮兵夺回狮子口，反攻大埔。李炳荣冒着猛烈的炮火，率军激战三昼夜，终将大埔重新收复。

1919年，李炳荣任粤军司令。在职期间，李炳荣看到粤军士兵军纪不严，时有扰民事件发生，极希望能有提高部队

素质的良策。恰在此时，从军校失学的叶挺回到广东，于福建漳州参加粤军。司令李炳荣看中这位人才，提拔叶挺担任作战参谋。叶挺根据李炳荣的要求，与同为参谋的邓演达就该部队的教育与练兵方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李炳荣大为赞赏，并逐一予以采纳。1920年，农历二月十七日下午，安海商会会长蔡德远及陈清机、吕渭生找到李炳荣，哭诉士兵抢掠商铺的行为，希望李炳荣能制止其属下士兵的横行。李炳荣闻讯拍案而起，与叶挺等人一起，以此为突破口，对部队进行集中学习，严整军纪，还地方百姓一方平安。从此，在治军有方的粤军司令李炳荣的辖区，鲜见扰民，粤军深得百姓的拥护。

1920年，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7月，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李炳荣为第三支队粤军司令。

1921年，陈炯明欲率军平桂，主张桂人治桂。在陈炯明发难之前，李炳荣得知了陈炯明的秘密计划，为了避免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他立即派道南晋省，深夜到军署，把陈炯明欲平桂的机密诉说了。可惜听者很不以为然，一场本该避免的战争还是发生了，辜负了李炳荣的一番苦心。

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的部将叶举率部轰击观音山总统府。师长洪兆麟、关国雄，旅长李炳荣、熊略、邓本殷、翁式亮，司令杨坤如、钟景棠等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离粤”、“停止北伐”，以“南北妥协”、“联省自治”来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

6月17日，孙中山调遣北洋舰队，并命令北伐军回师救援。7月初北伐军回师，集中于粤赣边境的南雄，分三路攻粤，直指广州。

驻守韶关的粤军有翁式亮、陈炯光、杨坤如等各部约三十营，后李炳荣、李云复、黄强等部又率兵二十余营增援，以翁式亮为前线总指挥，粤军迎战得胜。



孙中山即致函汤廷光，约请魏邦平、李炳荣、洪兆麟、熊略五人出任调和。7月10日，魏邦平、汤廷光、洪兆麟、熊略、李炳荣五人集会于海珠海军总部，以广州市民提出的三大纲领为议和原则，并用函通知孙、叶两方。次日（11日），魏邦平、李炳荣、汤廷光、黄维藩、何经诒等五人又齐集于海珠，转达叶举、孙中山双方的答复。后因双方各走极端，徒使调和人为难，于是宣告终会，并将经过情形由汤、魏、熊、李、洪五人发一通告，遂无结果而散。

在此期间，李炳荣虽跟随陈炯明身处与孙中山对立的立场，仍还是挽救了孙中山的侍从副官肖芹的性命。

7月9日傍晚，孙中山在永丰舰召集军政要员开会，组建讨逆军总司令部，孙中山亲手草拟讨逆檄文，并将此重要文件交跟随其十多年的亲信侍从副官肖芹秘密带回广州城内，组织印刷张贴。肖芹设法混入城内，联络同志印刷张贴檄文后，即被粤军逮捕。幸好孙中山的檄文原稿没被搜到。虽然没有证据，肖芹仍被送到广州白云山监狱，与廖仲凯关押在一起。肖芹的妻子闻讯找到江苏同乡（应为江苏同乡之子）、当时的虎门要塞司令李炳荣求助。李炳荣对肖芹是孙中山侍从副官的身份心知肚明，但他反对没有证据乱抓人，再加上又是同乡相求，于是找到陈炯明，为其求情。陈炯明平时很倚重李炳荣，为了笼络李炳荣，再加上查无实据，本有性命之危的肖芹得以释放。

8月9日，孙中山得到广州北伐军战败的确实报告，同一天又从密报得知陈炯明袭击永丰舰的计划。孙中山腹背受敌，知战局必危，有损无益，遂议决离粤赴沪之计。

1923年年初，孙中山通电讨陈，命许崇智进攻广州。孙中山雇佣的滇桂军和吴佩孚支持的沈鸿英军队由西江蜂涌入粤。

1月初，滇桂军攻击肇庆，进逼广州。陈炯明电请魏邦平

回广州共支危局，并派李炳荣为省会保安司令，留守广州。

在滇军、桂军的支持下，陈炯明被逐出广州，退往惠州。于1月15日宣布下野。

1924年，北洋政府授李炳荣将军衔（1924110），李炳荣被载入北洋军阀时期《将军府将军衔制——将军名录》。

早在1912年，原籍湖南长沙的李炳荣就听从母亲（其母为道光二年进士、湖南布政使王藻的后代）要回故乡南通的要求，让妻子携儿带女在母亲娘家四步井王家附近租房住下。当年，李炳荣在官地街的路西盖新宅，人称李公馆。此宅围墙极高且加脊，坐北朝南的三进极其高大宽敞的瓦屋，两边由雕花围栏的走廊将三个带花坛的青砖天井、三进代高的房屋相连接。东边除朝南三间会客室外，背向还有两间朝北房，另有一溜坐东朝西的佣人房，据说其家中佣人极多。西边的跨院里有大花园，还有一排三间天花地板、四周有雕花围栏的亭子间。亭子间的后天井里，很特别地栽着南通极罕见的两棵芭蕉树，唯此才流露出一位将军对曾待过的南国的一丝眷恋。过此院后面还有一跨院，另有朝南屋、朝西屋各三间。除这幢房屋外，李炳荣在官地街的路东还盖有两层楼房一幢，砖木结构，铸铁雕花栏杆，极为精致。李炳荣原有六个子女，除两个儿子夭折外，四个女儿，一个在台湾，一个在上海，两个在南通。1923年厌倦战场硝烟的李炳荣辞职回到南通。辞职后的李炳荣既没有经济来源，又要维持一大家的开销，只得陆续将小楼、公馆变卖。1944年，李公馆卖给了通隧火柴厂的老板习家（即后为全国工商联委员、省民建常委、南通民建主席、市人大副主任的习尔刚家），李炳荣在岳家巷另购房居住。李公馆在建华威园时遭拆迁，路的那幢小楼现为旅馆，但这一带的老人仍习惯称之为李公馆。



革命遗址·烈士故居

——传承爱国主义的基地

寺街，珍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遗址和烈士故居。革命的星星之火，曾从这里点燃而后燎原于江海大地。

寺街，一块新中国成立的坚实奠基石，一个理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反袁志士沙淦

沙淦，字宝琛，号愤愤，南通县兴仁镇谢桥村人（李观音堂）。光绪十一年（1885）生。稍长，就读于瑞芝桥徐雨亭老先生门下，读四书五经，每教一节，次日即能背诵如流，并能按规定格式撰写八股文，颇得老师赞许。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沙淦进了南通第一高等小学校（即城北高等小学），成绩名列前茅，为该校高材生。光绪

三十一年(1905)沙淦20岁时,去日本留学,从成城警监学校肄业。

其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进行反清民主革命活动。沙淦有志于此已久,当即加入同盟会,联络海内外志士,致力于盟旨的实现。

不久,沙淦回国。他积极著书、办报,宣传革命,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事为清室所不容,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曾下令缉捕。沙淦为避锋芒,化装北渡,于阜宁、南通等地基督学校执教。他还与陈士英等人在上海组织“侠团”,创办杂志《社会世界》,沙淦自任主编,以“联络同志,研究学艺,铲除强权,改进社会,以及促进社会大同,人类平等”为宗旨。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沙淦积极响应。他离校赴沪,在上海鹿鸣旅馆组织敢死队,围攻上海兵工制造厂。辛亥革命告成,沙淦任国民党上海分部秘书长兼江北副招讨使及沪都督参谋。后参加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他主张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制度,并在上海各报公开发表《致袁世凯书》,以尖锐的文字敦促袁世凯早开国会,建立真正



王家坝西巷沙淦就义处



的民主共和国。沙淦搜集袁世凯在各地爪牙的资料，编成《土皇帝》一书印行。沙淦还对南通地方上的恶势力加以揭露。沙淦的革命举动引来了袁世凯及其爪牙的迫害，社会党成立不到十天，数十个党支部便被袁氏政府查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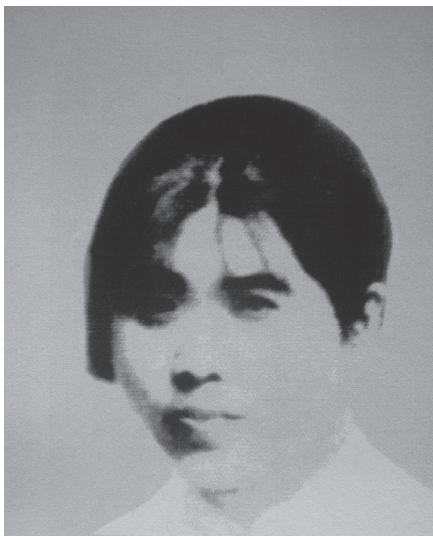
1913年7月，为支持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沙淦回到南通筹募经费。他以红十字会野战医院名义成立劝募团，带领群众于8月10日到南通商会劝募。由于他所著《土皇帝》一书触犯了南通的缙绅势力，商会表面允募，暗地里却密通军队，沙淦一行遂于当夜被捕。袁世凯获悉此事，甚为开心，电告南通“格杀”，未待审讯就宣判死刑。8月11日，沙淦被押赴城北王家坝刑场时，身着长衫，气宇轩昂，从容就义，年仅28岁。见者无不黯然挥泪。

北伐战争结束的时候，沙淦就义已经14年了，邑人犹悲沙烈士之死，由南通县国民党人及烈士旧友发起筹备，为沙淦建碑修墓，又得国民党元老钮永健（惕生）、蔡元培等赞助，邑人亦踊跃捐助，于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在狼山建成纪念碑亭。李观音堂烈士墓也同时重新修建，墓门有石刻“杀身成仁”、“是非今定”八个字的匾额。每值清明，邑人必前往祭扫，沙淦为国捐躯的英名，永垂南通史册。

妇女部长朱文英

朱文英，1910年4月13日生于扬州，后迁居南通。父亲经常失业，一家六口靠母亲替人家做针线、洗衣服、当帮工度日。虽然家庭贫寒，但父母仍省吃俭用供朱文英上学。朱文英学习非常刻苦、勤奋，从小学到在南通女子师范读至初中三年级止，朱文英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朱文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开始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她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朱文英为学校工友开办夜校，传播革命思想，有时她还把革命同志带到自己家中开会、印发文件和传单，成为女师学



朱文英

生革命团体的主要骨干和南通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朱文英于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南通女师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共青团女师支部成立



时，她被选为支部书记。1928年，她担任共青团南通县委妇女部长。

1928年6月2日，中共南通县委在南通博物苑召开扩大会议，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彭汉章（汪世杰）等十人一齐被捕。白色恐怖笼罩了南通城。尽管环境险恶，朱文英仍坚持在女师开展革命活动，她在寺街的家先后成为中共南通县委和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1927年秋到1930年年底，县委、特委和红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李超时、刘瑞龙、韩铁心、袁锡龄、陈国藩、张维霞（吕继英）等经常在她家开会，住在她家。她的父母不仅帮助他们收藏文件和掩护开会，还满腔热情地接待他们。尽管这个五口之家常常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朱妈妈还是用洗衣、帮工得来的钱招待他们。朱妈妈养了两只鸡，生了蛋都留给同志们吃。她还想办法用麸皮做酱、西瓜皮腌咸菜来对付着过日子。遇到有同志被捕，朱妈妈借债甚至典当光衣物来营救他们。她还让九岁的小女儿利用关系，进出监狱，为被捕的同志送信联络。特委书记李超时是外地人，说话有外地口音，朱妈妈就让小女儿紧跟着李超时进出做保卫，以防意外。朱家东边仅隔一道墙，就是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及其监狱，筑有碉堡，站有岗哨，有时还能听到监狱里拷打犯人的声音。李超时、刘瑞龙常常在这老虎口下，冒着生命危险，召开秘密会议，商讨红十四军战斗大计。朱妈妈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有意识地在周围发展可靠的邻居家作为落脚点。寺街16号（现71号）院内朝南屋的后面还有一个小后院，有朝西屋一间，非常隐蔽，适宜从事秘密活动，朱妈妈在详细了解到张家倾向革命的政治态度后，就租借了这间房屋，供他们开重要会议和来人居住。

1929年，朱文英遵照党的决定，去上海工作。临走时，她再三叮嘱父母要好好掩护机关，照应同志。以后党又调

她到无锡工作。1930年年初，她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党的会议之后，即去上海安迪生电灯泡厂参加领导罢工的斗争。1月16日清晨，朱文英在厂门口被敌人逮捕。被捕后她改名周林宝，虽经多次审问，始终不吐真情，后被押送至苏州监狱。不久，由于监狱里非人生活的折磨，朱文英染上了严重的伤寒症。后经组织营救，保外就医。住院期间，敌人仍对她进行精神折磨。1930年5月29日，只有20岁的朱文英终因伤寒症并发精神病在苏州博习医院去世。朱文英为了保护设在家中的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从被捕到病逝，未给父母写过一封信。

朱文英烈士的故居位于寺街19号后院。



巧施“木马计”的汤景延

家住胡家庵12号的汤景延，在抗日战争反“清乡”的关键时刻，巧施反“清乡”“木马计”，率领整整一个团600多人假投降，在虎穴中与敌伪巧妙周旋163天，又在一夜之间同时破敌腹而出，胜利而归，在八年抗战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篇章。

汤景延是如皋县人，大革命时期在上海中华体育师范读书时加入国民党，后因不满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腐败，愤然脱离国民党，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家乡如皋后，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任县党部书记长。其间，他因无法找到中共党组织而与党失去了联系。



汤景延

全面抗战兴起后，汤景延在海门组织游击总队抗日，任参谋长，后曾参加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杂牌军，先后担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属下的支队副、团副、大队副等职，结识了不少后来投降敌伪的军官。1940年，新四军开辟黄桥根据地后，汤

景延毅然投奔新四军，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海门、启东组织抗日武装。1941年10月担任通海自卫团团长，在日伪夹缝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民众亲切地称其为“汤团”。1942年2月，汤景延经苏中四地委社会部长陈伟达的介绍，重新入党，成为特别党员。由于汤景延的特别经历，政治面目没有公开，因此，他和他率领的通海自卫团一直是以比较“灰色”的面目活动着。

1943年春，日伪南通特工分区特工陆某，专程前来“策反”汤景延。送走陆某后，汤景延立即向我军分区作了汇报，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认为，如果汤景延能利用敌伪劝降的机会，打入敌人心脏，对粉碎敌伪的“清乡”计划极为有利。陈毅、陶勇也觉得汤景延对党忠心耿耿，性格豪爽，能说会道，足以应对狡诈的敌人。但汤景延开始有些顾虑，不愿背汉奸的恶名，经过做工作，为了党的全局利益，汤景延决定置个人荣辱于不顾，接受这一凶险的任务。几天后，军区命令由汤景延带领通海自卫团以假投降打入伪军内部，关键时刻再破腹而出。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险棋。因此，这一高度机密只有区党委粟裕、钟期光，四地委吉洛（姬鹏飞）、陈伟达等少数几个领导人知道。一个整团假投降，如有一人出了纰漏，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为了这批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安全，分区司令员粟裕首先命令健全组织，纯洁队伍。军分区把汤景延的通海自卫团与崇明警卫团合并为一个团，仍以汤景延为团长，另派有着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顾复生为不公开的政委。同时对士兵逐个政审，调走了一些不适合的人员，调进了30多个党员干部，并确定了单线领导的原则。

3月底，蒙在鼓里的日伪苏北特工站站长姜颂平将“汤团”编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

4月14日下午，“汤团”开始了紧张的动员。在党内提出：



“变换斗争方式，坚持原地斗争。”在党外提出：“变换斗争方式，保住团体，保卫家乡。”不明真相的干部、战士一听要投敌，无不震惊，许多人失声痛哭，有的当场要求请长假回家。当夜，就有三五个战士不辞而别。汤景延百感交集，当即决定把真实意图告诉38名党员。接着又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告诉大家目前敌我斗争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暂时穿起伪军服，只是为了保存实力。大家听出了弦外之音，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汤景延带上家眷、拎着脑袋，开始了冒险之旅。

1943年4月16日深夜，在“汤团”驻地桃源、震蒙两乡的交界处，“噼噼啪啪”响起了诈降的枪声，枪声响处留下了几个在押待决的地痞流氓的尸体。“汤团”连夜开往南通郊外，向姜颂平报到。日伪特工报告：“汤团”反正是真。南通城的敌伪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汤景延“弃暗投明”事件。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和民众得到这一消息，都很震惊，也很气愤，熟悉汤景延的老百姓说什么也不肯相信。

汤景延打入日伪虎穴后，巧妙地周旋于日伪之间，利用其内部矛盾，勇敢机智、临危不惧，紧紧依靠党组织，粉碎日伪吞并“汤团”的阴谋，保存了部队的实力。

为取得日伪的信任，汤景延主动拜会江苏伪政府主席李士群，李士群也两次在苏州“召见”汤景延，并晋升汤景延为少将旅长。作为李士群眼里的红人，汤景延很快在荆棘丛生的日伪机关站稳了脚跟，并利用与伪方军政要员的关系，广散钱财，广交“朋友”，从中收集情报，瓦解伪军，不露痕迹地做了很多工作。

为配合抗日根据地军分区的反清剿，“汤团”官兵利用与伪军政人员的闲谈交往获取大量情报，秘密组织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四分区部队，使敌人的清剿计划一再

落空。

当时，汪伪政府正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保障大江南北的联系，汤景延像其他伪军将领一样，以部队发的薪饷太少，给养难以为继为借口，要求开商行。他在驻地茅家镇公开办起了由他兼任总经理的“协记公行”，顾复生当起了账房先生，并在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设立分行，委派可靠的人当分行经理。商行以经营粮食、蔬菜、时鲜、猪羊、家禽等为名，既为根据地筹集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秘密地为新四军购买、输送了大量军火和药品，还掩护根据地干部安全进出敌占区据点。日伪做梦也想不到，煞费苦心经营的封锁线，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被“汤团”捅开了一个大豁口，成了根据地的生命线。与此同时，“汤团”扬善惩恶的良好部队作风也重新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却不料也引起了苏北特工站站长姜颂平的怀疑。

5月20日，伪苏北主任公署命令“汤团”集中海门接受“点编”，随即又命令“汤团”开赴南通城“整训”，企图控制、监视，直至吃掉“汤团”。汤景延、顾复生等人，在与日伪作机智、勇敢的斗争中，始终保持了对部队人员、武器的控制权，但因为战斗在危机四伏的敌腹，精神高度紧张，稍有不慎，就会使几百人的部队受到严重损失。粟裕得悉汤团面临险恶处境，审时度势，决定适当时机让“汤团”回归。

1943年9月，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日伪第一期“清乡”的关键时刻，苏中区党委决定“汤团”举行军事暴动，把部队从伪军里拉出来。9月25日，军分区敌伪工作委员会书记陈伟达，潜赴“汤团”团部，向汤景延传达命令：日伪“清乡”败局已定，为了再给其沉重一击，命“汤团”27日夜全线举行军事暴动，并于29日晚11时前全部撤回根据地。汤景延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9日，汤景延将妻儿送去“吃喜酒”。晚上，一切都布置妥当的汤景延，不动



声色地在团部摆开了“鸿门”麻将局，他请来驻地的伪军头目、特工站长、警察局长，与往常一样摆起了“四方城”。

与此同时，“破腹”战斗在全线展开。驻扎在各个据点的“汤团”官兵奋勇摧毁了当地的敌军碉堡、特工站、警察署、区公所，然后，在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迅速撤往指定集结地点，带着缴获的大批武器胜利地回到了根据地。“汤团”在反“清乡”的关键时刻破茧而出，上演了一出反清乡的“木马计”，并马到成功，给了日伪致命一击。

此后，苏中军区和苏中四分区先后为“汤团”凯旋举行了祝捷庆功大会，庆祝“汤团”特殊战斗的胜利。粟裕、陶勇高度评价“汤团”入污泥而不染的情操和他们对反“清乡”斗争所起的重大作用。后“汤团”编入了“联抗”部队，汤景延任“联抗”副司令。

1948年初，中共华中工委、华中军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队，任命汤景延为党委书记兼政委、副司令员、参谋长。2月12日，汤景延率领部队在上海南郊的奉贤附近海岸登陆，为解放大上海建立军事根据地。但由于叛徒告密，陷入重围，激战8小时，丁锡山司令员英勇牺牲，副司令员汤景延重伤被俘。5月14日，令日伪胆寒的孤胆英雄、“汤团行动”的指挥者汤景延在上海江湾慷慨就义。据报载，他“临刑时高呼口号，拒不下跪，面部毫无恐惧之色。两弹毙命，但仍直立不倒……”上海解放后，汤景延的忠骨移葬龙华烈士陵园。

铮铮铁骨江上青



江上青

江上青原名江世侯，1911年4月10日生于江苏扬州江都县仙女庙镇一个中医家庭。1927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扬州局势混乱，江世侯偕七弟江世伯到南通投靠大哥江世俊，一家人住在通明电气公司柳家巷15号家属宿舍内。8月，江世侯考取了南通中学，在南通中学读书期间，与同学、中共秘密党员顾民元一起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学生运动。11

月，在顾民元的介绍下，江世侯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年9月，江世侯转学至扬州中学读书，积极投身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组织同学上街游行，经常在校园、街头演讲，还撰写文章、散发传单，揭露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号召市民、学生奋起反抗。这使他成为反动当局注意的对象。一个学期不到，江世侯在东关街江家桥家中被反动当局逮捕，后押解到苏州，关进司前街监狱。开庭后虽经律师辩护无罪，但仍被羁押半年。1929年5月，江世侯从苏州监狱获释



回扬州，但扬州中学拒绝他回校复学。7月，江世侯的父亲江石溪将诗句“江上树峰青”拆开，为江世侯和七弟江世伯同时改名为江上青、江树峰。江世侯以新的名字“江上青”，投考上海艺大文学系，被录取。8月，江上青到上海艺大读书。他的团组织关系转到艺大后，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后中共法南区委决定由江上青担任上海艺大的党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深入工厂开展革命宣传组织活动，12月，江上青在上海北四川路粤商大酒楼参加党的会议时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后在多方营救下获释。

1931年2月，江上青因在狱中患上的严重哮喘病复发，被父亲接到南通养病，仍住柳家巷通明电气公司家属宿舍。江上青革命意志不减，撰写了新体诗，为民鸣不平。8月的一天，党组织派人来柳家巷寻找江上青，决定派他到上海暨南大学学习，从此江上青又到上海继续从事学生运动工作。

1932年2月，江上青回到扬州，在十二圩子初中和扬州平民中学教书，继续以传播革命火种为己任，不少学生和社会青年受到他的影响，先后踏上革命征途。

1934年10月，江上青在灌云大伊山、赣榆沙河、沭阳吴集等地开展社会调查，进行民众教育工作，在沭阳曾被土匪绑架达半月之久，土匪强迫其入伙，不从后被放回。

1936年11月，江上青和于在春、顾民元、王石城四人发起创办《写作与阅读》杂志，先后发表关于语文教学的文章多篇。1937年3月，《写作与阅读》改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江上青担任杂志发行人，编委有尤墨君、于在春、王石城、江树峰、吴天石、李守章（李俊民）、施与（史白）、杨雨田、顾民元等。此时的编辑部设在南通顾民元家。江上青每月从扬州来南通一次，取走稿件，再送往上海。每次来他都要通报刊物在上海印刷、发行的盛况，提高大家办杂志的积极性。由于他们的努力，《写作与阅读》受到全国各地学生和教师

的欢迎，发行量超过了原来的《中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组织成立了抗日宣传队，从扬州出发，溯江而上，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江上青演讲才华出众，使听众深受感动。江上青在武汉和党取得了联系，经中共长江局批准，重新恢复了党籍。1938年冬，江上青受中共安徽省工委派遣，由大别山来到皖东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担任特支书记。他打入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保安司令盛子瑾部做地下工作，公开职务为专员秘书，兼任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秘密身份则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他致力于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办了《皖东北日报》，担任皖东北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在我党皖东北特委的领导下，该校培养了大批青年抗日军政干部。他充分利用公开身份促成统战局面，使我八路军、新四军得以在此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他还为《皖东北日报》撰写社论，发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石印本。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创建皖东北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安徽为国民党桂系军阀控制，东面是江苏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泗县、五河、灵璧、凤阳等县城为日寇侵占，乡村里有恶霸地主土圩子，他们互相勾结无恶不作。江上青嫉恶如仇，坚决与敌伪顽霸作斗争，因而成了敌人阴谋杀害的眼中钉。1939年8月29日，江上青外出灵璧县工作，归来途经泗县东北部小湾村时，惨遭反动大地主柏宜生、王铸久武装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8岁。江上青牺牲的噩耗在皖东北地区传开后，各界人士无不悲痛惋惜，分别在青阳、崔集、管镇等地隆重举行“江上青烈士追悼大会”，参加者数以万计。江上青牺牲后不久，1940年春我党我军在他洒过鲜血的地方，建立起皖东北民主根据地。

1940年春夏之交，江上青不幸牺牲的噩耗才传至扬州，其长兄江世俊按扬州风俗，将正在中学读书的次子江泽民过继给江上青为子，以续香火。



红色“女谍”马世和

马世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南通县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她曾孤身一人潜入日伪特务机关，为抗日根据地收集敌特情报，被誉为孤胆英雄、“谍报女杰”、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1922年5月19日，马世和出生于南通城三衙墩4号。在南通中学求学时，马世和读了许多革命进步书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15岁的马世和在国破家亡的动荡时代，开始人生道路的选择。她与几个进步同学誓言：“坚决不做亡国奴！”在父亲的支持下，她毅然离开家庭，投笔从戎。

1938年4月，马世和与几个同学离开城区，到陈家酒店参加江苏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务总队。马世和在特务总队任宣传员，她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活跃在农村、集镇，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道理。



马世和

1938年8月，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进入抗战支队开展活动。10月，马世和参加了抗战支队，先后任政工队员、政工队副队长。她和政工队员去如皋县岔河西的崔家河和银杏埠子一带的农村，宣传群众，经常住庙宇、睡地铺。马世和像个地道的农村姑娘，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深受群众欢迎。1939年春，经中共江北特委批准，马世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她才17岁。

1940年5月间，马世和任政治工作队队长，随抗战支队北上。在国民党顽固派阴谋镇压抗战支队中进步分子的前夕，马世和接到任务：通知有关同志及时转移。马世和不顾自己正发着高烧，行水路、走陆路，日夜兼程，及时赶到东台，将“我部即行起义，请注意千万不要回‘抗支’，防止发生意外”的秘密通知送到江北特委委员陈伟达的手中。

1940年新四军东进，马世和参加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挺进纵队，被派到靖江县担任妇女部长，不久又被调到新建的如皋中心县委，担任芦港区委书记。10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在陶勇司令员率领下，挥戈东进通州、如皋、海门、启东，建立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马世和随三纵东进，任掘港区委书记。后任如皋县委组织部长。她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大量的党群工作，取得良好效果。短短几个月，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马世和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她逐渐成熟，显示出政治和组织才能。

1941年11月，苏中四地委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城市工作的决定，经过慎重考虑，派遣马世和只身进入敌占区南通城，担任中共南通城地下组织特派员，开展工作，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马世和进城后，化名马淑华。根据党的指示，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秘密开展工作。1942年春，她打进



日本人开办的江北中央医院，任护士班国文老师。这所医院的大部分医护人员是日本人，对在医院工作的中国人控制很严，而护士班的学员却是中国学生。马世和通过宣传抗日爱国，和学生建立起很好的感情，得到学生的帮助和掩护。

马世和进入南通城后，在医院、学校、文艺团体中，先后发展十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支部。她要求地下党员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以合法的手段，开展对敌斗争。

经过酝酿，她领导地下党组织全市小学教师罢教，取得了罢教增薪的胜利。

经过组织，通中、县中、女师三校进行禁烟、禁赌、禁舞的“三禁”运动，轰动全城。

1943年4月，日伪对苏中四分区进行“清乡”，马世和接到四地委紧急通知，要求她设法打入伪敌特机关，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配合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

一位来自根据地的年轻女共产党员，要打进特务机关内获取机密情报，必须有极大的决心和勇气，随时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根据斗争需要，她既要战斗在敌人心脏，同时还要继续领导南通城地下党员开展各种活动，进行合法斗争。工作的凶险、任务的艰难可想而知。

马世和二话没说，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她通过父亲的社会关系，打入了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总站。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她改变原来的装扮，和特工站女职员一样，烫起头发，穿起花旗袍、高跟皮鞋，还戴上了项链、戒指，一身珠光宝气地频频参加灯红酒绿的宴会。连熟悉马世和的自首分子也信服地说：现在马世和确实变成特务了。

不久，马世和被调至城区特工组，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侦查、监视我方进城人员，搜集根据地情报，破坏反“清乡”

斗争。组长是个老牌特务，既狡猾又阴险。他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手段，多次试探马世和的政治态度。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勇敢机智的马世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发挥一切可发挥的社会关系作用，化险为夷，一直坚持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源源不断地送出重要情报。

1943年年底，马世和被调至四甲坝特工组，负责内勤工作，保管情报资料。一次，她发现一份日伪派遣潜伏在我通东地区的8个特务名单，便迅速秘密抄下，机警地将这个重要情报藏在衣服内，和几瓶香水一起用一个布包扎好，交可靠同志送到我地下交通站，转呈四地委机关。根据地的公安部门经过查核，将这8个特务一网打尽，消除了隐患。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赞扬马世和起了拿枪的军人所起不到的重大作用。

1944年4月，各地特工站解散，马世和遭裁减。在这期间，她经常去南通城，领导地下党的工作，开展对敌斗争。繁重的战斗任务，使她一刻也得不到休息，不幸染上了肺结核，7月，住进了基督医院。这时，伪苏北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情报室对马世和的身份已有所怀疑，派出特务到医院对她进行秘密监视。敌人幻想“放长线，钓大鱼”，妄图通过马世和将我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当年曾受过马世和教育影响的爱国护士冒险送来了这一情报。敌人的这个阴谋，也被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马世和觉察到了。马世和自知身陷险境，却不动声色，泰然处之，思考着新一轮的战斗方法。

苏中四地委在接到南通城地下党有关马世和身份暴露的紧急报告后，决定让马世和立即撤回，急电指示南通县委设法营救。当马世和获悉党组织正准备营救她时，马上写密信通知城内的地下党员：“要注意保存党的力量，千万不要以同志们安全换取我的生存，否则我的心不安，党也不允许的。”党组织开始了营救马世和的准备工作。为避免组织



受损，马世和决定提前自救。在医院里，她表面上跟往常一样，和护士一起散步、谈笑、唱歌，暗地里却在紧张地考虑如何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制造便于突围的机会。马世和在一次次机智对敌，巧妙地应付了宪兵队特务、高等警察课军曹的盘问后，冷静地分析了敌情，果断决定：趁敌人下毒手之前，化装突围。

7月30日的傍晚，马世和在护士的掩护下，剪去辫子，戴上墨镜，从日伪特务的眼皮底下，从容地走出医院大门，在根据地游击队的接应下，回到解放区。就在马世和胜利而归的当夜，一卡车武装宪兵开到医院捉拿马世和，结果自然是扑了空。

马世和抱病突围，致使病情恶化，养病于后方医院。在治病期间，她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忍受一切，只要我能够回到我原来的队伍的岗位上”写在日记本上，激励自己，与病魔作斗争，为重新获得为党工作的机会而努力。可是，由于长期积劳，她的肺病一天天严重。1947年6月7日，马世和不幸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时年25岁。新中国成立以后，马世和移葬上海江湾烈士陵园。1950年7月，中共南通市委为马世和修坟树碑于墓地，以志永念。

革命文艺战士史白



史白

寺街119号为革命文艺战士史白的故居。

史白，原名施椿寿，笔名、化名有施春瘦、施与、施羽、施雨、施玉等，是一位集美术、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才能为一身的革命文艺奇才。

史白早在上海美专求学时，就勤奋刻苦，画艺精进，国画、油画、水粉画、版画、木刻等均有建树。他创作的《柔石之死》《胡也频传》《我们期待明天》等多

幅爱国题材的木刻、版画，被鲁迅先生选进其主编的《青年版画集》。

20世纪30年代，史白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还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通分盟的创始人。他曾以“新民剧社”为主干，联合赵丹、顾而已等人组织“小小剧社”，开展戏剧活动，公演了多部爱国主义话剧，鼓舞了民众的斗志。史白还为赵凤翱起了一个满意的名字——赵丹。

1937年，史白参加由江上青担任发行人的《写作与阅



读》杂志的工作，以施与的笔名担任编委，负责改版后的《写作与阅读》的封面设计、扉页装饰，使杂志面貌焕然一新。

1938年，南通沦陷。史白携妻子理明、弟弟施馥寿赴西安，参加梁灵光领导的抗战支队，并在打入抗战支队的共产党江北特委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江北特委决定让史白和理明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工作，但因交通被截断，未能成行。

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史白到达掘港，担任了新四军苏中四分区政治部教科兼分区参议，参加组建苏中四分区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又名尖兵剧团）。服务团团长由陈同生兼任，史白兼任副团长。当时服务团的演出很有特色，剧本基本上是由史白编写的独幕话剧。史白根据当时、当地斗争的需要，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赶写剧本。新剧编出后，由他导演，有时他自己也粉墨登场，日夜赶排，很快公演。在这段时间，史白创作的剧本有《游击队的成长》《两瓶枣儿红》《雪》《血》《枪》《供》《米》《捐》《盐》等。史白的剧作结合实际，生动感人。五幕话剧《游击队的成长》每次演出结束时，观众都群情振奋，常常是几十甚至上百名的青年当场报名参军抗战，火热场面激动人心。活报剧《两瓶枣儿红》，通过小木匠拎着两瓶马塘名酒枣儿红，给师傅送端午节礼，途遇国民党税棍连这两瓶酒都要征税的真实事件，深刻揭露了国民党不抗日，只顾搜刮苛捐杂税、鱼肉人民的反动本质。演出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共鸣，当天中午，全马塘镇的商店都打了烊，爆发了马塘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市。

由于史白在抗战宣传中的突出表现，1941年年初，四地委宣传部长洪泽通知史白前往盐城，出席新四军军部召开的“苏北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结束后，史白还受到当时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的接见。史白向刘少奇汇报了苏中文化工作情况，并聆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

史白在参加了“苏北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创作热情更加高涨。1942年前后，他创作了大量歌词歌曲：史白作词、沈亚威谱曲的《纺纱织布》《金牛谣》；史白作词、涂克谱曲的《当心鬼子来抢粮》；史白自己作词谱曲的《抗敌学校校歌》《薄粥喝喝》《割麦插禾》等。这些歌曲既浅易又富有趣味，在解放区广为流传。史白还创作了歌剧《吴满有》、小歌剧《打走了鬼子才有米下锅》。当时，南通县中学生组成的通西服务团，排演了史白的新作《打走了鬼子才有米下锅》这一小歌剧，有独唱、合唱、轮唱、表演唱，歌与剧糅合为一体，演出效果很好。演出结束时，台下鼓掌声、口号声阵阵。人们高呼：“打走鬼子！”“打倒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上重复高唱：“打走了鬼子才有米下锅！”台上台下感情交融，演员、歌队、观众都融合在“打鬼子”的共同呼声中，歌剧起到了动员群众、武装保卫家乡的效果。

1943年，随着日寇的“清剿”、进攻，苏北形势开始紧张、恶化。为了适应当时的敌我斗争，史白先是在通西游击区埋伏待命，1944年被组织安排进城，通过原有的社会关系，担负起城乡联系工作。

1945年，日寇投降后，地委通知史白和理明撤离南通回根据地。史白途经金沙等地时，看到解放区船来车往，人民安居乐业，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与苛捐杂税肆虐的国民党敌占区有着天壤之别，他心潮激荡，写下了《别处哪儿有》的歌词。歌词在一分区文协出版的《文综》第一期上发表。沈亚威看到这首歌词短小简洁，轻松和谐，读着歌词，眼前就展现出一幅和平幸福的画面：在朝阳的映照下，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喜气洋洋的解放区人民，撑驶着千条万条满载布匹、粮食的小船，南来北往，穿梭不停。顿时，一段悠扬、轻快的旋律从胸中涌出，他以极快的速度谱写了这首表现解放区人民翻身解放喜悦心情的歌。这首歌不胫而走，在解放



区广为流传，吸引了无数青年投奔解放区。

1946年，在苏中解放区积极工作的史白，因早年参加革命被捕入狱时的旧伤复发，身体很虚弱。经组织安排，住在东台叶挺公园的竹林寺中疗养。史白在疗养期间，仍不忘他那一分区驻会委员的身份，带病先后协助东台民教馆进行文艺培训，帮助新光平剧团搞京剧改革，为分区文联策划活动，为苏中公学培训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协助东台民报工作，为《戏剧与音乐》期刊撰稿、作曲，为《民间》期刊写诗歌。史白还利用这段时间，对从事多年的革命文艺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撰写了文艺论文《论绘画的民间形式》，发表在《文综》上。这篇文章对继承遗产和接受民族形式的问题作了很好的阐述，对当时的群众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论文发表后反响很大，连当时敌占区的《东南日报》都给予了转载。

是年7月，东台解放区上空国民党飞机肆虐，城内霍乱横行。正在东台街头搞文艺演出的史白，误食了一片染有病菌的西瓜。7月16日，史白忽罹霍乱。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封锁了解放区，药物奇缺。史白患病前后仅10个小时，便与世长辞，时年仅38岁。地委以党礼厚葬史白，以党旗覆盖遗体，棺殓于东台叶挺公园内。《东台民报》《江海导报》头版刊登了关于史白逝世的讣告、唁电，这两家报纸还出了悼念史白的专刊，简介了史白同志的生平事迹，对史白的艺术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称史白“毕生的艺术活动是和他艰苦的革命活动、民族革命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史白的去世是“分区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中国的保尔徐惊百

徐惊百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敌占区的一位身残志坚、才华横溢的革命文艺斗士，被人们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徐惊百，名震，1915年出生于胡家园6号。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热爱进步文艺，尤其喜读鲁迅著作，对当时社会常作出尖刻的讥讽与批判。徐惊百在小学高年级时，因患大腿部骨结核辍学，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自学，读完高中课程。



徐惊百

1933年，徐惊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在学校里，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深受科主任徐悲鸿的器重。

1935年，徐惊百在南京中央大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的文化活动，以他战斗的画笔和锐利的刻刀作武器，通过文字、漫画、诗歌、木刻等形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成为当时南京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骨干，曾被推为“中大”学生会代表，参加慰问队赴绥远前线慰劳



抗日将士。

1936年夏，徐惊百担任旅外学生举办的“学生暑期社会科学补习班”的讲师，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年10月间，经他奔走联络，广州现代版画学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全部展品近400幅，运来南通展出，向家乡父老介绍了木刻这一富有战斗性的新兴艺术，为木刻在南通地区的兴起作出了引导性的贡献。

1937年夏，徐惊百毕业于中央大学，被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的徐惊百放弃了赴法国深造的良机，毅然投入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他于1937年参与发起建立“抗日义勇宣传队”，加入驻通的东北军111师，在该师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徐惊百是宣传队的中坚。他和几个同志创办了《军民导报》。该报旗帜鲜明，内容充实，形式活泼，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超过南通地方其他各报。宣传队还深入部队，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街头活报剧，轰动了南通城，成为当时南通的一支主要抗日宣传力量。

1937年11月，111师奉命离开南通，徐惊百随军北上，转战于苏北徐淮一带和鲁南。在行军中，他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战胜种种困难，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深得士兵和老百姓的爱戴。

1938年6月，徐惊百经我党地下组织——111师工作委员会考验，在部队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宣传队成立党支部，徐惊百任支部委员。

徐惊百在部队，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背着背包，拄着手杖，拖着一条跛了的腿，冒着连绵的冷雨与漫天的飞雪，在鲁南山区那崎岖坎坷的小路上，一瘸一拐地跋涉着，从不喊一声苦，也从不掉队。部队有时照顾

他，拨给他牲口代步，他却让给伤病员。只要情况允许，徐惊百还经常给大家讲笑话、讲故事，鼓舞士气。两年多的军旅生活，徐惊百历尽艰辛。紧张的战斗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夜行军、急行军、强行军，终于将徐惊百这条硬汉击倒了。

1940年春，徐惊百旧疾复发，关节结核发炎化脓，疮口溃烂不愈，举步维艰，不能再随军行走，不得不离开部队去后方医院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极为简陋，手术过程中，由于消毒不严，创口溃烂，久治不能愈合。再加上紧张的战争环境下，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让他静心养伤，东北军部队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送他去青岛。徐惊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部队，在青岛医治了一段时间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相反日益恶化。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党组织决定让他转上海治疗。然而，由于缺少特效药物的控制，病情继续恶化，徐惊百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医生决定采取手术，他的右腿沿着骨盆被截割下来，病情却仍无好转。由于经济上不堪负担，徐惊百易地南通，继续治疗。

此时，南通已经沦陷。由于手术后创口久不愈合，溃烂浸染至小腹部，无休止的高热和剧痛，给徐惊百带来难以忍受的折磨，他终日只能躺卧在病床上，既不能坐，又不能翻动自己的身躯，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与病魔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同时，他不畏敌人残酷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与广大青年保持密切联系，利用各种机会，介绍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启发、引导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徐惊百在疾患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阅读革命理论书籍和文艺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艺素养，以惊人毅力翻译、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巧妙地利用敌人出版的报纸副刊作为阵地，暴露敌伪黑暗统治，激励人们走向光明。在1946年的“三一八”斗争中，徐惊百支



持青年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撰写了《民意在雾中》的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伪造民意、强奸民意的卑鄙伎俩。徐惊百高尚的思想境界和博识卓见，使他在南通进步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徐惊百曾因病失去与党的联系，但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感人至深。经审查，中共苏中四地委于1945年9月正式恢复他的党籍。

1946年8月27日，与病魔搏斗到最后一刻的徐惊百在南通家中的病榻上去世，年仅31岁。

徐惊百病中写下的日记，现存于南通博物苑。

民主斗士钱素凡



钱素凡

钱素凡，一名优秀的南通中学教师，一位激励学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革命斗士。他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分，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面对刺刀和机枪，为民请愿，直至血染长江，慷慨赴死。

钱素凡，又名钱彤，1912年11月28日生于寺街石桥头巷13号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钱啸秋，为南通教育界著名人士。

早在“五四”时期，钱素凡就受到进步文艺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反抗强权、憎恶黑暗、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性格。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钱素凡在《中学生》《学生杂志》等刊物发表《耻》《宣传者》《贡献给“五卅”》等诗歌，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随着革命觉悟的不断提高，钱素凡15岁在初中读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

1928年8月，钱素凡从通中初中毕业，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高中部读书。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对国民党反动派统



治的不满，推动着他一步步前行，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钱素凡等十名同学组织了“十人团”，加入沪江大学附中的“抗日会”。钱素凡是“抗日会”领导人之一，曾代表“抗日会”到上海南市参加中学联常委会。这年冬天，听说日本兵要从蕴藻浜登陆，“抗日会”的二十几位同学组成义勇军在校内巡夜。钱素凡等人顶着寒风，踏着积雪，深夜慰问巡夜同学，还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拦到南京请愿，回来后又与校长进行说理斗争。这年寒假，钱素凡刚回到家，就接到校方开除他学籍的通知书。

被沪江中学开除以后，钱素凡回故乡进南通中学高中普通科二年级继续读书。1932年夏，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在大学里，他仍积极参加进步文艺活动和爱国学生运动，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会，认识了徐惊百、邹强、孙卜菁等进步青年。他们在一起谈论时局，唱《国际歌》，演话剧。每逢假期，他们就回南通办补习班，讲时事，举办画展，为报纸编副刊，进行爱国宣传活动。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钱素凡与徐惊百、邹强等人于11月20日联名在南通报纸发表《为华北事变宣言并告南通知识界》，向南通一些“可当汉奸甘当汉奸的恶棍劣绅”提出了严厉警告。“一二九”运动爆发时，钱素凡是中央大学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他写信到南通，介绍南京学生运动情况，呼吁家乡青年迅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钱素凡从中央大学回到南通，和徐惊百、邹强、孙卜菁一起组织了抗日义勇宣传队，加入东北军57军111师，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办了铅印的《军民导报》，组织歌咏队、演出队，鼓动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抗日，影响很大。11月中旬，111师奉命撤离南通，抗日义勇宣传队部分人

员随部队转移。钱素凡因家庭有困难，留在南通中学任教。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同年8月，南通中学迁往上海“孤岛”复校，钱素凡随校赴沪。在此期间，他看到了秘密传阅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1940年新四军东进南通地区，8月，钱素凡又随校迁往海安角斜。在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掘港，钱素凡与新四军的领导人有所接触，对共产党新四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信心。1941年年初，南通中学解散，钱素凡转到潮桥商益中学任教。1941年8月，日寇占领潮桥，学校停办。钱素凡回到日伪控制的南通城，先后在公立中学、女师任教，并担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钱素凡仍在南通中学任教。

1946年1月13日，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宣布生效。不料，在停战协定宣布生效的第三天，驻南通的国民党军队就公然破坏停战令，向苏北解放区发动了进攻，侵占了白蒲镇，将新四军逼退至林梓一线。钱素凡等进步青年，见国民党撕毁协议，焦虑万分。1946年3月，传来了以韩念龙为我方代表的军调处徐州执行小组淮阴组将要来南通的消息。反动当局甚感被动，他们密电往来，编造谎言，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开始组织伪造民意的“请愿”。党组织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针锋相对地组织地下党和爱国学生运用各种形式，唤起民众，将欢迎执行小组和组织游行示威结合起来，揭露敌人阴谋，表达争取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

地下党党员王敏之找到兼任《国民日报》副刊《苏北文艺》编辑的钱素凡，让他写文章揭露敌人阴谋。钱素凡写出了政论文《临（迎）春》、诗歌《临（迎）和平使者》，在欢迎三人小组到来的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内战的危险，抨击反动派“抹杀事实的真相，伪造民意来攀诬”的阴谋。钱素凡还将此情况通知给笔触犀利的徐惊百，徐惊百抱病写下了《民意在雾中》一文，揭露当局伪造民意、强奸民意的卑鄙伎



俩，向随同执行小组来通的新华社记者提供第一手资料。钱素凡等青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决定先成立文艺协会，为示威游行做准备。

3月17日，在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进步团体“南通文艺协会”在实验小学召开成立大会。钱素凡在文艺晚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会上决定文艺协会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欢迎执行小组，成立大会开成了向执行小组请愿的筹备大会。

3月18日，执行小组将从如皋来南通。上午9点，阴云密布，细雨绵绵，文艺协会组织的游行队伍从育婴堂巷的实验小学出发，以“欢迎执行小组莅临”的横幅为前导，沿途呼着口号，撒着传单，张贴标语，市民也热情高涨，纷纷加入这争取和平的行列，队伍越来越壮大。10点多钟，队伍结集在大码头，在寒风凄雨中等待三人小组的到来。从上午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呼啸的东北风越刮越紧，雨越下越猛，人们的衣衫都淋湿了，但大家唱着钱健吾和陶应衍在雨伞下现场谱写出的歌曲《坚决等待》，斗志昂扬，毫不退缩。直到下午四五点，三人小组乘坐的吉普车才到达大码头。国民党军警竟然用刺刀拦阻已在风雨中整整坚持了8个小时的青年学生向三人小组递交请愿书。青年学生追赶着风驰电掣般的汽车，一直到桃之华旅馆。反动当局早已在旅馆门前布下了三道铁丝网，并架起了机枪，封锁示威群众的去路。但是，青年们毫不畏惧，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冲破了一道又一道铁丝网。钱素凡始终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并带领群众在旅馆门前呼口号。晚上，钱素凡又参加了盛大的游行示威。

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示威活动十分恐慌，决定用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来压制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23日晚，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首先被捕，次日被害。30日，孙平天的尸体在天生港附近的江面浮起，全城哗然，为之震惊。中共南通地下党组织通知钱素凡等人离开南通，以免遭毒手。

面对倒行逆施的反动派，钱素凡不顾自己的安危，在设法营救战友的同时，着手安排着进步学生离城。4月4日凌晨，国民党特务竟然破墙而入，进入通中校园，由三青团作向导，闯进钱素凡宿舍，把他绑架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戴西青、罗镇和和同住在寺街的季天择。他们遭受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和电刑等酷刑的折磨，遍体鳞伤，全身血肉模糊。面对凶残的敌人，钱素凡仍然痛骂不止。他的一只耳朵被敌人割了下来，当即昏了过去。4月5日夜里，敌人把钱素凡等四人押上一只汽艇，剥光衣服，用绳子捆绑起来，刺破胸腹，丢入江中。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钱素凡等“三一八”南通惨案烈士坚强不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解放后，钱素凡被迫认为革命烈士。郭沫若为他的衣冠墓碑题词，钱素凡的光辉形象至今仍活在南通人民的心中。



青艺志士季天择

季天择，1925年12月27日生于环城西路163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季天择1938年进南通中学。在南通中学读书时，因受同班同学钱健吾等的影响和帮助，季天择思想逐渐倾向进步。他和进步同学一起编辑油印刊物《属于》，鼓励同学们多思考、多想自己肩负的重任，为真理而斗争。1943年，季天择于南通中学毕业。1944年，季天择冒着风险，不远千里，去抗日的大后方重庆读书，想投身抗日，但未能如愿而归。



季天择

从重庆回乡后，季天择的思想变深刻了。他参加了当时进步的文艺团体“青艺剧社”。“青艺剧社”全称为“青年艺术剧社”，成立于南通沦陷的1942年。40年代初的时候，地下党组织鉴于南通有话剧人才和观众的优势及传统，提出了“以合法条件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青艺剧社”应运而生。季天择参加青艺剧社时还不足20岁，他演出进步话剧，参加文艺晚会，演唱歌曲，积极热情，很快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和骨干成员。他在这个充满了朝气活力与理想追求的团体里，

以话剧为武器，抨击黑暗，追求光明。他说：“戏剧既教育演员本人，也教育观众，可以使人变得善良、纯朴，不走向邪恶和堕落。”季天择喜欢缅怀往事，每当他诉说当年在南通演出话剧时的精彩实况，熟记于心的剧本台词不时脱口而出。有时作抗战演讲报告，他也喜欢将台词恰当地穿插在自己的话题内，让演讲报告变得生动动听。有一段时期，反动当局为了制止青艺剧社演出进步剧目，有意将包场费提高到剧社无力承担的程度，以此来刁难、扼杀青艺演出。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季天择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自行车，拿出钱来，交包场费，让话剧继续演下去。在季天择这样一批进步青年的努力下，青艺剧社在三年的时间里，上演了20多个大小话剧。抗战胜利后，青艺剧社的不少演员，陆续奔赴解放区，走上了战斗第一线。季天择为了心爱的话剧，则选择了留在危机四伏的城区。他和剧社其他成员一起，重整队伍，扩充力量，继续上演了《风波亭》《梁上君子》《夜店》等剧。

1946年2月（农历正月半），季天择参加了在官地街古城隍庙召开的第一次南通文艺晚会，接着，又参加了三次文艺晚会和成立文艺协会的筹备工作。1946年3月17日，南通文艺协会成立，决定第二天组织群众队伍去欢迎“三人执行小组”到南通来。正在排练《夜店》的季天择非常积极地参加撰写《告南通同胞书》《南通人民意见书》，准备标语、传单，为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做了充分准备。

3月18日一早，春寒料峭，南通中学、南通女子师范等校的青年学生数百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集合地点——实验小学（解放后为北濠小学）。季天择和孙平天合力擎着一条青布的横幅，横幅上面用红纸写着“南通文艺协会”六个大字，走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引领着这支青年队伍，冒着蒙蒙细雨向大码头进发。他们一路上高呼“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取消苛捐杂税，解除民生痛苦”等口号，队伍在行



进途中不断向市民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南通城的主要街道，激励了广大群众，一路上不断有市民、职工、店员加入队伍，汇集到执行小组的必经之路大码头守候。

从早晨等到中午，执行小组还没有来。官办的欢迎队伍“民众团体”已经散去。“南通文艺协会”的青年们仍然精神抖擞，坚决等待。钱健吾、陶应衍当场创作了一首新歌《坚决等待》，善于唱歌的季天择及几个同志立即分头进行教唱。歌声很快在队伍中传开，在歌声和雨声中，已经壮大到1000多人的文协队伍继续坚持着。

季天择和战友们在风雨中坚持等待了8个多小时，下午4点多钟，执行小组人员乘坐的汽车才在公路上出现。但还没有来得及点燃欢迎的爆竹和喊出欢迎的口号，汽车就飞快地驶过去了。国民党当局企图不让执行小组与人民群众接触。军警们如临大敌，用长枪刺刀阻拦欢迎队伍。文艺协会秩序井然的欢迎却受到反动当局百般阻挠，季天择和所有参加游行的青年被激怒了。他看出反动当局的阴谋，马上和青年们高唱着歌曲追随汽车奔赴执行小组的住地桃之华旅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周边布下三道铁丝网，并架起机枪，封锁游行队伍的去路。季天择与同伴一起，机智而顽强地冲破了一道又一道铁丝网，终于到达旅馆门口，要求会见执行小组。

暮色渐降，雨点也大了起来。青年们仍坚持不散，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反动当局焦急万分，无计可施，只好同意派三个代表进去，将请愿书交给执行小组。晚上7点多钟，美方代表邓克中校终于出来跟季天择他们见了面，并答应参加第二天的茶话会。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当晚，季天择和“青艺剧社”的一些青年学生又进行了一次夜间的环城游行，还特地到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和警察局门前示威。直至晚上九时以后，才结束了整整一天的战斗。

第二天，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只有随执行小组采

访的新华社记者参加了文艺协会在女子师范举办的茶话会。虽然明知有特务在严密监视，季天择还是勇敢地向记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南通城的黑暗统治和伪造民意的恶劣行径。

南通青年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惶失措。执行小组还未离开南通，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用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来压制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一批善良有为的青年和志士，被南通城里的法西斯特务列入了血腥镇压的黑名单，季天择成为主要被捕杀的八人中的一个。

自3月21日起，南通文协的顾迅一、孙日新、郑英年三人相继失踪，白色恐怖笼罩着通城，参加“三一八”游行者家家惶惶不可终日。母亲要季天择离开南通，但季天择却认为：

“民主力量不能削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我走了对不起被捕的朋友。”他不顾个人安危，无所畏惧地为营救难友致函上海《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呼吁社会声援。

4月2日，钱素凡老师在南大街嘱咐季天择的女友转告天择，及早避难。

4月3日下午，孙平天的尸体浮于江面。这时，陶应衍来探望季天择，催促天择速走。当夜，陶应衍未敢独回，留宿在季天择家。深夜，大门外不断有杂乱的脚步声，窃窃低语声，还有四处乱射的手电光。这时，单纯、天真的季天择才意识到敌人真的开始下毒手了。

4月4日，季天择匆匆决定和女友一起离开南通。当天，他们在任家港码头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但船行驶出十几公里后，被反动派勒令返回，乘客们全被驱赶上岸。季天择和女友混在人群中进了一家小饭铺，刚坐下，就被按照片搜查的特务带走了。

噩耗不断传来，罗镇和也被捕了，就在季天择被捕的同一天夜里，钱素凡老师和记者戴西青也被捕了。

4月5日，季天择被特务捆绑投进江里，惨遭秘密杀害，光荣牺牲，年仅21岁。



老巷·名人

——彪炳寺街史册的骄子

南通古代、近代、现代的史脉在寺街纵横交错；

南通科学、教育、艺术的文脉在寺街相汇相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史迹文气辉煌的寺街，蕴育出含金量不菲的众多名人。名人的聚合效应，将寺街推向世界。

状元胡长龄

胡长龄，清乾隆五十四年大魁天下，为通州城里唯一的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国子监祭酒，并主试山东，官至礼部尚书。

胡长龄童年时聪明而调皮，他常到附近的光孝塔登塔玩耍。有一次他踩着栏杆，双臂抱着檐角玩，不料脚下一滑，整个人悬在了半空中。胡长龄人小心大，临危不慌，紧紧



胡长龄状元府

抱住檐头，不呼救、不乱动，缩起双脚，轻轻回荡。当双腿荡到栏杆内时，身体猛地向内一摆，手一松，顺势跌落在栏杆里，救了自己一命。胡长龄少年苦学，每天都在园中那棵如亭如盖的古罗汉松下的书房里秉烛苦读至深夜。有个卖汤团的老人对他深为佩服，每晚经过此处时都要敲敲窗子，递上三只汤团让他充饥。

后来，胡长龄又受业于学识丰富的老师孙奎。孙奎是一位要求严格又深爱学生的老师，近于苛刻的言行充满对门生的疼爱与期望。胡长龄虽然已是秀才，但所写制义文、应试诗等，常挨孙奎批评。胡长龄认真听取，逐条改进，学业和道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待得其园内“乾隆庚子竹间生芝，曠畷有云覆果，为已酉大魁之兆”时，胡长龄高中状元。胡长龄金榜题名后在京供职，每晚都高燃红烛，不忘读书，遍阅经史，又工诗赋，史学造诣尤深，为同僚推崇，著有《三余堂集》《馈赋偶存》



等，有“胡史汪经”之说。

胡长龄与刘鏞、和珅为同时代人。照封建科考礼仪，殿试得中的进士都算是当朝宰相的门下，能得到宰相的庇护，是为官之人求之不得的事。但是，胡长龄深知和珅是个弄权枉法、贪得无厌的奸臣，决不能与之沆瀣一气。相传他就没有到和珅处拜谒。和珅很恼火，就让胡长龄当个有职无权的翰林，写写“应制诗”，“陪太子读书”，无利可图，逼其就范。谁知胡长龄最爱做学问，进了翰林院如鱼得水，有了博览皇家藏书的好机会。胡长龄当了十年的翰林，每天四更起身，燃烛读书，直到天亮，然后视事。虽财物“典鬻殆尽”，有时只得以西瓜皮腌制成咸菜下饭，但仍不屈服。一位爱才的友人想改变胡长龄那损及健康的清贫，就在和珅做寿的时候，用乌贼鱼研制的墨汁仿胡长龄的字体写了一副寿联送给和珅，并且请了一位侍郎对和珅说：“胡长龄又穷又病，没得一件好衣裳，不能亲自来贺寿了。”和珅听说宁折不弯的胡长龄终于臣服于自己的脚下，带着征服后的愉悦送了一个顺水人情。没过几天，朝廷就下诏任命胡长龄为山东学政。还是胡长龄的这位朋友，仍用乌贼鱼墨汁写了一个谢帖，趁和珅不在家时送到和珅府上去。后来和珅倒了台，被抄家时发现朝廷大臣都与和珅有来往，唯独没有胡长龄的只字片纸，因为乌贼鱼墨汁有神奇的消除字迹的功能，当初的寿联和谢帖都成了白纸。就因为同和珅没有牵涉，且为人正直、公正廉明，胡长龄得到嘉庆皇帝的赏识，官职逐步晋升到礼部尚书兼户部职。他身居高位，更加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公而忘私，终因操劳过度，体弱多病，等到皇帝批准他的要求，让他回家调养时，已重病缠身。在归途中，舟行到山东临清时，胡长龄忽然大吐血，死在舟中，终年57岁。胡长龄虽官至尚书，却一生清廉，身无长物，唯有在寺街留下的南通城唯一的状元府，时隔数百年，至今尚存。

福建按察使徐宗幹

明文爵公之后徐宗幹(1796—1866),字树人,号伯桢。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进士,历任山东、四川、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县、州、府、道地方长官及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其任台湾道台、福建按察使11年间,为维护我国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徐宗幹

徐宗幹每任官一地,都整治水利,修繕书院,撰修地方史志,“数月案无留牍”,政令深得人民的拥护。徐宗幹于道光元年(1821)任曲阜县知县,旋补武城县知县。道光二年,暴雨洪水使运河大堤口决,他冒雨驾小舟周历灾区,指挥堵决口,置义仓,抚恤灾民,受到山东巡抚琦善敬重。道光四年调任泰安知县,十三年升高唐州知州,十七年署临清直隶州知州,十八年升济宁直隶州知州。前后在山东任知县十二年,曾修繕泰安岱麓书院、高唐州鸣山书院、济宁渔山书院,设澧泉义塾;搜集、整理、出版明代山东文人诗歌集,主修了道光《泰安县志》、



道光《高唐州志》、道光《济宁直隶州志》三种地方志；还积极整治了临清运河，兴修水利，疏浚了济宁的牛头河，主持沟通了运河，筑建了蜀山湖堤，修建了许多大小民堰，规划修建了护城河，形成了布局合理的水陆网络，使那时的水利、水运有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

道光二十二年（1842），徐宗幹受帝召见，旋授四川保宁知府、代理川北道台。道光二十三年升福建汀（州）、漳（州）、龙（岩）道台。

道光二十七年（1847），闽浙总督刘韵珂认为徐宗幹在汀漳龙道任上“廉正明达，精勤果锐”，“除暴安良”，可任大用，密疏荐为福建台湾道台。自此徐宗幹以按察使銜任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六年。徐宗幹在台湾任职期间，实实在在地为台湾人民做了一系列好事。

时值《南京条约》签订不久，列强对台湾虎视眈眈，动辄以“违约”要挟清政府。徐宗幹著《防夷论》，定“台湾绅民公约”六：一曰勤瞭望，二曰联声势，三曰查奸细，四曰选壮丁，五曰筹经费，六曰备器械。各乡各社纷纷组织民团，同仇敌忾。因此，在徐宗幹任职期间，列强始终无法插足台湾，鸦片禁绝，“吸烟者几不为人齿，一时殆尽”，而且“盗贼为之敛迹”，“闾里益臻清静”。当时，台湾因多次战乱，财政枯竭，吏治腐败，“各省吏治之坏，至闽而极；闽中吏治之坏，至台湾而极”，以致“富民贫，贫民益贫，而官亦因之而贫”，甚至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谚。徐宗幹以为“宜急轻赋税，收人心。其迹似损，而所益实大”，故上任伊始即大力“整饬吏治，剔奸除蠹”，“汰陋规饷五十万金”；裁减冗兵，整顿军纪，加拨军饷，改革船政，以纾民力。清政府长期严禁台湾开垦，经徐宗幹反复陈述利害，终于得允开禁抚垦，设水沙连六社、埔里社等屯地，“召佃垦荒，以给屯饷”，极力振兴民生。

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台湾遭遇水灾,“田园庐舍多被冲坏,人口亦多淹弊”;冬季又发生地震,“城垣衙署均有坍塌,并倒坏民房,伤弊人口,小民困苦流离”。徐宗幹一方面“捐资首倡”,“劝捐赈恤,有鬻子女者,赎回之”,拨款组织赈灾;同时大力兴修水利,将鹿耳门溪、曾文溪等河流下游水道取直疏浚深掘,并施人工排洪措施,水患大减,至今受益。

咸丰二年(1852),徐宗幹果断地打击在台湾“结盟竖旗”闹台独的王勇、“叛逆”搞分裂的洪纪等人的活动,为维护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立下大功。总督季芝冒为此疏请朝廷为其“赏带花翎”。咸丰三年(1853),洪泰、杨文爱、吴瑤等谋反,竟攻下台湾、凤城两县,并向郡城进逼。徐宗幹未向内地求援,与总兵恒裕认真指挥布置,以精确的战略、灵活的战术,逐步平定这次叛乱,稳定了大局。咸丰四年正月升福建按察使。

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因战乱不断而焦头烂额的咸丰帝见徐宗幹有军事才能,匆匆召见了,他,派他四处平战乱。先派徐宗幹到河南帮同英桂。咸丰六年,又派他赶往安徽帮同福济对付太平军。咸丰七年,浙江再次告急,又委任他为浙江按察使,赏加布政使衔,代理布政使。咸丰九年(1859),正式任其为浙江布政使。同治元年(1862)升福建巡抚。同治二年,平定台湾戴万生为首的叛逆,后又与江苏巡抚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等镇压闽、赣、粤等地太平军、小刀会起义等。徐宗幹因时“兵燹之余,创痍未复,地瘠民贫。思想培养元气,寝食皆废,心力俱瘁,以劳勩卒于官”,同治五年十月,勤政爱民的徐宗幹卒于任所,“身后萧然,无异寒素”,“公之薨也,闽人无不流涕者”。闽浙总督左宗棠上折称:“宗幹循良著闻,居官廉惠得民,所至有声。”清廷下令“优诏褒恤,谥清惠,入祀福建名宦祠”,



“历任政绩，着编入国史循良传”。

徐宗幹擅诗文。由于宦游南北，人情练达，阅历丰富，世事洞明，加上学识渊博，基本功扎实，故作品气势开阔，文笔刚劲，富有哲理性。其《斯未信斋全集》二编，二十六卷，咸丰年间雕版，线装，共十二册，由南通市图书馆珍藏。徐宗幹一生，其主要贡献是任台湾道台、福建巡抚期间，自觉或不自觉地跟分裂台湾的种种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维护了宝岛与祖国大陆的统一，维护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手足深情。

从徐宗幹开始，这支徐家便是通州城里200多年的大富户，其后代以贩运棉花外销起家，开花行、布行、钱庄，特别是开了更多的当铺。上代有了钱，后代便能潜心做学问、求功名，有人中过举，又有做官做到知府的。州志和其他地方文献上都提到徐家出钱放赈、修庙、修桥等善举。

此徐宅范围很大，北自寺街2号，南到西大街，东自寺街，西到现老天宝银楼三分之一处。庭院里不但缀有数个小花园、亭台，还有青砖黛瓦的小跨院数进，并筑有很气派的四幢楼房。

“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

李方膺，清康熙、乾隆年间卓绝于古通州的著名画家，饮誉画界的“扬州八怪”之一。

李方膺，康熙三十六年（1697）生于寺街一个书香门第（现为寺街31号），号晴江、秋池，字虬仲。李方膺的父亲李玉铨，为康熙四十五年（1715）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是位体恤民情的好官，李方膺以其父为榜样，青年时就曾为自己预设“奋志为官，努力作画”两条路。但李方膺的仕途较为坎坷，虽曾先后六次担任州县官，是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但是，他刚正不阿，言行屡屡得罪上司，仕途几遭艰险。他首次为官，系山东乐安知县。到任第二年，乐安大水，近乡田庐漂没，灾民爬上树梢。他申详到青州府，要求开仓发赈救灾。在久等批文未到的情况下，毅然担责，开仓赈灾，同时，以工代赈，修筑堤防，解决水患，使淄水不再泛滥。后遭人详参，幸好河东总督力护，未遭处分。后任莒州知州，亦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莒州人说他“廉明仁恕，果、达、艺三者兼之”。官任山东兰山（今临沂）知县时，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因对上司不卑躬屈膝，不送礼讨好，并反对总督开垦扰民而下狱。百姓们非常着急，纷纷带上许多吃穿用物，去监狱探视。当狱卒不让进去时，他们便把带来的东西隔墙扔进去，结果，竟把监狱房子上的瓦沟都填满了。李方膺出狱后，历任安徽潜山、合肥知县，但因其为民说话，不善逢迎，导致仕途失意，被劾去官，宦海生涯就此结束。仕途的中绝，对



李方膺的书画艺术来说却是件好事。正如其好友袁枚诗云：

“人夺山人七品官，天与山人一枝笔。笔花墨浪层层起，动摇春光千万里……”李方膺虽被罢了官，却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使他在绘画上得到了很大的自由。他的画又达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艺术境界。

李方膺为官清廉，积蓄无多，弃官后已是两袖清风的清贫之士。为此他常西赴扬州卖画为生，与金农、郑板桥等交往密切。同“扬州八怪”的其他画家一样，李方膺也寄情于梅兰竹菊“四君子”，以笔墨来营造其孤傲的精神天地，以丹青来倾泻他生命的激情，借绘画发泄心中不平之愤。同时，他很注重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尤其是题画诗，总能直抒胸臆，把画境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李方膺晚年寄居在金陵淮清桥北友人项氏那“大水照窗前，新花插屋底”的花园内，自号借园主人，以卖画为生，并常出游。这时他的画更自由挥洒，由肆而奇，画上有他的情绪和人格。作品墨气淋漓，



“扬州八怪”李方膺故居

别开生面，颇为时人推崇。他画竹，笔墨纵放，苍劲矫健，时出新意，超出前人。他题风竹的诗更是豁达大气：“自笑一生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题画松：“如君已赋归田去，肯复低头事大夫。”画和诗都在为自己写照。他不仅画风竹，还画风松，他画的不是轻风，而是狂风、暴雨，画狂风中不屈服的竹和松。这在他以前的画家作品里几乎是没有的，他也为此自矜：“画史从来不画风，偏于难处夺天工。”这也正是他的一种风骨。

李方膺生平最喜欢梅花。当年，他曾在寺街梅花楼的前后手植梅树三十余棵。后来，又在新建的画室梅花楼的门窗上下透雕上精致的梅花图案。乾隆十三年（1748），李方膺代署滁州知州，入城后，还未见客就打听欧阳修手植的梅树在哪里。当得知就在醉翁亭时，他便急忙赶去，见到梅树以后，他立即铺毡跪地而拜。观盛开的梅花他如痴如醉，对未开或凋谢的梅花他也情有独钟。他有一方印章，刻着“梅花手段”四个篆字。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性爱梅，即无梅之可见，而所见无非梅也。日月星辰，梅也，山河川岳，歌童舞女，亦梅也……知我者，梅也，罪我者，亦梅也。”观梅无数的李方膺对画梅取舍极其严格：“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他晚年专攻寒梅，写梅纵横跌宕，以雅逸、古朴见长。他笔下的梅花强悍地表现出清高、倔强、愤懑，正如他所作的梅花图题图诗所说：“天生懒骨无如我，画到梅花便不同。最爱冰枝长且直，不知屈曲向春风。”评者谓其画梅“独具静逸气”，用笔倔强放纵，不拘成法，苍劲有致。郑板桥评价他画的梅花是“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

乾隆二十一年（1756）秋，客居南京的李方膺因病回到故乡，九月初三日在家中与世长辞。据丁有煜说，李方膺临终前，在棺木上写下了一生的遗憾：“吾死不足惜，吾惜吾



手!”的确，像他那样杰出的一双画手，停止作画，是令人叹惜的。

李方膺父李玉铉官福建按察使时，居东门外四根桅杆，而寺街宅乃其故宅。后李方膺居于此。李方膺的故居分三部分，寺街31号小院内为李方膺的居住区，最北有正屋三间，堂屋、卧室一应俱在，旁有零星偏舍，大门堂位于东南方。寺街29号是一个较大的花园式庭院。当年这里遍植梅树，李方膺曾留下了“故园好种梅三十，雪夜寒窗读父书”的诗句。院内的主建筑是建于清代的青砖青瓦亭子间一幢，东、南两面有构造典雅的空花木栏围护回廊，这使得老屋平添几分含蓄典雅。庭院里弥漫着浓浓的绿意，偏西墙边当年植满梅花的地方，如今斜出着一棵柿子树，枝繁叶茂，收获季节，树上挂满了小红灯笼似的柿子。树下有一口石栏古井，井口被井绳磨出道道细痕，清亮光滑。再西靠墙为一排花台。想来当年也是挤挤挨挨的梅树生长之处，李方膺曾踱着方步，在此冒雪赏梅。如今庭院里那铺设着散发温润光泽的鹅卵石地面的缝隙间纤纤细草摇曳，别具一番风味。整个庭院的景色，富有诗情画意。庭院的南侧，原有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精巧别致的“梅花楼”，硬山式楼顶，楼下朝南三间，楼上有明三间、暗三间，暗三间向北延伸的部分在楼下形成了一个过道，正好通往西北边的小花园。此楼上下清一色的透花门窗，南北两边的门窗栏板，都有精雕细刻的梅花图案。据说当年门板上还有郑板桥手书的四言对联。楼檐四角悬挂着铜铃，微风吹拂，发出阵阵悠扬的铃声。环楼遍植的梅花，暗香浮动，这就是李方膺当年写诗作画，也是当年文人画家经常聚会的“梅花楼”。“扬州八怪”中有遗墨证明到过通州的，就有郑板桥、李复堂、黄瘿瓢、罗两峰等。“壬戌十月（即乾隆七年，1742），学使按临。通属皋泰两邑墨士文人聚集崇川，适晴江招同人饮梅花楼，杯盏残菊，款洽依

依……”李方膺对这座小楼情有独钟，甚至在外地的作品上，有时也署“写于梅花楼”的字样。他在安徽时也有诗云：“水部风流思入梦，梅花楼上酒千杯。”可见梅花楼在他心里的位置。李方膺去世不多年，因其妻陈氏乐善好施，其子李霞亦不善治生，结果卖掉了寺街部分的房屋（寺街31号），移居北郊钟秀山附近。“梅花楼”后为进士王尤所得，今仍有王尤后人居住。



清代科技发明家蒋煜

居住于胡家庵巷内的蒋霁山之子蒋煜，字秋田，生于1780年，为清代有名的科学发明家。在200年前就发明了中国古代天文科技史上神奇的瑰宝——多功能浑天仪，对航海航天、天文气象、军事民用等诸多领域的观测比对、计算运作具有极高的指导和实用价值，不仅可与东汉科学家张衡的浑天仪媲美，而且在当时世界上居有无可置疑的领先地位。

蒋煜从小生活在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生活在文人雅士云集的寺街，长期的耳濡目染，使聪慧的蒋煜成长为极富诗画才情的俊伟青年。

蒋煜善画画，且“工写真，纸上有生气”。据《淡远楼书画目录》记载，蒋煜作贺寿人物画，极为精致生动。此画宣纸本，纵四尺一寸，横一尺六寸，彩笔，并题有自作的诗：“兴酣走笔欲通神，写出蟠桃会里人。潇洒童颜披鹤发，年年留取祝长春。”

蒋煜年青时便“精九数”，精通天文、历法、数学，擅长于天文仪器。他对前人的发明、创造作了详尽的研究，善于融会各家之长，站在前人的肩头，“独有心得，为前人所未发方之”，并竭尽全力，以超越前人。

东汉科学家张衡利用计时器漏壶滴出的水发动齿轮系统，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使浑天仪的转动与地球的周日运动相等，从而将天象准确地表示出来。遗憾的是张衡所制水

运浑天仪的复杂传动系统制作没有能流传下来。

蒋煜思接今古，发明制作了机械运作的浑天仪。他先以杉木作圆胎，“上画黄道、赤道、十二宫线、三垣、二十八宿以及恒星、客星、天河。其色之深浅，光芒之大小，悉与星象准”，从颜色、光芒、位置上逼真地再现了星象。然后，从赤道剖开，在内里装上经过精密计算制造的机械钟的各种传动装置零件，运用钥匙开动，能走十日或半月。蒋煜所创制的浑天仪比张衡所制更为玲珑精巧，运转自如，观星测晷，了然心目，并能准确地显现出恒星日与太阳日之间的差别。蒋煜还在浑天仪上设法使太阳依黄道而行，冬夏分南陆北陆，准确地表现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运动关系。更神奇的是昼夜之分与二十四个节气，都能在浑天仪上得到显示。

当时为科学发达的西方人制造并吹嘘的“天球”，不仅不能“自运”，更不能定时刻，远远落后于蒋煜创造发明的多功能浑天仪。

蒋煜不仅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以机械钟为动力的多功能“浑天仪”，还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万年仪表（《崇川咫闻录》称“万年表”）。此万年表内藏水银，内部有一系列控制装置，以水银趁力配合摆牌、游丝相助作开合，终年可以自行，而且其力甚微，一切齿轴永无损伤之虞。这种一下子可走一年以上的自动钟，“终岁自行，较西器尤良”，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没有的。蒋煜的同辈人亲眼目睹他那些神奇的发明后，由衷地赞叹道：“虽西人（外国人）亦未闻此法，诚创制也。秋田天姿敏慧，于此类中独有心得，为前人所未发方之……亦吾辈中之异人也。”

蒋煜还“终其身为天算，解风角之术”，有着非常灵敏的预测能力。有一晚，东邻友人范崇简在蒋家后花园的大皂荚树下为蒋煜等一帮友人操缦弹琴，凉风习习，柔音袅袅，人们的思绪随弦声起伏，忽然，七弦崩断，举座皆惊。唯蒋煜



神情淡然，“占之曰：‘某日加某时，雷击前苑柘树，（人）无患也。’至时，曾王父共守之，果大雷电以震枝干尽焚，色不改而内作炭屑。其他占验无不应者”。

既有诸多科学发明，又精通天文地理且能运筹帷幄、胜算预测的蒋煜很得时人的敬仰。张謇先生也对蒋煜充满敬意，推崇备至。范铠编撰、张謇续纂的《南通县图志》对蒋煜有很高的评价：“惟是前世士类，不以巧思成物为异能。独蒋秋田为浑天仪及身而见夺，不复有传人为之。”

胡适的老师、翻译家白作霖

白作霖，系民国时期教育界名流、著名翻译家，为胡适先生的老师，鲁迅先生的同僚，白雅雨烈士的族侄。他开中国教育比较法之先河，又是中国行政法研究的鼻祖。寺街3号为白作霖宅。

白作霖字振民，号质盒。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是1897年首批入南洋公学的师范生，专攻日语。光绪二十五年（1899）留校任教，任中院三班的教习。他就教学安排、如何编译教科书向学校提出建议，强调要改变轻中重西的倾向。

光绪二十七年（1901），宁波帮的先驱叶成忠在上海办叶氏私立的澄衷蒙学堂，请南通张謇题写校名，并石制，嵌于前埭屋前。武进刘维屏任学校校长；聘蔡元培任总教习（教导主任），临海章一山任副教习；南通白作霖为监起居（舍监），后任总理。白作霖族叔白雅雨也曾



白作霖



在澄衷学堂执教史地，后任教习（曾是李大钊的老师）。在此期间，白作霖和白雅雨结识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教员蔡元培、张尉西、纽永建等人，并与从事革命活动的章太炎、章士钊、王葆贞等交往。

白作霖在澄衷任教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译著事业。我国正式开启比较教育研究，学界普遍认可的，以1901年刊载专门研究万国教育文献的《教育大世界》之创刊和1902年由白作霖从日本翻译的《各国教育制度》译著问世为标志。从那时起，涌现出一批知名的比较教育大家，如蔡元培、陶行知等，他们的比较教育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被我国比较教育界奉为经典。

中国引进的第一本外国行政法专著《比较行政法》，1902年由白作霖翻译出版。此书为美国葛德奈原著，1893年出版于美国纽约，是行政法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此书主要针对初学行政法的读者，故言语通俗晓畅，并为进一步研究指示途径。中国古代虽有庞大的官僚机构，也有非常严密的行政官制体系和规范，但是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由白作霖将此书介绍到国内后，对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洋政府在此基础上开始行政法实践，成立了平政院“审理纠弹事件、不防及司法官署之行使职权”，

“行政诉讼经平政院裁决后，不得请求再审”。至南京政府时期，我国的行政法已成为当时“六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白作霖还翻译了《小学各科教授法》（〔日〕寺内颖，几崎为槌撰）、《各科教授法精义》（〔日〕森冈常藏撰）等，并在光绪戊戌年间就出版了著作《质盒集》二卷。

白作霖在介绍西学和自己写作的同时，全力倾注于培育青年学生，造就了一批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1905年，白作霖任澄衷学堂总教。胡适原在梅溪高等小学上学，因白作霖与胡适的二哥胡觉是南洋公学的同学，且为好友，在白作霖

的劝说下，14岁的胡适转到澄衷蒙学堂就学。胡适在校学习优秀，活动能力强，被荐为班长。胡适并没有能在澄衷蒙学堂毕业。离开澄衷的说法有二，一说是班上一个学生被学堂开除，胡适为之打抱不平，向白作霖总教（校长）提出书面抗议。白作霖虽然爱惜胡适，但还是悬牌记胡适一次大过。胡适心中颇觉不平，辞去班长之职。此时，恰好创办才半年、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公学招生，胡适应试后被录取，便离开了澄衷蒙学堂。另一说是胡适因操衣不够，班级未出操，亦影响他班。白作霖悬告示牌四次，责怪胡适，并撤去班长之职。二说分别见于胡适的日记和自传。胡适日记始记于澄衷，与白作霖的冲突也记在日记里。

离开澄衷蒙学堂以后，白作霖北上京师，在教育部供职。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京师译学馆提调，担任教育行政工作。

1912年1月2日，滦军在白作霖的堂叔白雅雨策动下宣布起义。1月4日成立北方革命军军政府，白雅雨任参谋长。起义军向天津进军，车至雷庄遭清军断堑阻击。白雅雨于古冶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面前，他瞋目叱曰：“吾为国革命，自当为国死。”1月7日，在开平刑场上，白雅雨等7人慷慨就义。白雅雨殉难后，身为其侄子的白作霖痛悼不已。北京红十字会联系白作霖为白雅雨烈士收尸。白作霖与白雅雨的同事王法勤、地学会会长张蔚西、女师学生后为其儿媳的黄守璟等，前去刑场认尸。事先大家议定白雅雨遗体有四个特征：白作霖回忆叔叔脚底有一黑痣；张蔚西说在天津分手时，分剪一块白色包脚布；另据传出来的消息说，白雅雨被先砍断一腿，后斩其首；四是老师王法勤、女学生黄守璟亲耳听过、亲眼见过白雅雨展示过的“百色带”。最后，大家在冰天雪地里的尸体堆中认真地细寻，终于找到一具缺头、断一腿、腰间有根血染的“百色带”的遗体，为白雅雨收尸。

白雅雨殉难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和南



通各界人士先后举行了追悼会。1912年9月，时刚任中华民国临时教育部佥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中央官署中荐任级之官）的白作霖护送白雅雨灵柩归葬于狼山大观台东侧山路旁的坡地上。民国成立后，冯玉祥将军在北京西温泉为滦州殉难烈士们营建公墓。冯玉祥将军还报请国民党政府追赠白雅雨烈士将军衔，发给了优厚的抚恤金。

1914年4月21日，全国儿童艺术展览开幕，白作霖、钱稻孙、陈衡恪等人为审查员。由他们就展品分项评比甲乙等第，发给奖状以资鼓励，并从展品中选取125件送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展出。

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定文官为九秩，7月26日发出大总统令：“国务卿呈据铨叙局详称遵核司法教育两部秘书会事视学技正各员资格请予分别叙官等语。”白作霖被授为中大夫，中大夫为第五秩，从四品下，比南通州官还要大一级。在同一张任命书上，周树人（鲁迅）授为上士，为第七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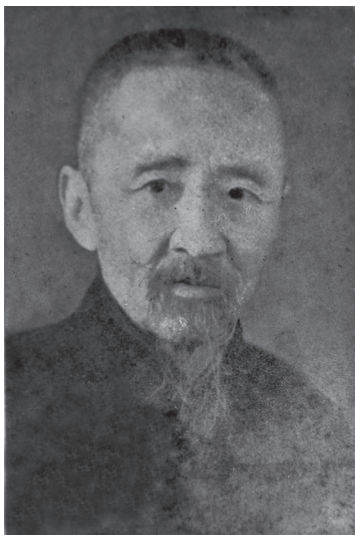
1917年，白作霖先生在返通所乘的轮船上，因脑溢血去世。著名诗人陈三立为其撰挽联：“尽书生毕生之力，不能得强豪一日之欢，薄宦悲凄，最后可怜犹客死；论士大夫及身之廉，无非为百年子孙之享，高门再造，从今只有望儿曹。”张謇为其所撰写的挽联是：“仁为贫乎，仕与曹部为迁流，不贫有几；死犹归也，死于道涂之况瘁，其归可伤。”两挽联都赞扬白作霖为人清廉，终身保持着书生本色。

寺街3号原为白氏老宅，其祖上将此宅典出，迁居葺子巷。白作霖后将此宅前半部分购回，原来的后院即为李方膺的梅花楼。白作霖规划重建后的宅院十分精致。进大门、二门，鹅卵石铺地的天井里是一幢四面玻璃的大亭子间，对面为名贵树木环绕的假山。亭子间的斜对面为两层小楼。向西进提闷门，为两排朝南五间的正台。西南角还有一大花园。

国学大师徐益修

寺街上的华王庙后有株枝叶茂盛、树龄数百年的银杏树，这就是南通四才子之一、近代国学大师、南通人称之为“徐大夫子”的徐益修和他的弟弟古琴家徐立孙的故居。

徐益修，名昂，字益修，号逸休，1877年农历十月初十生于南通寺街59号书香世家。徐益修是位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集前哲大成的现代易学大师、声韵学大师、博学大师，他的研究成果一直得到当代国学界很高的评价。



徐益修

徐益修10岁时遵父命师从管仲谦先生。1898年（22岁）往海门狮山书院就读，以第一名入庠。1900年，问业范伯子先生，后在江阴南菁书院肄业，治诗古文辞。因无意功名，不再应试。

自1908年始，徐益修先后任教于通州师范、南通中学、南通女子师范等校。课暇致力于国学研究。1935年后任杭州之江大学教授。1939年兼任无锡国专教授。



徐益修秉性淡泊、不慕荣利，一生守正不阿，从不屈从于邪恶势力。抗战前，有位政府官员慕其名愿以200银元为润笔之资，恳请为其母六十寿诞作序，徐益修不屑动笔，婉言谢绝。对一位孤苦廉介、泊然无营的书生，徐益修却不待邀约，不吝笔墨，写了《丁老人传》。在南通中学任教时，徐益修特为专司校钟的工友写了《书陈老人》，称赞其勤谨守职的行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徐益修自沪返通，虽全家断炊仍严拒日伪政府的聘任和馈赠。次年，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穿越封锁线，赴设在苏中四分区的南通县中温家桥侨校任教，每月以领公粮养家过清贫生活。徐益修“饥犹择食”的名言，遂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广为传颂。抗日战争胜利后，徐益修因年事已高，退休故园，整理毕生著作，汇编《徐氏全书》。

徐益修潜心治学、孜孜以求数十年。为更好地教学，他持之以恒、循环背诵《康熙字典》、英文字典、日文字典，背熟一页即撕去一页，人称“三典先生”。徐益修博古通今，一生致力于国学专著的撰述，数十年如一日，尤其对《周易》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易经》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之作，是汉学群经义理之源，是人类文化史上最著名的古代典籍之一。西汉今文易学的开创者京房（前77—前37）曾著《京氏易传》三卷。前人晁景迁曾经用象数辨证《京氏易传》文字的错误，但晁氏此书的错乱讹误仍层见叠出。徐益修通过深入研究，决定以纠正前人的错误为己任。徐益修治易学、音韵学没有师承，“又无愿得之书”，全靠自学，艰难到了极点。但徐益修义无反顾，“乃殚思竭虑，研索推求，坐卧眠食，舟车旅寓，随时随地，神思系焉”。他曾说：“学问难，我无奈它何；我不怕难，它亦无奈我何。”其治学态度的谨严和坚毅于此可见一斑。1911年，徐益修痔疮大发。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生用铁针穿线自左臀刺入，绕及腰部，前

达胯际。这种剧痛非常人所能忍受。而徐益修在手术过程中仍不忘钻研，“强记默诵，忘其疾苦”。1933年，徐益修患瘟疫，病情危重，在病危之际，他仍“挂念著稿，它无所系，虽然待尽”。徐益修就这样将做学问做到了忘我的地步。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徐益修终于完成了《京氏易传笺》（《徐氏全书》第一种），这是两千年来第一部对《京氏易传》加以正确注释的专著，其中对晁著的谬误也一一订正。徐益修这部专著直追汉儒，发京氏易的奥蕴，穷其本源，剔抉精微，阐前人所未明，还京氏易以本来面目，使濒临绝学境地的西汉易学重现异彩。

中国的《易经》不但流传至今，而且早在17世纪就传入欧洲，后来越传越广，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周易热”，徐益修的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徐益修的易学巨著当推《周易对象通释》。该书以归纳为原则，全面、精辟地通过分析对象，贯通易理，阐明消息变化之道，使《易经》理论的笺释达到融会贯通、和谐完美的地步。徐益修自1929年起，有关易学、音韵学、杂学的专著单行本陆续问世，共著有《易林勘复》《京氏易传笺》《释郑氏爻辰补》《周易虞氏学》《周易对象通释》《诗经声韵谱》《楚词音》《石鼓文音释》《说文音释》《等韵通转图证》《诗经形释》《文谈》《马氏文通正误》《休复斋杂志》等30余种国学专著，计120万字。1952年汇编为《徐氏全书》出版，入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国外都知晓《徐氏全书》这部巨著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20世纪70年代初，海外亦精装出版了徐益修的部分国学专著。徐益修的易学专著继往开来，为中外易学研究者深入研究《易经》指明了途径，提供了方法，扫除了障碍，开拓了世界易学发展的道路。

徐益修以诚待人，学术讨论无门户之见。对学生循循



善诱，造就的人才遍布各地，如原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建功，原山东大学副校长、深谙中古文史的陆侃如，原浙江文史馆馆长王焕镛，全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从周以及任铭善、蒋礼鸿等著名教授及国画大师王个簃等均为徐益修的入室弟子。徐益修端方高洁的人品和渊博的学识，深受学生爱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益修任南通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并受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53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徐益修病逝于休复斋故居。

著名古琴家徐立孙

徐立孙，名卓，世居南通寺街59号。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



徐立孙

徐立孙是著名国学大师徐益修的六弟，年少长兄20岁。其18岁即丧父，由长兄徐益修哺育成长，深受其兄教诲和熏陶。因受古文学、音韵学的影响，徐立孙幼喜音律。1917年徐立孙在南京高等师范求学时，即从山东诸城王燕卿（号宾鲁）学古琴，又从海门沈肇州（字绍周）学琵琶，从海宁周铃荪学西洋音乐，皆悉心钻研，造诣极深。毕业归里后在南通各中学教音乐及生物学等。1920年以后，梅庵琴派的活动中心从南京转移到南通。1929年，徐立孙与邵大苏组织梅庵琴社，向青年传授古琴、琵琶等，优者有南通人杨泽章、陈心



园、夏沛霖和镇江人刘琴子、吕德宽等。后来经这些弟子再传授，生徒愈众。随着《梅庵琴谱》《梅庵琵琶谱》之刊印，20世纪30年代起，终在古琴界成一梅庵琴派，影响海内外，《梅庵琴谱》也成为70多年来翻印次数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琴谱。

1935年，徐立孙至上海，见到了查阜西、张子谦诸琴人。徐立孙属北派，查阜西为南传，北派方健，南派圆润，徐立孙通过这次交流对南北之别有所发挥：“北方刚强，当于刚强之中求圆润；南方文弱，当于文弱之中求方健。”

1938年春，日寇侵占南通城，徐立孙挈带全家下乡，避难乡间，但仍不忘音律，教子学琴。徐立孙在兴仁乡挹爽园作《月上梧桐》曲，正值好友邵大苏染时疫不幸去世，遂将此曲寄托对好友的怀念。后又数经迁徙，辗转于余西、东社，后于南通县金余镇北乡曹家园小学暂住。为维持一家五口生计，徐立孙一边自课子女读书，一边行医。自己行医收入不足，有时还须妻儿挖野菜食用。但尽管如此，他对贫苦农民仍免费行医，有的还施药。生活虽然极为艰苦，他仍不忘古琴，将音律大意重加增订，参考历代乐书成概要九章，定名为《律吕考释》。

1940年年底，新四军东进通海地区，在梁灵光任南通县长时，徐立孙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任南通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并送长子徐冀（后改名徐鹰）参加新四军部队。

1941年秋，苏北试验乡村师范在南通县濠港桥建立，徐立孙受聘为动植物、音乐教师。学校离徐立孙住处20多里路，不论刮风下雨，风雪严寒，徐立孙都准时到校上课，从不迟到。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徐立孙仍不忘传播古琴艺术，常冒着严寒为师生们演奏古琴。徐立孙的一曲《平沙落雁》，如闻鸿雁由远渐近，一一歇翅落地，叫声此起彼伏。奏毕，掌声雷动。

1942年夏，日寇疯狂“清乡”，乡师地处交通线上，被迫停

办。徐立孙应南通县中二分校（办在骑岸乡间）等学校之聘，继续风尘仆仆，不惮辛劳，致力于抗战教育，为解放区培养人才，后被抗日民主政府推选为苏皖边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向解放区疯狂进攻时，徐立孙隐蔽上海，在上海任教，得重与查阜西、吴景略相聚，切磋琴艺，琴艺大进。

解放后，徐立孙到南通师范、南通医学院任教，但他仍不忘与好友邵大苏创办的梅庵琴学的传播。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为之录音存档。徐立孙所编辑整理的《梅庵琴谱》《瀛州古调》（即《梅庵琵琶谱》）以及撰写的《月上梧桐》《公社之春》等谱曲，均刊印问世，在古琴、琵琶爱好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4年，当时古琴界的一件大事是“《幽兰》打谱”。《幽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首琴曲文字谱，已绝响千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号召各地琴家将此谱译出，互相交流研讨。徐立孙积极投入这次译谱活动。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将文字谱译成了通行的减字谱、简谱，并用钢丝录音录下了自己弹的《幽兰》，寄给了中国音协，中国音协将这些材料编入了《幽兰研究实录》第二辑。在该辑的“序”中赞扬徐立孙说：“立孙方正精益求精，后时仍有再次刮目相看之日也。”

1953年，徐立孙在北京参加全国音乐周，与管平湖、查阜西、吴景略被誉为全国四大古琴家。1956年，徐立孙应邀参加了全国音乐周。他以一曲《捣衣》赢得普遍好评，被赞之“为琴坛增色不少”。

1958年，徐立孙又应中国音协之请，给古曲《广陵散》打谱。在打谱中，他探索研、译绝响之古谱的方法，参考抗战前查阜西的“打谱犹如陈设家具”之说，遂撰《试弹〈广陵散〉的初步体验》，并于此义多有发挥，从而使以徐立孙为首的梅庵琴派名闻海内外。徐立孙的弟子吴宗汉于鼎革之



际南下香港传播梅庵琴学；60年代进军我国台湾地区；70年代移民美国，促成英文版《梅庵琴谱》之诞生。

徐立孙先后担任南通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南通市负责人、南通市文联副主席。

1966年“文革”开始后，徐立孙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69年12月去世，终年73岁。

虽然斯人已逝，但梅庵琴人薪火传递，不绝如缕。除徐立孙之孙徐毅担任社长的南通梅庵琴社外，还成立有镇江梦溪琴社、安徽合肥梅庵琴社、台湾地区台南梅庵琴社。

2002年2月，梅庵琴派艺术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具有深厚江海文化底蕴的南通又增添了一份非凡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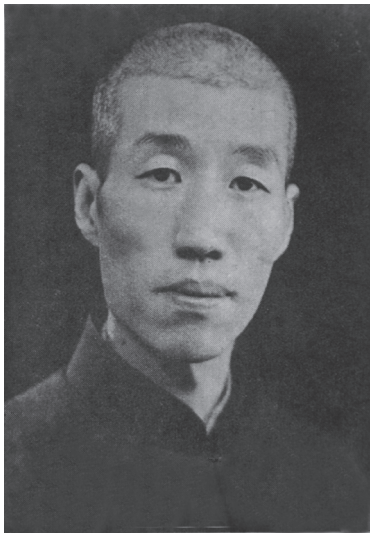
2009年5月30日上午，梅庵琴社举行迁入园博园典礼、纪念徐立孙先生逝世40周年暨北美梅庵琴社揭牌古琴雅集活动。北美也有了梅庵琴社，真是“新枝萌蘖方盛”，“琴韵正春时”！

梅庵琴社创办人之一邵大苏

邵大苏，名森，字大樗，后改字大苏。居三衙墩巷6号，此处为邵大苏与古琴家徐立孙创办的梅庵琴社旧址，其内梅庵琴房现仍存。

邵大苏幼年丧父，母亲身兼父职，辛苦抚养，精心培育，使邵大苏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个性，其姑父孙支厦对他十分喜爱。

邵大苏少年时就对古文、诗词有所偏好，15岁时便有志于古琴艺术。但苦于当时南通没有善操琴的古琴教师，仅能与同窗好友徐立孙共同摸索切蹉。虽下了不少苦功，但因少了名师的指点，终不能探得古琴之奥妙。后邵大苏与徐立孙先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深造。其时，正逢校长江易园聘请诸城古琴大师王宾鲁（字燕卿）先生到校传授古琴，邵大苏极力劝徐立孙一起学琴，两人潜心钻研，数年内尽得王燕卿先生心传，成为其衣钵弟子。



邵大苏

邵大苏在南京高等师



范文史系就读时，攻读诗词歌赋，成绩常列前茅，深受柳诒徵、王伯沆两位国学大师的器重。柳先生去南通曾与这位得意门生会面，并赠对联“会当洗眼看腾跃，未妨便腹贮诗书”以资鼓励。王先生则赠其先父明益王制古琴一床，以奖励邵大苏学习古琴有成。

1921年，古琴大师王燕卿重病缠身，移居南京山东会馆。此时徐立孙已毕业，返回了南通。邵大苏便承担起了照顾生病先生的重担。每日放学后，他不顾路途遥远，不管刮风下雨，都赶去送医送药，端茶送水，照料先生。王燕卿先生逝世后，邵大苏与先生的同乡遵先生遗命将其葬于南京清凉山麓。

邵大苏毕业后，经两位先生推介，先后在南通、扬州、安庆、徐州等中学任教。邵大苏国文底子扎实，学识广博，讲课结合实际，深受学生的爱戴与欢迎。

邵大苏利用寒暑假返回南通，和徐立孙一起，将王燕卿先生的遗著《龙吟观（馆）残谱》重为编校，至1923年夏编成二卷，易名为《梅庵琴谱》。1929年夏，徐立孙与邵大苏创立“梅庵琴社”，倡导梅庵琴学。1931年秋，历经八年的努力，《梅庵琴谱》终于问世，追随徐立孙与邵大苏学琴的弟子越来越多，为“梅庵琴派”日后名扬世界奠定了基础。

邵大苏家为两进六间带前后天井的青砖黛瓦平房，环境幽静，古意盎然。梅庵琴社创立之初，邵大苏就将自己书房东边的一个小亭子间辟为琴室，中间是一张可供两人相向而坐、双人对弹的琴桌，桌子的两边各置一张琴凳。后方置一小炕椅，两旁各置两椅，窗明几净，极为幽静。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梅庵琴房的雅室，是一个专供诸弟子学习的好地方，也是南通雅好古琴文士聚会的好场所。当时，徐立孙就住在邵大苏家的后宅，两家仅一墙之隔，故经常来此琴室操缦，交流琴艺。因徐立孙为专业音乐教师，对古琴的练习时

间比邵大苏多，故左手技法娴熟、流畅，邵大苏在羡慕之余，勤学左手技法，精进琴艺。每到除夕，邵大苏必将请出先生王燕卿的照片供奉祭祀，除夕夜里，邵大苏便在先生像前操缦，他以琴抒情，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

1935年，邵大苏赴南京交通部任职，常与南京的琴友切磋琴技；与诗友过从亦甚密。

邵大苏平生藏有古琴三床，均为仲尼式。一张为元代朱致远所制，名为“灵籁”，体形适中，黑色有牛毛断纹，音清越；一张为明琴，体形较小，名为“清音”，黑色断纹甚细，间有梅花，音清润；另一张则为王伯沆先生所赠，体形较大，池内漆书漫漶，经考系明益王斫旧材制，经王燕卿先生监修，黑中透有朱红色，有龟板纹，音宏亮，邵大苏曾拟题名“潮音”。

邵大苏爱古琴，在他的用物中，处处都能看到古琴的身影：“扇套”是刺绣精细的古琴状套子；镇纸为一对小型的铜制的古琴。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抗战期间，他仍与古琴不离不弃。

1937年，抗战爆发，因南京政府要西迁重庆，邵大苏乃辞职返回故里。回乡没几天，日寇飞机就轰炸了基督医院等处，邵大苏让家人随同徐立孙一家到兴仁王氏挹爽园徐立孙岳父家避难。等安排家人走后，他将两床古琴藏匿好，自己则怀抱着小巧的明琴逃难。沿途凡看到邵大苏抱琴乘车的人都大为惊讶：兵荒马乱性命都难保，竟还有人悠闲携琴远游？

在王氏挹爽园住了两星期后，一家人又东迁到西亭镇西禅寺邵大苏的外婆家李氏庄园。后又到西亭镇上赁房暂住。邵大苏在书写租约时，以骈体文兼叙国仇家恨、乱世情怀，房主深为激赏，遍告当地士绅，一时传为佳话。

在避难期间，邵大苏除与当地文人墨客时有来往外，



还督促孩子们起早带晚地操缦练琴，并告诫他们：“弹欲断弦，按令入木。”即要求左右手弹琴运用最大之力量，但用力需得当适中，发音才能清越洪亮，避免浑浊……邵大苏对孩子严格要求，使他们琴艺得到快速提高。

邵大苏生性耿直，狷介，对择弟子极为严格，在诸弟子中对陈心园最为器重。因为陈心园不但习琴能得琴操神韵，而且对诗文也有钻研。邵大苏一心培养他成为梅庵琴派的传人。

1938年夏，镇场的亲友邀请邵大苏参加农历六月十九日举办的观音菩萨诞辰法会，邵大苏于十八日前往，准备住几日再返回。不料，六月二十一日，该镇突然爆发霍乱，一日之间百余人丧生，邵大苏亦不幸历此劫数而去世，享年仅41岁。徐立孙痛失好友，特将新创作的《月上梧桐》一曲作为对好友的纪念。

邵大苏的六个子女，从幼时开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古琴乐曲，或自幼就练琴，或以后学习操缦，在琴学上都有所造诣。其长子邵元复得邵大苏琴操神韵，曾任中国台湾地区梅庵琴社社长，并为梅庵琴派的传承，编印了《增编梅庵琴谱》上下两册。上册除原谱外，在简谱上加注指法；下册编入了对梅庵琴谱的考证与研究，增录了有关论著、书信及艺文鸿爪等，还专撰《梅庵琴派的起源及发展》《认识中国古琴——七弦琴》等文。邵元复传授学生广及港澳及海外，为梅庵琴派的流传竭尽全力。其次子伟也习古琴，曾参加今虞琴社，时受古琴家龚一的辅导。1993年，龚一先生出访中国宝岛台湾，在高雄市文化中心举行“两岸名家深情对谈”雅集，邵元复、龚一及古琴家容天圻为主讲，不仅传播了古琴琴艺，还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

中科院院士黄耀曾

黄耀曾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是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氟油的研制者、有机氟化学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开拓者，一位在学术上永不知足、自强不息的科学家。

黄耀曾，1912年11月11日生于南通三衙墩巷23号一个书香门第。这是一个东至三衙墩东巷，北至天宁寺照壁，西为寺街，朝南的大门开在三衙墩南巷的大宅子。



黄耀曾

该宅屋宇高大，房舍功能分工明细，一条火巷把全宅分隔成两庭院：西院为前厅、穿堂、正屋、书房，因代代高的传统所致，其正屋平房之高能赶上普通的二层楼；东院有水井、生活用房及小花园等。如今，这座宅子基本上保持着南通民居原貌，火巷、书房等均存，有些门窗、隔扇，都是老的。黄耀曾的曾祖父黄文田是前清举人，祖父、父亲均为秀才。黄耀曾自小聪明过人，4岁即入学，11岁小学毕业进入南通中学，17岁从南通中学毕业，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化学系，



师从我国化学界前辈、著名有机化学家庄长恭先生，成为庄先生的高徒。22岁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到庄长恭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做有机微量分析，自创实验新路，成为我国有机微量分析方法的创始人。

新中国成立后，黄耀曾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他结合生产实践搞科研，成果联翩而出。

20世纪50年代初，黄耀曾与他人合作，研制出有机汞杀菌剂——西力生，为消灭长江流域危害面积较大的棉花红腐病、立枯病和小麦黑穗病，提高农业产量，作出了贡献。黄耀曾还是解放初期参加金霉素和四环素药物研制的主要人员之一，他领导的课题组和药厂的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金霉素试制成功，冲破了美国的经济封锁，打破了少数国家的垄断，不仅治愈了许多病人，而且在东南亚市场赢得了极好的声誉。他还利用有机化学，配合公安部门破案。他利用发射光谱，剖析半张密写纸，使密写字迹清楚显现出来，从而破获了一个间谍集团。

60年代初，黄耀曾接到了二机部下达的一项我国国防军事科技的重大研究任务：协作研制符合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要求的塑料粘接炸弹。这种炸弹要求非常高，要将炸药与塑料粘接制成型粉，粘接成型后，既可增加爆压，又可切削成各种形状，而且安全可靠，能长期存放。接到这一艰巨的任务后，黄耀曾大胆设想，只有最大限度地不夺取炸药中的有效氧，不使炸药损失爆速，才能得到成功。他首先筛选各种塑料粘接配方，经过数次实验，他制得一种不发生裂痕、耐老化、可长久贮存的特殊配方，在制造原子弹、氢弹中得到实际应用，这是黄耀曾对我国国防军事科技的又一贡献。

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撤走援建我国尖端科技工厂的专家，卷走全部图纸，留下半拉子工厂，给我国的科学

技术、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黄耀曾从1961年起,着手对原子能工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氟油中的元素氟进行研制。元素氟是一种最活泼的元素,危险性极大,有剧毒,易爆炸。氟化氢滴在人的身体上,立刻就会钻进骨头里去,搞不好还会致人死命;稍有不慎,微小的震动都可能引起大爆炸……内行人都说这种试验是性命交关的事。黄耀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和同事们把方案考虑得极其周到,尽可能避免发生意外。元素氟易爆炸,他们就把试验场所搬出实验大楼,在试验楼顶上搭起临时窝棚;有剧毒就带上防毒面具,身旁放着急救包,以防万一。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数据,他们便一切从零开始。在没有摸索出规律以前,他们先从少量的几个安瓿瓶做起,循序渐进,从不冒进。他们日以继夜地守在试管边,时刻观察出现的各种情况。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各种各样的危险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然而他们的试验成果也正在困难与危险中逐步扩大,品种在不断增加。最终,试验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就用到了黄耀曾他们制造的氟油。1964年,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成功,苏联企图控制、扼杀我国原子能工业的企图,亦被粉碎。

黄耀曾在投身新型炸药和氟化学研究的时候,阅读了不少外国先进的文献资料,他敏锐地从这些资料中预计到金属有机化学将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立即组织了少数人力开展有机铬化学和有机砷化学的研究。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判为“自留地”的工作,却成为黄耀曾80年代后开拓金属有机化学的新起点。从1978年开始,黄耀曾全力以赴,开拓了有机砷、有机锑、有机碲和有机铬化学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工作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当年,黄耀曾从铁道部接受研制系列电刷镀溶液(当时称为快速电镀或涂镀)的任务时,正值科学院重视基础研究的高峰期,没有



人愿意接受这类应用性强、时间紧迫的任务。但是，科学研究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是黄耀曾一贯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电刷镀技术对机械零部件修复很有效，特别是对现场修复和野外抢修意义很大，符合我国国情，民用、军用都需要，应当好好推广，到时候还可以出口创汇，这是件义不容辞的好事。他立即从自己管辖的课题组里抽调力量来开展这项研究，还从百忙中抽时间，亲自到有关单位联系和共商加速推广的办法。在他的努力下，这项研究工作不但取得了成功，而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据国家经委统计，黄耀曾所推广的电刷镀技术为国家取得的经济效益达20亿元。

经过在漫长的科研历程中的不懈努力，黄耀曾终于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有机化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中科院院士。先后获得1994年第三世界科学院化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两个世界级奖项和六个国家级的奖项。

科学史专家袁运开

袁运开，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新型师范高校——华东师范大学，也是全国高校第一位民选的副校长，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他终身致力于自然哲学、教育学研究，是中外著名的科学史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袁运开，1929年生于石桥头巷27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中兄弟姐妹8人，仅靠在商业中学当图书管理员的父亲微薄的工资养



袁运开

家，经济比较拮据，但是家中的文化氛围却十分浓厚。因父亲喜欢书画，在他的熏陶下，子女都爱绘画。袁运开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学国画、练书法，为当一名画家而努力。后因为他从初一到高三，每学期的成绩都是全班第一，老师劝他改攻理工。随着年龄的增长，袁运开更多地接触到自然科学后，也认为自己更善于理性的思考与探求，于是，1947年夏天，袁运开进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

在大学期间，袁运开因为成绩好，一直享受着奖学金。



奖学金不仅够吃饭支出，还可余少量的钱去买书。袁运开就这样度过了生活清苦却学习愉快的大学生活。

1951年夏天，正当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国家急需大量人才的时候，袁运开从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毕业了。他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青年教师袁运开“又红又专”，深受学校师生的好评，1955年，袁运开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被学校党委派去学哲学，学完哲学又去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并委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占领自然科学阵地”的重任。袁运开从原来的物理学研究，转向了科学史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进入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

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袁运开在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科学普及与物理教育、教育科学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袁运开编写了大量的论著，其中，关于科学史、科学观、科普作品、科学家传记等方面的工具书及主要著作就有20余种，关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论文30多篇。同时还承担国家关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重点研究课题多项。

袁运开编写的书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很高。他把自己浓厚的哲学基础融进自然科学之中，因而，他的自然科学论著总是散发着浓郁的哲学气息。

《物理学史讲义——中国古代部分》是袁运开担纲主编的第一本书，这是当时中国第一部完备的中国物理学史著作。专家认为，这一编著的出版，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物理发展史教学与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总结，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此书出版后，获上海哲学科学著作奖。此后，袁运开主编的书籍连连获得大奖。《中国科学思想史》更是一部通史性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著作，此书系统地梳理了

从古至今中国科学思想发展的脉络，雄辩地证明了泱泱中国不仅有技术更有科学，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读书报》用整版篇幅推介这一鸿篇巨制。

袁运开一辈子都在跟教育打交道，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他认为人文素养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提高人文素养，可以坚强自己的意志，对崇高的目标有不懈的追求，经得起曲折的考验，没有这一条，成不了大事业。而人文素养则要从小就开始培养，因此，他非常重视中小学生的教育。1989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进行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袁运开担任了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经过一年的探究、整合，新版课程新鲜出炉，广获好评。1997年，上海又开始了第二轮中小学课程改革，袁运开结合国外的经验，对课程二次改革提出了宝贵建议。

袁运开先后担任普通物理、电动力学、原子核理论与自然辩证法、科学史本科及硕士专业的教学与研究生培养工作，对华东师大物理学史、科技哲学两个硕士专业及物理系的创建与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对华东师大的改革与发展、高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和中学的课程教材改革进行了理论探索并在实践中有所贡献。

特别是近20多年来，袁运生对于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以及中小学教育做过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主编的《学科教育学丛书》，在我国具有开创性。他还主编了《大学后系列书系——教师必读丛书》，参与了4本巨著的撰稿，发表教育论文30多篇，主持了好几项国家与上海市重点研究课题，其中《全国义务教育学生质量抽样调查》获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改革设想》获1998年度全国师范



院校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袁运开通过对中美一流大学进行的比较，在高师教育的体制、办学方向、师资培养、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学科教育及中小学教育的质量目标和课程、教材改革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出版了有关教育的书籍10多部，其中两部获中国优秀图书奖，还发表了教育科学方面的论文40多篇。他在科学普及与物理教育方面也都有建树。

袁运开因在教育管理工作上成绩卓著，1986年曾获上海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奖励证书，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诗人和剧人江村

胡家庵巷2号环境幽雅、文气盎然，受历代文人青睐，后又成为江村的故居。

江村（1917—1944），原名蕴瑞，是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得到周恩来、郭沫若赞赏的闻名于大后方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和诗人。

江村从小喜爱戏剧，就读城北小学时即开始登台演戏，进入南通中学后参加新民剧社活动，开始显露出戏剧方面的才华。1936年秋，江村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国立南京戏剧学校。他选择了南京戏剧学校，实现了学戏剧的愿望。在剧校，江村除了认真学好规定的学科之外，还如饥似渴地自学国内外名家的剧作、诗篇和其他文艺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江村随校撤退到长沙，沿途与老师曹禺和同学石羽等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演出，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成长。

1938年，剧校决定迁往重庆。全校师生乘坐着几只大木船，浩浩荡荡出洞庭、入长江，溯流而上，一路锣鼓歌声不断，口号与波涛交互震响，就像一支水上抗日宣传队。他们到达重庆后，继续上街演戏，宣传抗日救亡，深受山城人民欢迎。

1939年，江村剧校毕业后，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这个剧协人才济济，艺术高超，在上海久负盛名。江村在此



演技迅速提高，获益匪浅。11月间，江村和坚白又回到重庆，参加了赵丹排演的田汉的剧本《阿Q正传》的演出。随即分配在中央电影摄影场，参加了由赵丹、白杨主演的《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不久，赵丹、朱今明等一批人去了新疆，并约好江村、坚白等第二批去。可是因赵丹他们被新疆土皇帝盛世才投入了监狱，江村等第二批人未能成行。此后，江村、坚白应周峰之邀去“中国电影制片厂”演戏，并加入“中国万岁剧团”，参加我党领导下的进步戏剧活动。当时“陪都”重庆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敌机不断狂轰滥炸，死伤者不计其数；另一方面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共高潮，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主席的周恩来，为了避免文艺界进步力量受损，先后安排了一部分人员去香港，一部分人员去延安和昆明等地。江村、坚白非常想去延安，但由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他们都留下了。江村在“很多人为了生活都改了行”的情况下，不顾身患疟疾，不怕敌机轰炸，为抗战剧而坚持工作。



江村（右）与凤子（左）在电影《白云故乡》中的剧照

在短短的三四年中，江村参加了话剧《阿Q正传》《蜕变》《闺怨》《夜上海》《雾重庆》《青春不在》《锁住的箱子》《棠棣之花》《虎符》《大雷雨》《北京人》和电影《中华儿女》《白云故乡》《日本间谍》等演出，艺术水平达到新的高峰。特别是1941年秋，应中央青年剧社邀请，江村和张瑞芳主演曹禺名剧《北京人》，他饰演的曾文清一角大受观众赞赏，被誉为“绝唱”。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看了演出后称赞说：“江村演的曾文清，文弱书卷气都刻画出来了，真令人信服。”新中国成立后，1962年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看北京电视台话剧团演出《北京人》后，不胜感慨地说：“其他角色都好办，再找像江村那样适合演‘文清’的演员，就难了。”确实，江村是有诗人修养的演员，又是有演员条件的诗人，他写诗著文，又演话剧，其精神气质是一般演员难以达到的。

由于能深入、准确地掌握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心态，因而江村塑造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都各具特色和风采。他在《棠棣之花》中饰严仲子，在《虎符》中饰信陵君，皆英俊潇洒，意气风发，肝胆照人。在《大雷雨》中演鲍里斯，深沉真挚，脉脉含情。尤其是在和著名女演员舒绣文主演的《闺怨》中，江村饰诗人白朗宁，更是诗情交融，风采高雅，令人神往。不管是古的、洋的还是当代的，他扮演的角色都有种脱俗的书卷气。正如张瑞芳所说：“江村的诗人气质确实不是单凭演技可以得到的。”

1941年冬，江村在重庆演出《棠棣之花》。一天晚上，江村在后台见到了他所崇敬的郭沫若先生，便热情地请求郭沫若写一个《屈原》的剧本，在“陪都”上演。郭沫若立即就明白了，江村想在投降派们正大肆活动的“陪都”复活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郭沫若赞扬了江村这一灵感与卓见，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1942年年初，郭沫若就开始



了《屈原》的创作，而且很快就写好了。

当时，阳翰笙负责《屈原》的演出，他希望这个意义重大的话剧的各个角色都是最好的。当时，屈原的人选有两个，一个就是江村。他本是诗人，才华横溢，又热情过人，郭沫若的剧本就是应江村之请为他量身定写的，当属最佳人选。但因江村当时患肺病，身体十分虚弱，而构成《屈原》全剧高潮的《雷电颂》长达一千几百字，要在轰然炸响、震撼宇宙的风雷声中，不间断地朗诵完这势若排山倒海的诗篇，他的身体根本吃不消。大家只得忍痛割爱，选择了刚从香港脱险归来的金山，他是“左联”时代的老演员，技艺卓越，舞台经验丰富。

《屈原》在重庆的上演，震撼了山城重庆，震撼了整个大后方，使反动当局惶惶不可终日。话剧通过屈原对楚国黑暗统治的控诉，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声。对于教育和鼓舞群众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屈原》是郭沫若最成功的力作，充溢着郭沫若的才华，同时也闪烁着江村智慧的光芒。

郭沫若曾说：“我写《屈原》这个剧本，本就是出于江村的要求，他是很想把屈原这位大诗人的形象化在舞台上的……屈原是由他的怂恿而写成了，但我的剧本写得太重，于他的性格和体力都不相宜，因而他没有参加演出。”又说：“舞台上没有看见屈原的他，或许是一种遗憾罢。”

江村在重庆生活极端艰苦，但他在繁重演出的同时仍抽出时间努力读书，并写过好多诗、文，发表于报纸杂志上。尤其是诗作，深得郭沫若等的赞赏。周恩来也很喜欢江村的诗，有时还叫江村朗读给他听。有一首题为《嘉陵江水静静地流》的诗，曾由著名音乐家张定和为之谱成男高音独唱歌曲，传唱于重庆和大后方。

1943年是江村在重庆最艰苦的一年，同时也是最能表现其坚贞骨气的一年。因为江村带头抵制排演反动戏剧《蓝蝴蝶》，反动的电影厂厂长便不再给他演戏和安排工作。军委会反动头子还下令不许江村离开重庆，对他实行孤立和软禁。在如此严重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下，江村陷入了生活困境，肺结核病迅速地加剧了。他开始吐血，却不让朋友们知道，怕增加他们的忧虑和负担。江村的身心遭受着残酷的折磨，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不怕穷，不怕病，不怕死，不怕黑暗势力。他始终没有向反动派低头，再也没有参加任何反动戏剧的演出。他在日记上写道：“……我的心活着在战斗，在战线上，即便倒下了，我也面向着敌人！”

1943年11月，江村在原“剧校”教师的帮助下，摆脱了重庆反动派的软禁，秘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另闯戏剧新天地。但遗憾的是，他虽然逃出了浓雾的重庆，却没能逃脱冷酷的坟墓。1944年1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深夜，江村终因劳累过度，身心交瘁，突然吐血不止，昏迷在成都青年会宿舍的床上。同为南通人的顾而已发信电给各地文艺戏剧界人士为江村募捐医药费、营养费，但为数区区，常常接济不上。5月23日清晨，含悲茹苦的江村不幸赍志而殁了！年仅27岁。名记者车辐给江村捐赠了葬身之地。顾而已弄来一口薄棺，将骨瘦如柴的江村入了殓。第二天，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们冒雨为江村送行。顾而已指点着将江村的面朝向东方，让长眠九泉的孤魂，遥望那云天之外的故乡。江村逝世后，郭老为他题写了“剧人江村君之墓”。同年10月，另一青年演员施超病逝，与江村合葬，郭老重写墓碑，文曰：“剧人施超，诗人江村君之墓。”



献身中国电影和戏剧事业的顾而已

顾而已原名尔锜，为南通教育家顾仲敬的长子。进中学后，恰好与同样热爱戏剧的赵凤翱（赵丹）、朱镜明（朱今明）、钱骏（钱千里）等在一个班学习。1928年，顾而已与赵丹、朱今明等人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取名为“小小剧社”。1931年，左翼剧联南通分盟成立，“小小剧社”集体加入了剧联的南通分盟，并与新民剧社联合举行了三次公演。

1933年，在《五奎桥》被禁演后，顾而已到上海投身左翼戏剧活动，加入剧联总盟，同时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党领导下的一名左翼戏剧战士。1935年顾而已参加俄国果戈里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的演出团，他以夸张而又恰如其分的表演将一个昏庸贪婪的市长演得惟妙惟肖，从而一举成名，蜚声舞台。翌年，他在影片《狂欢之夜》中，再度成功地扮演市长的角色，更扩大了影响，就此进入知名演员的行列，并成为新华影业公司的职业电影演员，先后参加该公司四部影片的拍摄。其中，他在《貂蝉》中饰演的董卓一角，在观众中反响很大，从而被誉为“中国的却尔斯·劳顿（好莱坞著名的性格演员）”。

1937年抗战爆发后，顾而已在重庆参加上海抗日救亡宣传队演出三队，演出了一系列反映抗战现实、宣传爱国思想的话剧，如《保卫卢沟桥》《回春曲》《上海屋檐下》《春回大地》等，轰动山城。抗战胜利后顾而已返回上海，先后参加拍摄电影《衣锦荣归》和《幸福狂想曲》。

1947年冬，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内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迫害，恰好香港永华影片公司邀请著名演员南下拍戏。于是，顾而已偕同刘琼、顾也鲁、钱千里等赴港加入了永华公司，参加拍摄了影片《国魂》。在拍片的过程中，他发现永华的老板与国民党反动派关系密切，影片宣扬的也是反动思想，便萌发了建立一个自己的电影阵地的想法。

1948年，在顾也鲁、高占非以及地下党员卢绪章等人的支持下，顾而已出面筹组了大光明影业公司。公司成立以后，顾而已依靠党的领导，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不计较经济利益，不考虑自身安危，先后主持拍摄了三部进步故事片：《野火春风》《水上人家》和反映解放区新天地的《小二黑结婚》。这三部影片的问世，不但改变了香港电影界的落后面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香港进步电影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深圳解放前夕，顾而已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带着手提摄影机，冒着枪林弹雨，只身越过国民党军队设置的铁丝网，抢拍下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乘胜追击把红旗插上阵地的珍贵历史镜头。顾而已受内地解放形势的鼓舞，同时也感到香港的环境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有意返回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1951年，他和陶金赴北京，向电影界领导夏衍、袁牧之汇报了在港拍片的情况，决定将大光明影业公司迁回上海。

1951年3月，顾而已带着他创办的大光明影业公司回到上海，投入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他马不停蹄地参加拍摄了歌颂人民翻身做主人的爱国主义影片《和平鸽》和《方珍珠》，分别饰演了主角；导演了夏衍编剧的影片《国恨家仇》；其间应北京青艺特邀演出《屈原》中楚怀王一角，深为郭沫若赞赏，并作诗赞扬他的表演具有气吞山河之气势。

1952年公私合营，大光明影业公司并入上海电影制片



厂。顾而已担任了专职导演，先后执导了十部电影。其中黄梅戏影片《天仙配》由著名戏曲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主演，上映后反响甚佳，荣获文化部1949至1955年优秀舞台艺术片二等奖。另一部影片《燎原》，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最具影响的优秀故事片之一。接着，他又执导了《罗汉钱》《星星之火》《地下航线》等多部影片，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



顾而已（左）与周璇在影片《和平鸽》中的剧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顾而已与一大批著名艺术家都成了“牛鬼蛇神”，他的“问题”更为严重。他执导的影片《燎原》，被定下了“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不赦罪名。同时，因他熟知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影剧界的行状，更为那个

“当代女皇”所不容。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他遭到了长时期的残酷迫害。但他是一个正直刚烈的汉子，在无休止的逼供和毒打面前，他始终坚持认为《燎原》不是反动影片，自己执导这部影片是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绝不接受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士可杀而不可辱”，1970年6月18日，他在上海奉贤电影“五七”干校以自己的生命向“四人帮”极“左”势力作了最后的抗争。顾而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人民的电影和戏剧事业。



诗书画大师范曾

寺街123号为当代诗书画大师范曾祖宅。

范曾于1938年出生于南通独步诗林、薪火传承十二代的诗文世家。

范曾幼承庭训，两岁时，就能背诵五言绝句，四岁时便入学，会朗诵《岳阳楼记》《木兰辞》等，且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或许是天性、遗传，或许是从小背熟了那么多唐诗、宋词，他的



范曾

心灵早早地便有了诗的意境，有了作诗的欲望。八岁便能做出“绿羽顶红冠，花开处处啼”这一令乡贤张梅庵先生赞不绝口的《咏鸡冠花》的诗来。十一岁的时候，父亲范子愚就执手教他背诵古典诗文，对他讲解吟诗作对的技巧。从童年到少年，范曾以诵古诗、作己诗为日课。他在中学时便养成一种伴其一生的习惯：把历史知识或古诗词，写成小纸条贴在墙上，随时可以看到，随时能够温习。大学时代，住集体宿舍的范曾，沿袭这一习惯，将这些纸条搬到了唯一的私属空间——蚊帐顶上。毕业后，范曾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

的西阙门旁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斗室。壁上的空隙间，还是贴着一些常换常新的小纸条，那是范曾常诵常记的一些格言、诗词，即使在厕所里，他也挂满需要背诵的东西。他每天五点钟就起床，随即在午门和阙门之间跑步，然后背诵古诗文、吟诗两小时。星期六下午下班后，他晚上买五个馒头，第二天放在火炉上一烤，就点咸菜，星期天一天就可以“足不出户”，饱读诗书，以诗文自娱。从那时起，范曾就已经拥有让人不可思议的阅读量和文化溶解力。范曾在读书与习画的生活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

范曾喜欢作诗，往往在清晨四点左右醒来，忽然有了作诗的念头，脑子里跳出来一句就开灯记一句，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常常把妻子都闹醒了。当一家人都起来时，他的诗也做好了。他的许多诗都是像齐白石所说“诗乃睡之余”而得。他本无志为诗人，作诗既是述怀遣兴，也是必需的功课。因为他知道中国文人画家历来讲究诗、书、画三位一体，一幅优秀的中国画必须是“以诗为魂，以书为骨”。一个成功的画家，一定要兼爱书法和诗歌。在难忘的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出自范曾之手的对联、祭文，豪逸峻拔，放言真率，被无数双手传抄，又传送到天南地北。但多年以来，他的文名一直为画名所掩。

范家历来重视书法，故范曾童年即便是在吟诗作对之后，每天也必须研读名帖，悬腕对临十张毛笔大字。在大学时，他曾以三个月的光阴，临摹过一百遍《兰亭序》。年复一年的萤雪之功，使得范曾最后不仅写得一手“范体”好字，且以书法之笔作画，更是得画史精髓，开一代新风。范曾吮古人之乳，掘自然之源，从而形成了大家所熟悉的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范体”字。到61岁时，他的书法风貌大变，登上了新的高峰，给人力破千钧、大气凝重之感。2001年，他为山东梁山摩崖石刻所书写的《水泊梁山记》就是他书风变法



后的代表作。

1957, 范曾19岁时, 转学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半年后, 转到中国画系。

对范曾作画一生影响最大的首推蒋兆和先生。蒋兆和先生要求范曾画画要在精确的判断之后放笔直取, 如灯取影, 纤悉不遗。遵循师训, 范曾进行了十分刻苦的探索。“人难画手”, 范曾就从最难处入手, 画了数以千计的详尽的高难度手的白描写生, 将肌肉骨骼熟记于心, 才做到今天的真假思索, 意到笔随。

1962年毕业时, 范曾画了一幅历史画《文姬归汉》, 送去给郭沫若先生看, 郭沫若先生很激动, 夜不成寐, 凌晨三点起床, 匍匐于地, 将一首长诗题赠在画上。这首诗, 成了郭老的不朽名篇, 录入他的《东风集》中。后来, 郭沫若在寓所接见了范曾, 并说今后有杰作, 他还愿意给范曾题诗。

范曾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 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他抱着“第问耕耘不论收获”的精神, 先攻白描, 再攻书法, 临摹了一大批传世杰作。常年的伏案读书作画, 使他的胸骨和脊椎骨都发生了变形, 右手痛得都抬不起来。在跟随沈从文先生编绘古代服饰资料的几年中, 范曾以惊人的毅力, 磨砺了他的艺术宝剑, 也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底。

1977年秋, 范曾因为生结肠息肉, 恶性贫血, 血色素不及常人的二分之一, 住在北京医院。在这垂危的时刻, 他决定为鲁迅小说画插图。他置一小几于病榻, 研墨吮毫, 以意志驱除烦恼, 一张一张地画着, 乐以忘忧。进行手术的前夕, 范曾又接到一篇催稿信。可他开刀前需要用一天的时间输800毫升的血, 根本不可能写稿子。他忍着疼痛, 让护士将输血管插在小腿的脚踝处输血, 以腾出双手, 半躺着写出了八千多字的一篇论文。手术后几天, 他就捂住刀口挣扎着起

来继续作画。就这样，在北京医院的两个多月，他坚持将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的全部插图完成。

1980年冬，范曾为了筹备赴日本的个人画展，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偏在这紧张的时候，他父亲生病，催他回家看望。他背着画具赶回老家。在南方滴水成冰的严寒日子里，他每天白天侍奉父亲于病榻旁，凌晨四时起床吮墨挥毫。范曾画的是泼墨大写意的人物，需要激情奔放，用笔纵横，衣服穿多了会挥写不便，影响画面气韵。于是他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冬凌晨，只穿件毛衣，破冰研墨，有时深夜作画，全不顾疲劳与寒冷，不知东方之既白。

1984年，范曾被调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这时他萌发了要在南开大学设置东方艺术系的愿望，以弥补中国名牌综合性大学没有艺术系的缺憾，与国际接轨。为了筹集资金，他去日本办画展。整整一个夏天，他总是不待鸡鸣便跃然而起，直至深夜才搁笔就寝。然后，马不停蹄地又去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办画展。历经三年的艰苦努力，凝结着范曾心血的东方艺术大楼落成了。

1990年年底，范曾负笈赴法国巴黎。在异国他乡，范曾磨尽了十块名为“铁斋”的好墨，画完了二十刀宣纸，用废了数十支毛笔。这期间，范曾的生命化为了线条、色彩，化为了浮动于画面的气韵，化为了流布到画外的神采。

范曾的画，歌颂了那些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孤忠之士，赞扬了那些千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维系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懿范，使陈旧的历史重新现出了亮色，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喜爱。范曾的画，包含着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了海外侨胞感情上的共鸣。范曾的画，弘扬了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从画中感受到龙的传人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中华壁画巨擘袁运甫

袁运甫于1933年端午节翌日生于石桥头巷27号。他的血脉中，既有父系祖先明左布政司袁随“倚马立得”的聪颖，又有母系祖先北宋哲学家二程（程颢、程颐）的理智。袁运甫的家庭是个崇尚诗文的旧式文人家庭，他从小就接触艺术并热爱艺术。每年的春节，父亲带着袁运甫兄弟姐妹张灯结彩，更新字画，贴招财对联，挂祖宗轴子，与高中进士的祖先，穿越数百年的时空，进行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话，使家族文化薪火传承。



袁运甫

袁运甫谨遵自重、自省、自觉的家教，一生以“辛勤耕耘无终期，不敢懈怠误艺涯”自励。小学毕业，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取了省立名牌中学——南通中学。南通中学师资力量雄厚，有着全省一流的美术教师。他的这一美术爱好，在美术老师的培植下，得以发扬。袁运甫十四岁时，为外祖父作油画遗像，画得神形俱象。当画像挂出后，成百人向这幅油画遗像跪拜、哭泣，袁运甫第一次被艺术的神圣感与召唤力所震撼。

1949年，袁运甫考取了中西绘画实力强大的现代艺术摇篮——杭州国立艺专。1953年年年初，袁运甫转学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受业于张光宇、张仃等老师门下。南北两所学校尽管艺术教学和艺术思想的侧重各有不同，然而都强调写生训练，重视艺术风格研究，以及注重著名教授个人艺术特长等，故袁运甫能够多方面汲取南北各派名家之长，获益不浅。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袁运甫以师承南北两所艺术风格各异的专业教育、师承缤纷的艺传言教的独特优势，被留校任教。历史的机遇，使袁运甫得以与国内闻名的诸师长共事相聚，教学艺事研讨尤深，历经患难与欢乐，更得相交忘年。袁运甫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教师时，每带学生实习，他必画作盈夹。每逢寒暑假，他又静下心来，以中国画为探索。郑板桥的“删繁就简，领导标新”成了他案前的座右铭。袁运甫经杭州艺专、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多方面的培养和锻炼，融会中西艺术，勇于探索创新，涉足于水粉画、油画、彩墨画、装饰艺术、壁画艺术、公共艺术等广阔的领域。每一次新的尝试，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一次“新的情感和意志的较量”，可喜的是他都能取得成功。

“文革”后，袁运甫开始了以巨大的热情致力于装饰艺术教育、公共艺术及彩墨画创作的中兴十年。

从1977年与黄永玉先生合作设计毛主席纪念堂大型壁画《祖国大地》开始，袁运甫握管如恒，壁画新作叠出。



1979年10月1日落成的首都机场壁画群，袁运甫的《巴山蜀水》是最引人注目的壁画之一。这幅以长江三峡为题材的壁画，描绘了从重庆经万县、白帝城至夔门的壮阔图景：群山环抱、急流飞湍，给人一种深厚沉着、气概万千的意象。这幅壁画在艺术上追求中西技法的结合，重视造型及色彩微妙变化中的统一，在传统青绿山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既保持了中国传统壁画处理中的整体平面性效果，同时，中间又贯穿了适度的空间效果的追求，取得与建筑的整体协调。人们看到作品的辉煌成功，却不知他创作这幅画的艰辛。1975年袁运甫在长江上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写生回到北京，正值“四人帮”批黑画。白天他在单位挨批斗，晚上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书房，偷着画那不能忘怀的长江。经过数月的努力，终将长江画成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画好数年，却不敢示人，直到1979年才借助首都机场这一平台，将这一作品展现给世人，并以其恢宏壮美长留人们心间。

从那以后，袁运甫始终专注以装饰艺术、绘画艺术和理论研究为支撑的公共艺术创作实践，实践大美术的道路，博收厚积，有容乃大。袁运甫的新作，源源不断，年年出彩。仅至1995年6月，他就完成大型公共艺术作品32件，总面积竟达3 651平方米！

他曾攀上3 000米高的长白山峰颠，在三江源头找到“源与流”的自然景观主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作了一幅壮观的祖国山河颂歌《山魂水魄》。

他曾驱车喜马拉雅山脉，在乌云蔽天、狂风呼啸中，收集创作素材，为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会议大厦创作出象征着中尼友谊的大型锻铜镀金壁画《祥和之都》。

他曾跨越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新疆的崇山峻岭，穿过草地沙漠，踏遍秦汉明清长城遗址，将祖国大地的神采与人文创造的历史奇迹融为一体，为首都新航站创作了一幅

《万里长城图》。来华的国际友人，一踏进国际进关大厅，就能感受到一番独特的“大青绿金碧山水”的东方神韵。

他为燕京饭店设计的《智慧之光》，正中是东方智慧女神高举明灯，周围由6个不同大小的灯火组成了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光环群，中间的主光环与一些小的光环形成相交相切的变化，并且与壁画由上而下的纵横人类历史的十个阶段联系在一起了，中间部分集中体现了人的智慧与辉煌的艺术成就。英国艺术评论家苏兰认为：“外国参观者应特别感谢袁运甫，因为看一眼他的这幅作品，就可以看到全部中国文化遗产的概貌和规模，它有强大的诱惑力。”

他为自由电子激光国际研讨会绘制的主题画，把古汉镜、烽火台、万里长城和激光技术，构建在一起，落想奇异，美妙无比，受到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的赞扬。

袁运甫在他的艺术实践中，根据主题与环境的需要采用重彩、丙烯、金属、陶瓷、石雕、印染、刺绣、编织、镶嵌、木雕、漆艺，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工艺材质。材料随环境取舍，材料为主题作势，使形质神韵浑然天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袁运甫的艺术创作，由壁画拓展至雕塑、而至更广义的公共艺术——遍及全国的文化广场。

袁运甫先后为辽宁大连市设计了彩虹广场，为广西桂林市设计了华夏文化广场，为江苏通州市设计了市民广场。

近几年，袁运甫连续中标担任国家重点艺术工程项目的主笔——安装在故宫“太庙”的“中华和钟”，以及安装在“中华世纪坛”的《中华千秋颂》石雕壁画和中央金柱《龙凤呈祥 日光光华》等的总体设计。

袁运甫在步向21世纪的前夜，承担了国家大型礼器——“中华和钟”美术总设计的任务。他把编钟的纹饰以龙凤纹作为主要内容，钟架造型与纹饰，则以花卉、植物和自然形



态为构思理念。龙凤与宝相花的设计思路，更是衬托“中华和钟”“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恰当题材。他在整个外架横梁上的关键部位突出地设计了各种含科技内容的图像达12000多个。“中华和钟”编钟和架材设计制作，充分发挥了金、钢、铜、铁、漆、木、皮、玉、布九材和刻漆沉金、雕漆剔红浮雕、木浮雕贴金、精密锻铜浮雕、山西大漆云雕、铜虎挂件的贴金、钢体敷灰髹漆、玉石刻制、铜鸟铸造等九艺的综合效果，体现出了中国式设计与工艺的高超水平。“中华和钟”被评定为国宝级艺术珍品，同时，被授予“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证书。

“中华世纪坛”是一座跨世纪、越千年的标志性、纪念性国家文化设施。这座建筑的核心部位是环形“世纪大厅”，是专门为创作中华五千年历史画卷的壁画《中华千秋颂》而建立的。同时还成立了由史学、社会学、美术学、图案学、工艺美术学、科技等专家组成的逾百人的数个咨询组，为国家重点艺术项目《中华千秋颂》献计出力。

袁运甫考虑到《中华千秋颂》虽是一幅表现国家历史，特别是科技、人文历史内容的壁画，但当它永远安置在“中华世纪坛”这一特定的国家标志性和纪念性的建筑中时，它已具备了完全不同于一般历史壁画的意义了。经过讨论，他将《中华千秋颂》壁画的内容，基本上按历史的顺序分成四个组成部分：“先秦的理性精神”、“秦汉唐的包容气概”、

“宋元明清的公忠气节”、“近现代的救亡与启蒙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中兴”。这四个部分在总体上又是相互贯通、紧密联系的。《中华千秋颂》壁画长117米、宽5米，涉及有名有姓的历代著名杰出人物计63位，各部分还有较小的群众人物199位，整幅壁画有大小人物268人。

袁运甫是总体设计师，他将九座柱体制作成锻铜贴金箔的浮雕，使之金碧辉煌、气势恢宏，并对5.8米直径的中央

金柱进行了重点设计。他以“龙凤呈祥 日月光华”的象征性语言，以中国贡献于世界的“四大发明”和新时代的“科技进步”为依托，把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中央金柱的圆周顶部被处理成一个凸起的小形圆周，并施以最亮的白光，使人在视觉上有向上升腾之感。

“世纪大厅”巨大的天顶，也成了袁运甫做文章的好部位。为了显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人类宇宙史的一部分，也为了纪念新世纪来临的特殊意义，在中央气象局的协助下，他以21世纪元月初始的太空“星相图”为基本，制作成光导纤维的数千颗不同亮度的繁星天顶。

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大厅”，经过袁运甫及艺术家们富有创造精神的探索和超乎寻常的努力，终于在人们感受到21世纪蹒跚足音的时候，不负众望地展露出独特而又灼人的风采。人们徜徉在历史与现实的豪情交相辉映的艺术大厅里，由衷地感谢把历史厚重和辉煌演绎得流畅如歌、激情四溢的公共艺术家——袁运甫及其同事们。



逆境自强的艺术家袁运生

1937年4月4日，袁运生出生于石桥头27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南通市远近闻名的“孩子成才的摇篮”。慈父慈母的劝导，兄弟姐妹间的相互影响，使袁运生自幼便形成了勤奋好学、争强上进的性格。他的学画，自然离不开比他大4岁的三哥袁运甫的影响。袁运生的第一幅美术作品，是为姑姑画的速写，他那把握人物形象特征的天赋和虽然稚嫩但果决流畅的线条，赢得全家人的交口称赞。



袁运生

1949年，袁运生考取了南通中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上海美专毕业的班主任——顾云璈。顾老师很爱才，对喜爱绘画的袁运生、范曾、顾乐夫加以重点培养，使他们的美

术才能得以发展，市文联美术协会也破格吸收了这些当时才13岁的小画家们为会员。

1955年7月，袁运生由南通中学毕业，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袁运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著名油画家李宗津的得意门生，并以其天分、勤奋，成为新生中的尖子。

然而，1957年暑假，著名油画家李宗津被定为中央美院的“大右派”，袁运生是李宗津所器重的得意门生，被理所当然地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一年，袁运生刚20岁，全然不知政治的无情和世事的冷酷。他所关注的仍然是画画，他的生命追求依然是美术创作。但是，随着“左”的政治气候的升温和“反右”斗争的深入，他开始感受到“右派”二字的压力。

1958年，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袁运生拒绝任何强加于他的不合理“劳役”，被认为“抗拒改造”。1960年年初，他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双桥国营农场实施“劳教”性改造。

发配“劳教”的“右派”三十多人，都是教授、艺术家、学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在此行列，袁运生年龄最小。在这里，袁运生“因祸得福”，亲耳聆听这些艺术大师们精深独到的艺术见解，亲眼目睹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人格尊严。这使袁运生学艺做人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1961年年底，摘掉了“右派”帽子后，袁运生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董希文工作室”，专心从事毕业创作《水乡的记忆》。这幅作品一经问世，便博得了中央美术学院师生的普遍好评，袁运生侥幸地取得了毕业资格。但是，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庞薰琹教授亲自去美院点名要这位应届毕业生去该院任教时，却遭到阻挠和拒绝。

1962年，袁运生被分配到了东北吉林，在长春工人文化宫搞群众文化工作。

屡遭厄运的袁运生依旧保持着个性的棱角和一名真诚



的艺术家所特有的直面人生的热情和勇气。被分配到长春不久，他就精心构思创作了壁画《中国革命万岁》，却不但被否决了，而且和另一幅画一起遭到批判。所幸，那时的长春市工部主任贺瑛，为人正直，重视人才的培养，顶住各种压力，为他创造了三次远行写生的机会。

1978年，袁运生受云南美术出版社之邀，去西双版纳体验生活，为该出版社画一套白描画册。袁运生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深入傣族村寨。傣族崇尚水、热爱自然和生命、尊重人性美的民族特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运生惊喜地发现那里的植物世界竟是用线条织就的诗。他着了迷一般地画了一批严谨线条组织的画。他的画都是那种大幅的毛笔的线描，一种独具自己风格的线描。从云南回来后，袁运生出版了一本白描集子，此集后来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图画学教材。

从云南回到北京后，袁运生被邀请为首都机场画壁画。他非常珍惜这一顶破十年冻土，为中国画坛呈献第一叶新绿的机会。他根据在西双版纳收集到的云南史诗，创作了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产生了轰动效应。当报纸、电视、画刊将首都机场壁画展现在广大国民面前时，傣家女天真无邪的情态、凝脂若玉的肌肤、丰胸美臀的胴体，洋溢着生命律动感，充满着富有青春活力的生命纯洁之美，使人震惊、好奇、兴奋、躁动。袁运生的标新立异、傲寒独秀，在乍暖还寒的冻土层播种艺术春苗，吸引了爱美民众的欣赏目光，更赢得了美术界同仁的称赞。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借此东风，将袁运生请回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

正当袁运生踌躇满志，欲借“生命的赞歌”之劲风，在艺术天地扶摇青云的时候，“两个凡是”的惯性思维向“泼水节”的艺术实践“宣战”。面对压城乌云和欲来山雨，逆境

中的袁运生坦然自若。首都机场壁画的总体规划和召集人张仃、首都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都对《泼水节》的构思和创作无异议。针对机场建筑领导提到画里出现的女裸体问题，邓小平简洁地说：“我看可以。”

1982年，就在袁运生为无法从事壁画创作而深深苦恼时，美国的北爱荷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中文化交流协会，会同美国政府共同邀请袁运生赴美讲学。不久，袁运生获准以中国艺术家的身份赴美参观访问。

这次出访，是袁运生的又一次命运转折。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美国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山光水色使袁运生大开眼界，心中的积郁也风消云散；而他的文化修养、艺术才华和人格魅力，也让美国文艺界钦佩、仰慕。

当他完成对北爱荷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时，已经超出了原定出访两个月的期限；而美国的其他大学又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发出邀请，他只好继续进行访问讲学，从塔夫斯大学、史密斯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以至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个人画展上，费正清教授夫妇参加了开幕式，他们说，袁运生的画具有“真正的力量”，在每件作品里都有，而艺术便是为这个力量而存在的。

1983年，袁运生接受塔夫斯大学邀请，创作一幅关于神话传说的壁画。当校方提出要审查壁画草稿时，袁运生以艺术家的自信和自尊拒绝校方要求，回答是：“我没有画稿可供审查，我的创作习惯是从不作画稿。”

袁运生不卑不亢的谈吐表现出的艺术家的自信和风度，使塔夫斯大学的负责人刮目相看，最后同意让他试试。而这幅壁画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每天来参观的美国人络绎不绝，他们在壁画前留连忘返，叹为观止。仅仅两年的时间，



中国画家袁运生在美国艺术界声名鹊起。

1984年，袁运生受聘于哈佛大学艺术办公室，在教授素描课的同时，潜心作画。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办了多次画展。他的画展在美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给人以震魂慑魄的激情，使人感受到心灵的撞击和精神的启迪。

此时，袁运生在美国的艺术实践引起了国内有关方面的注意。1984年年底，中国文化代表团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团长吴祖强专程看望了他，热忱地表示，祖国欢迎他早日返回。闻此，袁运生心潮难平。

袁运生虽身居海外，但并没有忘怀祖国。他1993年归国探亲时，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画展。之后又到陕西考察了周、秦、汉、唐壁画等名胜古迹，为创作积累素材。这时，他亲眼看到经过改革开放十年后，盛世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界呈现出他久已期盼的良好创作环境，被屏风遮挡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也已重见天日。人们在欣赏这幅壁画所表现的生命美的同时，也在关心着壁画的作者——艺术家袁运生。袁运生在祖国艺术春天的召唤下游子思归。

1996年，袁运生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正式邀请他回校主持油画系第四画室的教学重任，他接受聘请，于当年秋季回国任教，开始了一个历经艰难、痴心不改的真诚艺术家的新的艺术历程。

旅美画家顾乐夫

寺街76号，为旅美著名画家顾乐夫宅。

顾乐夫就读的小学是北濠小学，他的绘画生涯也是从那里起步的。那时学校不开绘画课，也没有绘画教辅材料，但出于与生俱来的对绘画的酷爱，顾乐夫将老师、同学、家人都作为他写生、素描的对象，连书本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人物头像，在不经意间就打下了素描的童子功。



顾乐夫

1952年，顾乐夫与袁运生、范曾成为南通中学的同学。顾乐夫家的北边是范曾家，南边是袁运生家，三家呈三足鼎立，相隔不远。同样的生活环境，同样的文化熏陶，同样的艺术追求，使三个小画家走得很近。他们在通中一起写生，一起苦读，一起探讨绘画技巧，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三人既是志同道合的画友，又是无话不谈的伙伴。

1955年，长大成人的三个伙伴面临着人生的重要转折。这年，三人在从南通中学高中毕业前夕，结伴赴北京考中央



美术学院。造化弄人，范曾考进了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袁运生如愿以偿进了中央美院，而专业成绩已过关的顾乐夫，却因家庭成分问题政审没通过被刷了下来。于是，三个朝夕相处的伙伴，从此踏上了各自人生的旅程，聚少离多。

顾乐夫开始并不知道高考落榜的真实原因，总以为是自己的水平问题。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在积极备考的同时，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画出版社以及《萌芽》《中国工人》《天龙画刊》等杂志上陆续刊发，于是，顾乐夫的名声走出江海平原，在华夏大地传扬开来。

1956年是我国政治气候较宽松的一年，对家庭成分的审查不再那么严格，这给年轻的顾乐夫带来了一线希望。更让他庆幸的是，在考试中，他遇到了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主考老师爱才，竭力主张录取顾乐夫。于是，顾乐夫在这一年终于圆了大学梦，考取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后为浙江美院）版画系。

顾乐夫学版画时，正是中国版画发展最快的时期。由于顾乐夫的勤奋，他的版画创作进步很快。入学后不久，他便成为学校的高材生，在全国画界也小有名气。学习成绩冒尖是好事，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出于众，众必毁之”，尤其在那个政治斗争频频的年代，像他那样性格直率、心直口快的人，定会因口无遮拦而祸从口出。

顾乐夫就因平日里说的三句极为平常的话，在不经意间把自己送进了“右派分子”的队伍。

第一句话是在进电影院时，他见到挂的都是苏联的电影明星照片，便随口说了一句：中国的电影院为什么不挂中国的电影明星？第二句话是在观看反映日俄战争的电影《瓦良格巡洋舰》和推崇此电影为“爱国主义”的影评后，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反映日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领土的不义战争，何来爱国？第三句话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声

讨纳吉，他却嘟哝了一句：匈牙利是个主权国家，苏联有何权利去镇压人家？这三句客观而正确的话，被定为反苏言论，他从此被打进“右派”行列，供人们去揭发批斗。这一年，他还是个未有公民权的17岁半的青少年。

1958年，在被《中国美术》杂志点名批判之后，顾乐夫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课堂，到浙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呆就是6年半。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才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回到家乡，落户曹公祠。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顾乐夫被警告“不许乱说乱动”，工作和生活也无着落。几年后，他被分到城中誊印社画了两年的毛主席像。1972年，因中美建交，绣衣外贸需要设计人才，顾乐夫进了东风绣衣厂，做设计工作。顾乐夫虽历经坎坷，对艺术的追求却矢志不移。这期间，他除抓紧时间将设计搞得风生水起，还把平生所学化作涓涓细流，去滋润那些渴望在绘画天地里一展身手的青年后生，后来在绘画上卓有建树的范扬、邬烈炎、吴维佳、季大纯等，都是此时投到顾乐夫门下的。为此，“文革”后期，《中国美术》杂志又一次点了顾乐夫的名，批判他“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顾乐夫的弟子大多数考上了美院，成为当代优秀的美术家、教育家、理论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顾乐夫获得了艺术的新生。1979年，他回到所喜爱的教师队伍，在轻工技校教美术和书法。20世纪80年代初，命运的大门终于彻底为他敞开：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急欲引进美术人才，就从报纸上寻找当年被点名的美术尖子，一找就找到在南通半隐居的顾乐夫。于是，1982年年底，顾乐夫跨过南京长江大桥，踏进南京师范学院的大门，直到7年后客居美国。

1989年，顾乐夫飞抵大洋彼岸，来到美国纽约联合学院，做了两年客座教授。其后，受聘于美国纽约州伦瑟勒艺



术中心和奥尔巴尼历史与艺术学院任教授，专职教授绘画。1998年，顾乐夫从教学一线退下来，重新拿起画笔，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家中悉心搞创作。

美国虽是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地方，但西方文化仍然占主流，东方艺术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接受。顾乐夫是个绘画全才，他注意兼收并蓄、融贯中西，学的虽是版画，却精通油画，擅长国画，又写得一手好书法，而且对于诗词格律颇有研究。他画风严谨，功力颇深，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把东方神韵融进西画之中，这是一般中国画家不易做到的，也是西方画家难以企及的。所以，没多久，顾乐夫的画就在美国走红，多幅不同类型的画作均获美国各类大赛的不同奖项，其中有油画，也有水粉画、水彩画。由于顾乐夫的画作屡屡创新，年年在美国获奖，因此，他的画受到世界各国画廊的青睐，其画作《高原的风》《朝拜以后》《朝圣去》被美国世界顶级画廊所收藏。

1996年10月，顾乐夫在南通沈寿艺术馆举办“顾乐夫省亲画展”。这是顾乐夫出国后第一次归来，他奉献给家乡的艺术之花犹如严冬过后的牡丹，令人耳目一新。画展共展出60幅油画、国画、水彩画、素描和20幅书法作品。画展轰动通城，观者如堵，旧朋新友相聚，热闹非凡。

顾乐夫第二次回乡是在2000年4月。

2000年4月8日上午，“南通中学校友著名画家省亲展”在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幕。这个画展是南通中学90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参加这次画展的画家是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至70年代南通中学的毕业生，有徐惊百、史白、王个簃、高冠华、曹用平、袁运甫、袁运生、范曾、顾乐夫、沈启鹏、范扬、冷冰川，世界级大师赵无极亦在内。一个南通中学就出了这么多海内外著名的画家，这在中国普通中学是绝无仅有的。顾乐夫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而

深感骄傲。

2005年9月24日上午，南通博物苑新展馆广场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百年展览暨南通博物苑新馆开馆仪式隆重举行。国际文博组织代表、国内外知名博物馆馆长、国内外文博界知名专家等300余人参加了仪式。南通籍华人艺术家顾乐夫在当天的仪式上向博物苑捐赠了专为百年庆典所作的国画作品。

顾乐夫这次回国，除了参加博物苑百年庆典外，还肩负着为张謇绘肖像的重任。张謇是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的创建者，也是顾乐夫崇仰的前辈先贤。南通城市博物馆特请擅长人物肖像画的顾乐夫画一幅能表现张謇风范的肖像。接此重任，顾乐夫一刻也不敢怠慢。他是6月23日回乡的，25日就开始动笔。9月4日下午2点，顾乐夫在画布上抹下最后一笔，退后一步，认真仔细地端详着他的心血之作，许久许久，终于满意地舒了一口气，这才发觉，自己午饭还没有吃。

这幅张謇的半身肖像油画长100厘米，宽64厘米。画面上张謇身着马褂，神态安详，目光如炬，不怒而威。在用色上，张謇马褂的色彩较为沉着，表达出张謇文人和儒商的特征；背景比较透明，反映了张謇的先进思想和历史功绩。整个画面反差明显，对比强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从这幅艺术精品中，可以感受到画家的智慧之光、理性之光、情感之光，启人心智。



著名儿童教育家李吉林

官地街73号，为著名儿童教育家、中国情境教育创始人李吉林宅，周围邻居称之为“情境园”。

1956年，李吉林以22门全优的成绩走出江苏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被分配至现在的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校，开始了人民教师的生涯。当年的校长缪镜心（范曾的母亲）对她精心培养。

1958年，年仅20岁的李吉林就被江苏省教育厅邀请参加编写小学语文教学参考书。在教材编写室工作的两个学期里，聪颖、能干的李吉林深受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的赏识。1962年，在吴天石主持的小学语文教学座谈会上，李吉林颇有新意的发言得到众人赞赏。《江苏教育》编辑前来约稿，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她的教学实况。之后《新华日报》《江苏教育》等报刊上时常可见到她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中吴天石受迫害至死，李吉林也因吴天石的赏识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1978年，严冬过后是新春，已至不惑之年的李吉林深深感到：中国教育长期受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体系影响，偏重认知，忽略了情感与创造性的培养。于是，她向学校领导提出，她要带一个实验班，从一年级教起，探索研究小学语文教学，开始情境教学的实践，成为中国小学教育改革最早的弄潮儿。

1980年，情景教学首轮实验进入攻坚阶段，李吉林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从外语情景教学中得到启发，创造出有效进行语文教育的崭新模式。为了教学实验的需要，为了让每一课都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曾顶着烈日到郊外寻找老黄牛，冒着严寒在山巅等待喷薄而出的朝阳。她带学生拔过萝卜，找过野花，数过古塔檐下的风铃，听过长江汹涌的涛声。她或用图画再现，或以音乐渲染，或用实物演示，或用语言描绘，或兼而用之，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将学生引入“形真情切、意远理蕴”的教学情境中，促进学生主动地、创造性地学习。

在李吉林的循循善诱下，实验班的学生步入了求知的良性循环，二年级时人均识字数为2680个，达到四年级学生的识字水平，课堂阅读量是一般班级的6倍，引得家长啧啧称奇。新华社的两位记者专程来到通师二附，对李老师班上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考试。记者让李老师教的二年级学生与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就同一个题目写一篇作文，由记者出题，记者监考。结果，二年级的学生写得又快又好，令两位记者惊叹不已。不久，《人民日报》一下子发表了她班上3名学生的作文，并加了编者按语，高度评价了李老师的这项实验。

情境教学唤起了儿童的情感参与认知活动，孩子们学习负担不重，读写能力提高得又快，变成“吃不饱”了，李吉林决定给孩子们编补充教材。她找来名家名著，天文、地理、科学、人文，诗歌、散文、小说、短剧，组成综合教材，自己动手，刻写油印。夏天，她坐在蚊帐里写；冬天，脚冻得像掉到冰窟里，她自制了“取暖器”——做一个硬纸盒，里面塞上棉花，将双脚放进去……李吉林一学期刻印一本，10学期10本，足足刻写了60万字。5年下来，实验班43名学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33人，作品达75篇。升学考试时，55.8%的学生作文成绩达优秀，这个比例是整个区平均优秀率的12倍。



李吉林又努力把实践上升到理论，写成了专著《情境教学实验与研究》，这本书获得国家教委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她的另一部专著《小学语文情境教学》又获得教育部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她的情境教学实验，获中国教育协会、《教师报》颁发的全国中小学教学改革“金钥匙”奖，被国家教委列为向全国推广的8个科研项目之一。《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该项实验和科研成果。“情境教学法”被收入教育辞书，成为公认的科学教学模式。李吉林也因成就卓著被收入《教育大辞典》《中国名人辞典》《当代中国人物志》和《中国妇女辞典》等辞书，成为享誉全国的儿童教育专家。



李吉林

李吉林不再囿于语文单科的情境教学实验，她首先向相邻的思想品德学科拓展，以生动的道德情境、具体的道德形象，唤起儿童的道德情感，达到动情而晓理的境界，使道德教育真正触及、润泽幼小的心灵。接着向音、体、美学科

渗透，获得成功后，她又向自己陌生的数学学科挺进，她与数学老师一起研究“数”与“量”、“数”与“形”的关系，把儿童带入探究的情境，在模拟情境中加以操作，强化其应用性。这样，从一班到全校，从单科到多科，情境教学全面进入了各科教学，为情境教学向情境教育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情境教育以学生为本，为儿童发展拓宽了思维空间、想象空间、活动空间，在发展儿童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

李吉林深知，教育是薪火相传的事业，她以一个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建设跨世纪优秀群体”的构想，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典范形象来影响一群人，建立一支锐意进取、继往开来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情境教学在各学科的全面展开，使通师二附的学生们不再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不再为做不完作业而垂头叹息。情境教育把金色的童年又还给了孩子：元旦到了，孩子们把学校装扮成奇异而美丽的童话世界，孩子们在这童话世界里尽情欢乐，尽情创造——写童话、演童话、画童话；阳春三月，正是蜜蜂采花酿蜜之时，“读书周”到来了，比一比谁读的书多，听一听谁讲的故事生动，看一看谁做的读书笔记好；秋高气爽，丰收在望，孩子们来到郊外，来到田野，从拾稻穗中理解了“粒粒皆辛苦”的意蕴，在拔萝卜时体味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甘甜；学校的腊梅园，也成为情境教育的生动情境，在腊梅节中让孩子们感受腊梅凌寒傲然开放的品格之美，体验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冬日的象征性长跑，“到北京去”、“沿着红军的足迹跑向前”，孩子们的欢呼与热烈早已驱散了严寒。

40年不倦育人和无悔求索，为李吉林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及中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所长、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组成员、中央教科所兼职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

1996年12月，全国教育教学最高研究机构中央教科所和省教育行政最高机构江苏省教育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全国情境教学——情境教育学术研讨会”，70多位全国教育理论界的知名专家、学者汇聚江城南通，高度评价了李吉林的研究成果和对中国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98年11月，我国第一个以教师个体教改研究成果命名的研究所——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在通师二附正式挂牌成立，李吉林亲任研究所所长。同时挂牌的还有“江苏省小学教师情境教学培训基地”。研究所成立十多年来，在课题研究、教师培训、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全国已有数以万计的教师通过这个平台接受过李吉林的指导。

2006年，360多万字的八卷本《李吉林文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北京举行的“李吉林教育思想研讨会”上，教育专家指出，李吉林是我国从小学里走出来的教育家，为中国基础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她创造的“情感与认知结合的理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教学论的空白。

2008年11月，在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南通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李吉林情境教育国际论坛”上，美、英、日等国专家及国内众多著名学者称“情境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回应世界教育改革的中国声音”。情境教育作为中国教育的宝贵财富，开始受到世界教育界的瞩目。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的愿望正在实现。

参考书目

- 王建明. 南通市教育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江海号角. 合肥: 黄山书社, 1993.
-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江海风云录.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 蔡起泉. 南通风情.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中共南通市委《劳模风采》编委会. 风采. 合肥: 黄山书社, 2001.
- 余继堂. 江东佛门春秋.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8.
- 南通市政协文史编辑部. 梦游梅花楼.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 崔莉萍. 江左狂生——李方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缅怀写读出刊时. 合肥: 黄山书社, 2001.
- 张自强, 杨问春. 秋山红叶——江上青烈士传.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
- 缪建新. 南通中学百年发展史.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

朱全中. 气贯长虹谱楸韵——通中校友英烈传.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陈杰. 经天纬地铸诚恒——通中校友院士录.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韩明飞. 技精艺湛耀崇川——通中校友群星谱.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钱素凡. 钱素凡文集.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钦鸿. 划破夜空的流星.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钦鸿. 濠南集.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季修甫. 季修甫文集.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邵盈午. 大匠之路.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严清. 辉煌人生从这里起步.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范曾. 范曾自述.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徐刚. 鬼才范曾.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

张謇研究中心, 南通市图书馆. 张謇全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袁运甫. 有容乃大.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1.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参 考 资 料

- 《万历志》
《嘉靖志》
《康熙志》
《光绪志》
《通州直隶州志》
《海曲拾遗》
《民国南通县图志》
《江苏文史资料》
《南通文史资料选辑》
《江淮集》
《回碧楼文谭》
《崇川文史》
《南通掌故》
《文海星光》
《姚白予在上海、角斜回忆录》
《法制文萃报》
《惊百文存》
《江海奔腾》



- 《南通惨案史料》
《南通道教历史概貌》之《宗教史林述粹》
《江海英烈》
《南通地方书画人名录》
《南通今古》
《南通日报》
《江海晚报》
《南通电视报》

后 记

我生于寺街，长于寺街。下乡五年，魂牵梦萦着青砖黛瓦的寺街。当面临上大学和回寺街的两难抉择时，我选择了回寺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选择只是一种浅薄的对衣胞之地的眷恋罢了。

直到十多年前，在寺街即将遭到拆迁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和寺街人一道坚守这南通历史文化根脉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寺街。

我们曾钻进图书馆的古籍部，穿越深邃的时光隧道，与历朝历代的典籍资料进行长久的对话，欣喜地搜索着寺街人在各个领域纵横驰骋的印迹、在地域文化坐标上的秀峦奇峰；

我们曾冒着严寒酷暑，踏着叠印着无数寺街先贤脚印的碎石路，穿梭在老街小巷、古宅深院，丈量和描绘这些历史文化的积淀，寻访对晤先贤后裔，不时为发现南通各界的名人而欣喜，为弥漫着经千年挥之不去的文化气息的古宅而击掌。

守护“藏在深闺人未识”寺街多年的寺街人，史料积攒盈尺，聚焦的照片数万，今撷取其中一二，借此机会让白发



千年的寺街闪亮登场。

感谢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寺街这一方热土；

感谢寺街的父老乡亲毫无保留地倾诉寺街的点点滴滴；

感谢守护寺街的志愿者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留住了寺街，为我赢得了重新认识寺街每一寸肌理的机会；

感谢所有关心、关注寺街的有识之士，采访、撰写了数不清有关寺街和寺街人的文章，使我能集众人之所长，勉为其难地完成此书；

感谢我高中的班主任孙模先生在百忙中将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倾囊相助；

感谢姚剑湘女士、李向东先生、张延栖先生、赵鹏先生、张建先生提供有关寺街的照片；

感谢徐放先生、钦鸿先生、袁运正先生提供寺街名人的照片；

感谢烈士陵园提供部分革命烈士的照片；

更感谢“江海文化丛书”的编委们，为我提供了呈现寺街这一南通历史文化瑰宝的平台。

物质层面上寺街的存留往往不是小百姓所能左右的，但能有一个承载寺街历史文化珠玑、鲜活着寺街芸芸众生的精神层面上的留存，也是一种慰藉。

囿于本人的阅历和水平有限，不足之处难以避免，敬请诸位读者和方家指正。

施 宁

2010年2月

目 录

走过寺街·····	1
-----------	---

庙 宇·街 巷 ——构筑古城历史的根脉

天宁寺·····	4
关帝庙·····	8
古郡庙·····	11
真武庙（北极阁·北上真殿）·····	14
地藏殿·····	16
华王庙·····	18
寺街·····	21
官地街·····	23
中学堂街·····	27
柳家巷·····	29
三衙墩巷·····	32
育婴堂巷·····	35
侯家巷·····	38



石桥头·····	42
胡家园·胡家庵巷·····	44
大巷·小巷·····	49
谯楼·钟楼·····	53

书院·学校

——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

紫薇书院·····	56
紫琅书院·····	58
通州贡院·通州试院·····	60
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	64
江苏省南通中学·····	67
江苏省立南通小学·····	71
南通市实验小学·····	74
养正小学·····	77

世家·名居

——彰显家族文化的底蕴

工部尚书、榜眼王广荫宅·····	80
兵部尚书顾养谦宅·····	83
武进士易崑宅·····	88
诗文传世十三代范氏宅·····	92
钱嘯秋教育世家·····	99
南通徐氏祖宅·····	102
“一门两进士”袁氏古宅·····	105
清道台梁缙卿宅·····	109
开明绅士管仲谦宅·····	112

祖传九世治疗程氏宅	115
御医林氏中医世家	118
明保天官第	122
祖孙期颐长寿园	125
徐赓起的城砖楼	128
周公馆·糯米楼	131
李公馆·将军府	134

革命遗址·烈士故居

——传承爱国主义的基地

反袁志士沙淦	138
妇女部长朱文英	141
巧施“木马计”的汤景延	144
铮铮铁骨江上青	149
红色“女谍”马世和	152
革命文艺战士史白	157
中国的保尔徐惊百	161
民主斗士钱素凡	165
青艺志士季天择	170

老巷·名人

——彪炳寺街史册的骄子

状元胡长龄	174
福建按察使徐宗幹	177
“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	181
清代科技发明家蒋煜	186
胡适的老师、翻译家白作霖	189



国学大师徐益修·····	193
著名古琴家徐立孙·····	197
梅庵琴社创办人之一邵大苏·····	201
中科院院士黄耀曾·····	205
科学史专家袁运开·····	209
诗人和剧人江村·····	213
献身中国电影和戏剧事业的顾而已·····	218
诗书画大师范曾·····	222
中华壁画巨擘袁运甫·····	226
逆境自强的艺术家袁运生·····	232
旅美画家顾乐夫·····	237
著名儿童教育家李吉林·····	242
参考书目·····	247
参考资料·····	249
后记·····	251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 炎

委 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市级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点。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作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寺街 / 施宁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2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81137-620-3

I. ①寺… II. ①施… III. ①南通市—地方志 IV.
①K295. 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570号

书 名	寺 街
著 者	施 宁
责任编辑	薛华强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98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620-3
定 价	20.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35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